

增訂版

民主主義概論

陳伯達著

人民出版社

三民主義概論

(增訂版)

陳伯達著

1943

新華書店出版

三民主義概論（增訂版）

版權專有
不准翻印

著者	陳伯達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所	新華書店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定價	七元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版
一九四一年六月再版

增訂版自記

這小冊子的增訂版比起原版很有更動。第一，民國二十六年冬天原稿，有一部份在初版沒有收進的，現在再補充進去，以免殘缺；同時，把整個小冊子的若干結構重新整理，並在一些地方有所增加或修正。第二，初版的序言抽去，另寫一篇較長的序論：「論孫中山先生及其學說」（收在這裏的，比初版「解放」發表的原稿，個別地方又整理了一下），使整個小冊子各方面的歷史輪廓能比較清晰。第三，二十八年所發表的「關於馬克思學說的若干辯證」，其中主要的內容，也係二十六年原稿，現在把它補充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三民主義」那部份裏面去。

——作者，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目錄

增訂版自記

一 論孫中山先生及其學說	一
二 三民主義的歷史根源	三六
三 三民主義	四三
一 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完整性	四三
二 民族主義	四五
三 民權主義	六三
四 民生主義	八四
五 關於三民主義的總結	九八
四 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	一〇五
五 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三民主義	一八

論孫中山先生及其學說

「三民主義概論」增訂版序論

孫中山先生——這是一代民族革命的領袖，革命的民主派，一位主觀的社會主義者。

在晚清時候，康有爲與孫中山先生兩方面的鬥爭，是兩條政治路線的鬥爭，康有爲是改良的實業派，而孫中山先生則是革命的民主派。康有爲主張保國救土，主張改革政治，主張改良民生，並提出烏托邦的大同思想（即烏托邦的共產主義思想）；孫中山先生也主張保國救土，主張改革政治，主張改良民生，並同樣地提出烏托邦的大同思想。然而他們採取的路綫，在基本上却不相同：康有爲的立場，沒有脫離貴族派的本色，他高立於民衆之上，蔑視民衆，叱咤民衆，認爲民衆的利益應該怎樣獲得來的；孫中山的立場則不然，他的立場，是認爲民主派的本色，他向民衆接近，同情民衆，依賴民衆，認爲民衆的利益應該是從爭取得來的。根據前者的立場，所以康有爲的道路，就限於主張自上而下的貴族改良；根據後者的立場，所以孫中山的道路，就進到主張自下而上的「國民革命」（見「同盟會宣言」）。（或如中山先生在「軍人精神教育」所謂「人民革命」、「平民革命」）。這兩個基本上不同的立場，以及由此不同立場出發所傾向的不同道路（即一方面趨改良的貴族派，貴族的改良；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民主派之民主的革命），則決定了：一方面康有爲和保皇黨在戊戌政變歷史上的失敗，另一方面孫中山和革命黨在辛亥革命歷史上的勝利。

版一下，而沒有例外。

中日戰爭之後，各帝國主義者各在中國瓜分了、攫取了自已的勢力範圍，中國完全落入於半殖民地地位。中國各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很大地展開了，漢族與滿族矛盾也更大地展開了。馬關條約的規定，使得：帝國主義者獲得機會在中國領土上利用中國階級的矛盾力，紛紛建立租界；然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也因受了新刺激而有新發展，社會發生商力與舊生產關係的矛盾是大大地增加起來了。民族覺醒運動是日益有力了。人民的革命運動是日益有力了。新興資產階級是逐步抬頭了。庶民爲革命領導的戊戌政變運動，是要以改良的道路來領導革命的，同時也正是民族覺醒運動發展的的一種反映。這個中國的現實歷史條件，以及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使中山先生得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綱領，進而而提出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綱領，並形成了中山先生的主觀社會主義思想。這就實現了中山先生對於被壓迫的民衆之熱烈的同情。這個急進的資產階級土地改革的綱領，反映了中山先生對民衆的要求更進一步了。

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綱領，是反映了中國大小生產者——農民的要求，這大小生產者希望把自己從封建的土地剝削關係之下解放出來。這個綱領在當時的提出，一方面，恰恰是反映了農民與地主階級走向尖銳化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山先生由此所產生的關於社會主義烏托邦派思想，却恰恰又是反映了當時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還沒有清楚表現出來。這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綱領，恰恰是反映而證明了中國的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旁的革命，因爲這革命在經濟上所要改變或打倒的，只是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而不是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這也正如這革命在政治上所要打倒的，乃是專制制度，而並不是其他。

中山先生民生主義在國內得到熱烈的反應，並且這種反應，或者可說竟比中山先生表現出更爲急進的色彩。特別明顯的，是：哥老會改組爲龍華會所發出的宣言及會規，比其他都是表現了空前的急進。他們的徵文第一句話：「怎樣叫改革？革命就是造反」。他們的宗旨這樣寫着：「什麼叫做革命？就是俗語叫做打主意；我們兄弟家打他的主意麼？就是我們兄弟家祖上的大仇，並現在種種暴

得我們的新仇。……並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霸佔，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貧富的階級，大家安安靜靜享福有飯吃呢！」（「中國秘密社會史」一三一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這且是直接的土地革命的號召了。這個龍華會要算是農民革命真正的先驅，與其所謂由此可以使得「不生出貧富的階級」，則又正是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思想的。

無疑的，當時民族民主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弱點，也正在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上得到了反映。就是說，中山先生的思想不但反映了當時民族運動、民主運動、農民運動的興起方面，同時也反映出其弱點的方面來。一方面，民族的被壓迫、專制的暴虐、人民生活的貧困，這些特別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更有加無已（這就是與中會宣言上的所謂「中國衰弱，至今極矣，……政治不修，綱維散壞，朝廷腐敗，官吏，公行賄賂，官制則民刮地，暴過虎狼，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風雨飄搖，虎視鷹瞵，……貪食鯨吞，已效尤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憤於目前」）。而與這種危迫迫迫來的，便是人民的仇恨和「予及汝渣亡」的階級，日益增長起來。人民這種仇恨和情緒，反映到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上來，產生了他的對於舊制度舊秩序的嫉視，產生了他的關於革命的三大綱領，產生了他的關於打平不平等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主張，產生了他和一切同志們的革命奮鬥；但另一方面，當時民族運動、民主運動、農民運動却有很大弱點和弱點，在廣大人民中還存在各種中古落後的障礙；廣大人民還沒有自覺地捲到直接鬥爭的漩渦，宗法、保守和迷信在廣大農民中還有極大的經濟勢力，這是他會黨，這已如龍華「革命黨」了，而且當時真正組織的革命黨了，但是，宗法、保守和迷信，却還在那裏有很大的權威（宗法制度在會黨中所反映的，就是盲目權威），自然在廣大人民中還是缺乏的東西，同時，資產階級的軟弱，其對於民衆的信賴也是不足的。這一切的缺點和弱點都反映到中山先生的思想上來，便是他關於三民主義——特別是關於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可能實現的方法之不足（按照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說的，就是「方法未善」，或者是「沒有好方法」）。革命運動的缺點和弱點，反映在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思想上，便是他關於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

主張，反映在他的民生主義上，便是平均地權還沒有直接和農民無代價獲得土地的問題聯絡起來。革命原則與實現方法的矛盾，是中山主義的特點之一。這種矛盾的發展，就時常表現為小資產階級之革命的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之改良的自由主義的矛盾。

一方面，依黨會黨進行革命的舉動（起義），進行建立革命根據地，「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這是表現了當時中國人民奮鬥的眞精神，也是表現了當時中山先生關於革命的高點。另一方面，却還不能把一切革命問題的解決，完全訴之羣衆的直接行動，而關於自覺的組織和武裝最廣大的人民起來——這種議事日程，對於當時中山先生還是一種陌生的事業。

上面提到過中山先生——這個偉大革命家不敢步自封。中山先生是有自我批評的作風的，而這種作風正是一切革命家保證其革命生活所絕對必需的條件，這條件對於革命家就是：如人的需要空氣和魚的需水一樣。完全對的，如中山先生後來所說：辛亥革命的所以「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未善之過」。有革命綱領，而如果没有革命方法，這種革命綱領是不能由可能變成實際的。沒有訴之廣大羣衆的直接行動，任何民族問題、民權問題和民生問題，都不可能獲得真正解決，這點由中山先生奮鬥失敗的歷史更已完全證明了。

依靠民衆的力量而有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了滿族的統治和專制制度，然而，又因依靠民衆力量的不足，辛亥革命同時又是失敗。資產階級革命精神的廢弛，使得：帝國主義工具——軍閥的反革命統治終於代替了帝國主義工具——滿廷的反革命統治。

辛亥革命的退潮，結束了「會黨」所能盡的一時代的革命事業。歷史的前進，指出了：會黨革命性的有限度，會黨這種原始形式的組織，對於革命所需要大量自覺民衆的「新潮」已不適用了。革命在民衆問題上需要另闢新途徑，這新途徑要有待於一個嶄新的社會階級發出政治舞台，而當辛亥革命退潮的時候，這新社會階級的獨立政治力量却還沒有發現出來。

二次革命（民國二年討袁戰爭，中山先生稱爲「二次革命」）之悲慘的失敗，反動逆流的高漲，

舊形式的民衆運動之消沉，新形式的民衆運動還沒有起來，在這時候，中山先生流亡日本，組織革命黨，企圖「再舉革命」。但民衆運動的弱點，却正是革命的弱點。革命黨方面沒有夜一舉。革命與民衆分離，就不能出現真正的革命（如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說的：「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同時中國無產階級根據中國自己的歷史條件，也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運動及其發展，以這種與帝俄爲首領，在都市中，在鄉村中，組織了革命黨與革命前未有的新形式。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正式形成了。國際國內歷史條件的劇烈變化，是使中國革命的新人物，中國革命的新空氣，中國革命的新辦法。同時，中國資產階級在物質發展的基础上，在革命運動發展的條件下，在政治上又重新積極化起來。這時候，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的中山先生受了當時的新影響，感覺到中國的新希望了。這個新時代反映的中山先生思想上去的，一方面的便是三民主義思想的發展（舊三民主義變成新三民主義）；另一方面，便是新革命方法——三大政策的產出（三民主義變成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把三大政策與新三民主義結合起來，這就獲得了嶄新的歷史意義。中山先生之新訂新鐵的對黨新的革命語言是：「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中山先生臨終最明確的偉大遺囑是：「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當中山先生運動在五四運動後勃發起來的時候，中山先生就表示了這「喜歡和工人做朋友」。他說：「我素不最敬顧的，是像個做工的人，所以我總喜歡與工人做朋友，內中工人是農工、商工、社會最有利益的人。我們最相恨的，就是軍閥、官僚、資本家，因為他們是與農民、工農、社會最有害的人。」（民衆教育機關公會成立大會時演說）。

當時民衆教育機關公會成立大會時演說的時候，中山先生就滿腔熱忱地向農民提出「大聯合」。在民國十三年一個農民解放大會上，他認爲：「這是革命黨與農民第一次大聯合」。在軍閥是破天荒的第一件事」。他說：「民生主義不能夠實行的責任，就在大家農民身上」。『農民解放是軍事，根本上還是與農民自己先有覺悟』。『今日開這個聯歡會的目的，就是在提醒你們農民，

要你們同鄉之後，要提醒大眾，大眾都聯絡起來，結成團體，便可以不做做人的奴隸」。中山先生是如何逐步地在歡迎農民的直接力量呀！他在這時候，由平均地權進而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了。

工農運動及其力量的發展反映到中山先生思想及政策的進步，同時，初時農民運動的缺點（還不夠普遍與深入），也反映到中山先生關於「耕者有其田」實行步驟的遺憾。大革命的實際、打倒舊時農民的宗法和落後的陳跡，同時也補正了初期農民運動的缺點。農民越過那過去反映自己窮苦的一切界限而前進了。中山先生在這時候可憐是早逝了，他看不見這種震動整個亞洲大陸甚至世界的革命行列。但是按照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中同情農民行動的觀察看來，按照中山先生進步的歷史看來，這個偉大的民主派、假如還活著而仍與這偉大的革命行列在一起，這在歷史上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不會是奇怪的事情。

中山先生思想的兩方面性質，是過去中國革命發展的一面鏡子，同時也是中山先生過去所依賴的社會基礎的一面鏡子。雖則在客觀上是這樣反映，在主觀上又是否這樣理解，並不就是一件事情，而且按照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在繼續創造新歷史，當然也在創造着更正確的鏡子。革命是在改變和糾正過去革命的弱點，而為時代和革命所創造出來的新人物——先進階級的代表就是最能繼續開來，成為被壓迫人類的新進領導者，要能在主觀上正確地把握客觀上中國社會歷史和革命的規律，以引導革命在各個階段上的勝利，而這種勝利，無論任何阻力，都不能制止的。

中山先生——他的聲名會為中國民族覺醒的一代領袖；他的百折不回的長期奮鬥歷史，真正無愧於民族革命領袖的偉大稱號，而且將永遠為中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人類所尊敬。在他逝世之後，一些人利用他的名義，却把他真正的革命遺產拋棄如敝屣，一些人天天背誦他的關於「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遺囑，却把民眾賤視如草芥；無產階級的代表——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却相反，他們了解中山先生的革命遺產的真正所在，並自視為他的革命遺產的最好繼承者（正如他們是民族一切優秀遺產的最好繼承者），並把那所有為「中國今日之必需」而「付之於實際」實際為一

新的試金石，也是一切的分水嶺。在羅曼羅是中山先生革命遺產的朋友，對是中山先生革命遺產的仇敵，是灼如判火了。

二

革命是行麼呢？革命就是否定舊制度，創造新制度。新思想是什麼呢？新思想就是否定反映舊制度的思想，創造反映新制度的思想。

新思想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和打破舊思想的過程中而產生出來的。中山先生自己說過：「三民主義是打破舊思想的主義」。他說：「說人羣進化的道理來說，舊思想是妨礙進步的，總是舊人羣的，我們要求人羣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他說：「吾人今日由舊國家變為新國家，當對於舊思想，發達新思想」。「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對於這種打破舊思想的態度，近世西方經濟發展時期一切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所有的特點。這斷我們可以看到：嚴守謝氏口誦中山先生的「資本主義，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與中山先生自己文獻的解釋，並不相合。在中山先生思想中，有舊思想的消滅跡，同時又繼承了中國過去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寶藏；這些並沒有斷絕的，然而如果把中山先生的基本思想當成只是封建社會傳統的繼承，那並不是從歷史的向前來看中山先生，而恰是從歷史的向後來看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會是一個受西方教育的人，還是非所週知的，而從中山先生生平的事實看來，在近代中國歷史條件下，他所提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口號，正是直接接受西方外國人學說的影響。如民族主義中的反帝國主義和國內各民族自由聯合，如民族主義中的政體非資產階級少數人所得而私和直轄民權，如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以及其他書中散見的，是在中國過去「中庸之道」和「孔子道統」所看不到的；而中山先生這裏表現其所受的影響，是從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或資產階級立憲派（如俾士麥）、西方的小資產階級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直到無產階級科學社會主義者，特別其晚年所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最深受國際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影響。完全對的，列寧在辛辛那

時候，就這樣指出：「先進的中國人以及全體經過這般高漲的中國人，其解放的思想是從歐美來的」。這不是中國人的恥辱，也不是中山先生恥辱；相反，這正是近代中國人和中山先生進步的表現。光榮，有種人一方而偏僻香港中山先生的西方思想，另一方面誇大了中山先生所有的新思想而加以發揮，這正是這曲中山先生思想的目的，使人迷醉而相罷了。把接受西方一定的進步思想當作不進步了，或諱莫如深，或肆加摧殘和污蔑，這正如晚清郭嵩燾坐小火輪到長沙被人呼作漢奸一樣而受辱了。

中山先生自己說過：「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舊有之思想，有組織歐西專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從一定的歷史基礎，及其由此一定歷史基礎而來的進步，這正是中山先生上述價段所含有其一定的實質性的，而從其積極方面來看，這正是中山先生對於民族民主新思想的創造。

一定的社會條件決定人們思想發展所能達到的程度。一定的思想在階級社會中總為自己的一定社會階級基礎所制約。在總體固有思想方面，在接受西方思想方面，在目前已有的創獲方面，中山先生亦是如此。一定的社會條件使中山先生有在這些方面發展的可能，而表現為一定的「新思想」；同時，也是一定的社會條件，使中山先生在這方面發展有其一定的歷史界限。這界限就顯出共一定的積極方面和一定的消極方面來。

中山先生之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的兩方面性質，就像一條紅線貫串於中山先生宇宙觀及其一切觀點的各個方面及其各個歷史階段。

中山先生在物質與精神之關係這個哲學上的最高的問題上，是具有兩方面性質的，二重論的。一方面，中山先生承認物質為「體」，精神為「用」，承認物質與精神的「二者本合為一」。這是中山先生唯物論思想。革命需要民眾，工業化需要科學，中山先生是追求中國工業化的一個偉大

代表），這就帶來唯物論，而這也就是中山先生唯物論思想的基礎。中國民衆的逐步覺醒，自然科學自晚清以來在中國的發展，這就會發展唯物論的思想，而這也就是中山先生唯物論思想的條件。

另一方面，中山先生說：「凡非物質者，即爲精神」，這是包含着一種意味，以爲精神是獨立於物質之外。又說：「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這也是包含着一種意味，以爲物質是精神的表現，而非精神是物質的表現。這是中山先生的唯心論思想。從其社會階級基礎上來說，這是由於其與民衆結合的不足，資產階級工業經濟力量的脆弱；從過去中國歷史條件來說，那受迷信和宗法縲紲所長期束縛的廣大小生產者，在其覺醒的過程中，仍時常糾纏於祈禱、夢想和哭泣，同時，自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也還沒有形成一種普遍的、更高的而強有力力量，而這些必然是影響於中山先生唯心論思想的。

中山先生承認物質與精神的「二者本合爲一」，而不是「絕對分離」，這是中山先生的進步，但是要能真正處理這問題，却只有唯物一元論，不能是心物二元論。而真正的唯物一元論，只能是近代辯證唯物論。二元論正使二者分離，而不能使「二者合而爲一」。而且歸根到底，一定要引到唯心論的結論。「物質不是精神」，而精神自己不過是物質的最高的產物」（恩格斯）。「思維是發展到完善高度的物質的產物，就是說，是人腦的產物，而人腦則是思维的器官」（斯大林）。這樣，從物質的發展來看物質與精神的合一，而不是分離，問題便得到完全解決。

中山先生說：人「若猝然喪失精神，官能離其，不能言語，不能動作，而體亦即成爲死物矣」。這就是唯心的結論，照真正唯物一元論來了解，問題却是如此：人的精神喪失，是其官能（肉體）損壞的結果，是由於官能——這個物質體的處於死亡，而不是因爲精神的喪失才引出肉體的死亡。

中山先生說：「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盡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因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其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馭之」。這同樣是唯心論的結論。照真正的唯物一元論來了解，則問題即是如此，人類的能夠制馭動物（不論是成人或童子），是人類長期勞動征服自然界的結果；人類

與動物的區別，是勞動。「勞動創造了人類」(「從猿到人」)。童子能以手引繩，這便包含着人類歷史發展的特點：第一，人類的手對於人類征服自然界、創造社會生活之特殊的作用，而「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並且是勞動的產物」(「從猿到人」)。第二，人類是製造工具的動物，而「自製造工具的時候起，才有勞動的發端」。這樣，我們可以看到，這不是童子有精神與牛沒有精神的問題，而是人類歷史的問題。其次：感覺是物質所表現之精神的初步形式，這種精神，不但是動物發展到人類才有，並且普通動物都已有的，而牛當其被牽出而要就殺的時候，還會懂得「覈棘」甚至流淚。在精神上，人類不但能感覺(當然，其多方面的感覺能力，遠非一般動物所可比擬，雖則有個別的感覺，人類也有不如動物的地方)，而且能思惟，這是人類精神的特點，而人類頭腦之所以能成為思惟的機關，同樣是人類勞動鍛鍊出的結果。

真正唯物論的一元論，是歷史主義的唯物論，又是唯物論的歷史主義，而二元論却正是非歷史主義的立場，這點就使他的唯物論方面都不可免地陷於唯心論的結局。

X X X X X

關於物質與精神之關係這個哲學上最高問題上的二元論性質，同時隨此而表現在其他許多認識論問題上的二元論性質。

中山先生說：「吾人之在世界，其知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謫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既多，智識遂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這種認識論是一種唯物論的，並且是含有某一定發展成份的認識論。這種思想表現新興的中國市民階級對於重新認識世界的要求，對於科學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又承認有「天生之智」，這就是先天論了。這種先天論又表現了這新興市民階級歷史眼界的有限，表現了其對中古陳跡的迴顧。

中山先生認為中國歷來人們的所謂「知易行難」是他的「生平之大敵」。他於是把「知易行難」倒轉過來，變成「知難行易」。

一方面，中山先生認爲人類的進化的過程是從「行」出發的。他說：「……且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也，而不以科學之發明爲之變易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爲必靈之門徑也。史學家也，試驗也，探求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生徒之習也，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能知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證其知也；探求家之探求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存大保守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由是觀之，行其所不知者，於人類則促起文明，於國家則促進富強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獨爲人類所皆能，亦爲人類所當行，而尤爲人類之欲生存發達者之所必也。有若國家富強者，宜揮師力行也」（「孫文學說」第七章）。這是唯物論的思想。這就表現了這位革命民主派之充分的高尚的氣概。這話正證明了：沒有革命的實踐（力行），就無所謂革命。他說：「論新學法，儒之大害者也；多有不能而知者，必待行之成而後乃能知之也。……中國之學法，必先求知而後行，其知而不能得，則行亦無其期也」。

「……中國……道在行之而已」（第五章）。這就證明了：中國革命的問題乃是革命的實踐。同時，革命的實踐是民衆的問題，而不是二三人問題，沒有民衆，就談不上革命的實踐；關於這點，他說：「中國不患無實行家，蓋林林總總皆是也。乃吾黨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共以爲二三人可爲改革國事之實行家，真謬誤之甚也」。這同樣唯物論的思想正是中山先生從革命的實踐經驗得來的，同時也是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反映。

但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在談話又指出了一種缺點。行既是知的出發點，林林總總的大眾既是實行家，則歷史的進程正是：實行家的大衆乃是知之創造的源泉。但是中山先生却又把這種實行家行「知」完全分開出來，他把他人類分爲三等，一種是先知先覺，一種是後知後覺，一種是不知不覺，而這種所謂「不知不覺」就是當時的林林總總的民衆。把先知先覺和民衆分成一種鴻溝，結果就可以得到另一種結論，民衆；就是說民衆的發展沒有關聯的，實行家不定是歷史的原動力，而理想家可以決定一切。也即所謂「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這就是唯心論的思想，這種思想一方面是一切階級社會中勞心勞力的分工所反映的階級成見（這種階級成見，在資產階級中仍被認爲天經地義）；另一方面

價值正是反映了當時中國廣大落後小生產者的覺悟不足。

中山先生有些關於知行合一的自發的天才見解，如所謂「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因已知而更進而行」他說：「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前人也，似於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爲易，以行爲難」(第五章)。這些見解是很對的。但中山先生在主觀上又不同意知行合一。中山先生是反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但王陽明之唯心論的知行合一是一事，唯物論的知行合一又是一事。如果因爲反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而同時根本否認知行合一，則這就不合乎歷史過去的實際，也不合乎歷史現在的實際。中山先生說：「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實爲適當。然王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所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第五章)。但近代歷史的實際却證明這點：歷史愈前進，科學愈明，則一時代一事業知行合一的發展與個人知行合一的發展就愈成正比。社會歷史的發展和科學的發展正是使勞力與勞心的分工有消滅的可能，而在共產主義社會必然把這種可能變成現實。現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已逐步在走向到這點了。據中山先生是同情於被壓迫民衆的，他也信任民衆的將來，如他說：「袁世凱之流，必以爲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而學之去亦曰非專制不可也。嗚呼，牛也尙能教之耕，馬也尙能教之乘，而況於人乎？今更有幼童將欲入塾肄業者，游語其父兄曰，此輩子將論字不可包之入塾讀書也，於理通乎？惟其不論字，故須急於讀書也。現今世界人類已達於進化青年之運，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漸發達，所謂世界潮流不可復應者也。故今須之當共和，精勤華之當入塾讀書也……」(第六章)。

中山先生與辦一切始終親視民衆的人之不同的分野。可惜的，中山先生沒有進進一步；中山先生把辦教育辦責任沒有辦之「實行家」的處理權行，使他們從這種實行中去獲得自己的知識，却歸之太平和國公迷途的「教育」，而這點却好被人利用來作爲對民權的藉口。中山先生這種談話，正是唯心論的思想。正是關於知行分裂的思想，而這點正表現了：有一定歷史界限的某種理論和入民大衆之一定的理解。

從西方近代科學的知識，中山先生看到一定事物的聯系及其進化。如中山先生說：「近世科學之發達，非科學之進步，必同時乘時而有進步，互相資助，彼此乃得以發明。與電學最有密切之關係者為化學，倘化學不進步，則電學必難以發達……」。又如他說：「蓋西文之『物由山來』出現而後，……世界乃知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這些都是中山先生認識論上的進步，這些思想正是和那『信而好古』的傳統陳腐思想相對的。然而，中山先生關於這些思想還是比較散見，而有一定的界限，還是疑的。關於知行孤立的見解，正是說明了這界限。沒有唯物論的歷史主義，對於知行問題是不能獲得真正徹底的解決的。

知行是歷史的東西。關於這點，中山先生在個別地方有其發現，但一般地是對它是陌生的。人類之一定的自然實踐和歷史實踐，決定其一定的自然知識和歷史知識；同時，人類的每一種實踐過程，正由淺處到深處，由低處到高處（由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而在一定時候表現為突變。和實踐相隨的知識亦是如此，在知識過程中所表現的，就是：經過實踐而由對於事物現象的知，到對於事物本質的知。同時，對於事物本質的知，又經過實踐而擴大對於事物現象的知。一般說來，中國先主尚還不能清楚分別出和總結起這種現象的知和本質的知。人類這種發現事物本質之知的過程，誠然是一種複雜的過程，關於這點，中山先生所謂『知難行易』，是發現了一方面的真理。另一方面，誠如歷史所證明的：一種真『知』，需要再經過歷史的考驗，而在『知』獲得以後還要經過知的東西再變成現實的東西，這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把知識的東西再變成現實的東西，是要經過大眾的曲折而艱難的實踐，要經過大眾的奮鬥與犧牲，而絕不是平坦輕便的大道，所以，不少人就會因此而中途說掉了隊伍，甚至反轉為仇敵。關於這點，中國於古語的所謂『知易行難』，也還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

所以，在一定機遇，在一定條件，是『知難行易』，在另一一定機遇，另一一定條件，又是『知易行難』，這是一個辯證的客觀過程，也正需要我們辯證地去理解。中山先生肯定了『知易行難』的傳統偏見，而發現了一方面的真理，這是中國思想上的一大進步。但合理的解決，需要克服一方面的片面性。

，又克服另一方面他片面性，而把問題提到更高的階段——辯證唯物論，把「行」當成根本的知行合一。中山先生在這裏是被歷史和形而上學的二元論所限制了。

X

X

X

X

從對於自然界的了解到對於社會歷史的了解，這是踏進人類認識的另一個更深、更複雜的領域，按照歷史告訴我們，過去許多革命的民主派，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一踏進這領域，就變成唯心論者。在基本上，中山先生也沒有例外。然而中山先生在這裏也有其特點。在某些方面，中山先生關於社會歷史，也表現出其一定程度的二元論之見解。

中山先生關於歷史的了解，散見了個別唯物的因素，這是不可否認的。比如中山先生關於「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之關係，曾說：「實際則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亦相持而後能進步；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孫文學說」第三章）。這含有初步自發的歷史唯物論的因子。又如他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問題，曾把中國古代一種唯物而原始見解加以發揮，而這樣反對一些唯心論的謬見：「若必使我教育之普及、知識之完備，而後始行，則河清無日，坐失良機，殊可惜也；必也治本為先，救窮宜急，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實業發達，民生暢遂，此時則普及教育乃可實行矣」（「孫文學說」第七章）。這就是一種對於歷史之原始的唯物見解：物質生活是根本，而禮義是彼物質生活所決定的。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中，提過所謂「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這本來是抽象的說法，同時中山先生在其對唯物史觀的「批評」中，又正完全表現了中山先生對於馬克思唯物史觀內容的誤解。但他的承認生活是社會中心問題，這點無異是肯定了實際上、表面上、辯相地承認馬克思唯物史觀。固然他並沒有理解：關於「生產及生產之後的產物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恩格斯）這個唯物史觀的根本命題。

中山先生對於歷史上大人物作用和思想發生的估計，在一些地方也是表現有唯物論的因素的。比如他說：「夫聯（指羅盛頓）拿（指拿破崙）二人之於英法之革命，皆非原動者；英之十三州既發難

哲學——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是沒有旁的哲學能了解這樣的過程的。

中山先生把秦漢以來中國真實生活的歷史當成「知易行難」學說的歷史。他說：「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孫文學說」第五章）。中山先生把中國二千年歷史停滯（當然不能說是退步）的祕密，看成由於知易行難的學說「中於人心」，還是把真實生活的歷史倒栽過來，這就是「一般唯心史觀的特徵，同時也是一切形而上學的二元論必走到的結果，其發展就必然到達於這樣的結論：「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孫文學說」自序）。

一般說來，在中山先生宇宙觀各方面二元論的性質中，關於自然界問題的了解，其唯物論的思想分量就較重些（是形而上的，機械論的，而其「元論和形而上學之發展的結論，誠如前面所分析的，却又必然又歸到唯心論），至關於社會歷史問題的了解，其唯心論的思想分量則又佔主要的。

在現代社會問題上，特別可供我們興趣的，是中山先生之批判的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思想。

中山先生曾經有相當長時期周遊和生息在資本主義的歐美和日本。他看到了那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看到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一般人民生活的苦痛。他對於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有一種和傅立葉相彷彿的說法：「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此不平等的世界」（「民報」「肥元節演講」）。所謂「文明社會」的善果，同時產生着惡果另一方面，這就是辯證法的觀點。他把這觀點更在其他地方引述出來，如他說：「法律上文保護資本家與地主之專利，故地主益斷其地權，資本家益斷其利權，而多數之工人雖盡其勞動之能力，反不能生存於社會，階級懸殊」，「生利之工人，則恒受飢寒，而分利之大地主及大資本家，反優遊自在，享社前上無上之幸福，豈非不平之甚耶？」（「社會主義的分析」）這樣，中山先生看見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種種矛盾：一方面，勞動

者流盡血汗，俱不能獲得真正的生存的權利；另一方面，不勞動者則優遊自在，却獲得無上的生存的權利。中山先生從這裏也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自由之有限，他甚至說：「夫美洲之自由，更甚於專利國」（「社會革命是什麼」）。他也看到了在這樣的社會矛盾的前面，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革命是合理的。如他說：「……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孫文學說」第二章）。

中山先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腐爛的時代，正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時代，同時，科學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已成爲大家公認的支配地位，這樣，中山先生不能不深受影響，而關於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問題的個別見解上，比起十九世紀初期西方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有些進步。比如：第一，他看出社會主義革命，他稱爲社會革命，在歐美是不免的；第二，他看出社會主義運動的盛行，乃是文明越發達的結果（他說：「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繁。」——見「世紀」一紀元演講）；不過，一般說來，中山先生並沒有超過馬托邦的界限。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沒有給他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可能。當中山先生提出其主觀社會主義思想的時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很薄弱，無產階級自身的發展不成熟。歷史正是在這樣時候，時常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有如恩格斯所說的：「不成熟的理論，產權和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態，不明朗的階級情況相適應，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既然還很不完，遂的經濟關係之中隱藏着……」。

關於「生產及生產之後的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關於階級鬥爭是一定社會生產方法所必然產生的結果，而社會主義：乃是無產階級聯合一切被剝削的羣衆剝奪資產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私人佔有而轉變爲社會公有。乃是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勞動大眾的統治代替資產階級的統治，並由此達到一切階級界限的消滅——這些規程，沒有可能要求中山先生在當時條件具體理解出來。中山先生會說：夫所謂共產者，凡生利事業，若土地、鐵路、郵政、電氣、礦產、森林皆爲國有。共產者，即人在社會之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居一家，各盡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礙，不相競爭，郵治之極，政府處於無爲之地位，而屬於消滅之途」（「社會主義的分析」）。

這地很遊似的了，但另一方面，從中山先生另外的許多見解中，他又還沒有更明確發現到大生產乃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可能的基礎和基礎，中山先生關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時常表現在關於分配的問題。如他說：「我人知社會貧困，當求生產發達，何生產既多，而社會反致貧困乎？其中原因，實由於生產分配之不適當耳。……故根本解決有不能不從分配上着手也」（同上）。根據一定意義上看來，這種分配的觀點是反映了小生產者的觀點。從無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問題，在基本上則是生產和生產工具屬誰的問題，分配問題的解決，是和這問題相適應而獲得解決的。

在第一個時期，中山先生認為「平均地權」是使中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稱之為「社會革命」。是的，這是歷史上的一種「社會革命」，但按其社會性質說來，這只是反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社會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革命」。中山先生的缺點，是把這兩種革命混同起來，同時，就誤認為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乃是一次的革命。不幸的，這點在後來却被那些奸人如葉青之流所利用、所惡解，來作為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藉口了。「平均地權」——這詞是革命的，因為它是反對封建的；然而如把它就當成社會主義，這却又是保守的。這就是中山先生在這問題上的兩方面性質。這種保守，在這裏是反映了小生產者——特別是農民對於小生產的保守。小生產者在大資本面前，擔心於自己小生產的沒落，他們恐怕大資本的威脅，可能吞沒他們，可能給他們帶來貧困、破產和飢餓（這些正如中山先生在西方所看到了的），他們把大資本當成敵人，他們夢想能够在反對封建剝削之後，保持他們小生產的美夢生活，他們把這種美夢，當成社會主義。但是在客觀上，反對封建剝削之後，在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統治下面，却不免要迅速生長資本主義，一部份小生產者、農民會提升為剝削人的資本家，一部份小生產者、農民會降落而為被壓迫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這點中山先生在事實上也是曾經見過的：如民國元年，他就這樣說過：「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也即資本主義——作者）勃興，蓋可預卜……」（「實行社會革命之必要」）。照科學社會主義看來，農民和一般小生產者如何能在反對封建剝削之後，不至再落到資本的剝削呢？這

裏唯一的可能，就是：再跟隨無產階級前進，走過一個革命的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走上另一個革命的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由無產階級做主的國家給以一切政治的財政的幫助，使他們走上經濟生產和市場擴張的道路，與大工業中的工人階級肩並肩地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才能使他們獲得真正優美富裕的生活，這才有社會主義。中山先生想使廣大農民和一般小生產者不再落入大資本的剝削，這意思好的，但要真正能解決這問題，不能是依賴主觀的願望，而只能依賴於無產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以及無產階級聯合和領導一切勞苦羣衆的艱苦鬥爭。這點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業已實現了。要把中山先生偉大的主觀願望的東西變成客觀現實的東西，這正是中國無產階級的責任。

在後一個時期，中山先生更具體地添上「節制資本」的原則。關於這思想，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如他在「社會主義的分析」的演講所說過的：「凡屬於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爲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漁利」。又如他在「論民主主義」的演講（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所說過的：「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但明白提出作爲綱領之一，即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

中山先生是熱烈希望中國工業化的人，這點特別表現於他的「實業計劃」之著作。在這裏，一方面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希望。另一方面，作爲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來看，他們一方面恐怖大資本吞併的威脅；另一方面又認爲沒有近代的工業化不足以消滅國民經濟的落後，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思想，認爲大經營的國有，是一種好辦法，可以使「小民各得其所，自食其力」（「社會主義的分析」）。可以使人民「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民生主義」第二講）。這正是反映了廣大小生產者的希望，表現了小生產者關於平均財產的夢想。

本來不能談一般的、抽象的國有，而是要具體看那一樣國家的國有，像「俾士麥式」的國有，不但沒有使人民「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相反，正促成了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正促成了「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之矛盾的發展，這是已證明的真實歷史，在別地方我們也說得不少。而且，在任何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下，把一切有關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利益的一定大工業收歸國有，其重要

上的規律，都是走上這樣的命運。不但如此，還有一種國有比起一般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有，更要「驚脚」的，如滿清專制政府的國有，那種國有事實上正是要製造一種維持封建官僚地主和外國實利剝削廣大人民之統治制度的新形式。所以，中山先生說：「……雖然，國有之策，滿清以之亡國，吾人所反對者也；然則向之反對鐵路國有者，豈與本政綱抵觸者乎？是不然。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滿清政府之所謂國有，其實較資本家為尤甚。故本會政綱之次序，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也。」（「論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在遺藁是分別了「專制制度」的國有和「民權主義」的國有的。不過，按照一定的條件，像普通的、舊的民權主義（即「舊民主主義」）制度下的國有，那只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是別的。因為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之發展，是會使一切小生產者美麗的希望化為冰消雲散的。可使這種「國有」含有新的特殊意義的，必當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的國有。

馬克思主義者——科學社會主義者是根據一定具體的歷史條件來看問題的。在落後國家中，是當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要被具體的歷史所決定。比如，一八八二年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俄文版序言，對於當時俄國農民公社的問題，曾經這樣指出：

「……俄國的農民公社，這種原始土地共有的已經非常解體了的形態，能够直接進到土地所有底較高的共產主義的形態嗎？或者它還必須預先經過西方歷史發展所經歷的同樣的解體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可能的，唯一的回答是：如果俄國革命成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末，現在的俄國公社土地制度可以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自然地，這個科學的了解和俄國民粹派烏托邦的了解，是不相同的。俄國民粹派把俄國農民當成天生的共產主義者，而科學社會主義者却是認為當時俄國農民公社如果變成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而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只有在「俄國革命成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條件下，那才是可能的。

列寧在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著名演說中，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的世界新時代，對於落後國家，則更明白和具體地指出：

「我們的設問：國民經濟之資本主義階段的發展，對於戰爭後現在的落後的民族（正在解放的而且進步的）是否不可避免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定的。倘若革命勝利而無產階級在落後的民族中實行有系統的宣傳，而蘇維埃國家用所有的力量以幫助，則資本主義階段的發展對於落後的民族是不可避免的意見，當然也是錯誤的。……落後的國家在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能轉入（代表會議）的制度，經過一定的發展的階段到共產主義，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落後國家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份，這是和舊民主主義有別的新民主主義。關於這問題，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內具體地發揮了科學社會主義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論，把這問題明確地解決了。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權——新三民主義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共和國，固然沒有排斥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這是含有使中國可以走上非資本主義前途的一種可能。在這種政權之下，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節制資本」和「國營實業」，才含有新的意義。關於這種方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希望與一切能遵守孫中山先生革命遺教的人們來共同努力的。

一直到他逝世時候，中山先生並沒有成為科學社會主義者。然而，他晚年革命思想發展最高的時候，正是和科學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同合作的時候，這種合作正是使中山先生思想的發展和現實更接近起來，這種合作，在整個世界的新歷史條件下，正是使中山先生思想的發展含有新的意義。

誠然，中山先生是主觀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是被一定的歷史條件所限制，而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思想是反映小資產階級的。根據一定程度來說，主觀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在歷史上，却正成為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序幕；主觀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去的

一尚必經階段，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基礎，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一到了這個階級的手裏，便不是美麗的幻想，而是真正現實可能的了。

法國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哲學家與後來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提出全人類的解放，都自稱是全民的護士，都否認自己是一定階級的代表。這兩種人的思想在中山先生這裏却結合得如此特別和巧妙。在資本與勞動分化還沒有很大明顯，無產階級既幼稚，資產階級也幼稚的時候，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或政治代表，就時常以好像是超階級的姿態出現，否認自己是一定階級的代表。其次，當階級分化未明顯的條件下和小資產階級在一定社會中的中間地位，有些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時常以好像是超階級的代表者出現，既不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也不承認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可是，**思想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一種思想在客觀上都是獲得自己一定的社會地位的，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或主觀的社會主義思想也是如此。

X

X

X

X

總括看來，中山先生的宇宙觀是二元論的，這種二元論反映了過去一定時期中中國民族覺醒之奮鬥與不足的兩方面，反映了**一定時期中擴大小生羣**（小資產階級）之革命與保守的兩方面，而且也反映了**一定時期中資產階級對於一定革命行動之精神與消極的兩方面**；這些錯綜複雜的各方面，在近代中國的一定歷史條件下，竟能在**一定思想的位勢**（中山先生的思想中集合地表現出來，在守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大工業落後，經濟極不發達，力量不大的資產階級（指中等資產階級、民族工業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間時常沒有不可逾越的極嚴格的界限，因而也使中山先生有成為兩種代表交錯的可能，並使中山先生思想表現出各種不同的二元論。把這種二元論引用於革命問題的實際，就表現有原則與原則的一定矛盾，**原則與方法的**一定矛盾（以此爲主），也有**方法與方法**的一定矛盾；這些關於原則與方法的各種交錯矛盾，從一定方面看，可以是反映過去中國革命發展的強點與弱點的兩方面，從另一方面看，又可以**是反映小資產階級的強點與弱點**的兩方面，再從另一方面看，文

可以是在階級鬥爭階級的階級與階級的階級。而其本質，實由於他的思想之矛盾的焦點，就是：小資產階級之革命的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之改良的自由主義的矛盾。

總括看來，中山先生的思想與學說，有屬於現在的東西，有屬於過去的東西，也有屬於將來的東西。現在的東西，是他的關於反帝、反封建、反傳統教條的民族民主思想，是他的關於民族民主革命的急進綱領，將來在東西，是他的關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於工人階級的同情；過去的東西，是他的關於反映過去革命的弱點和無產階級未成熟的時代之政策的思想（這種反映，一方面在民主革命的方法上——主要在他規定三大政策以前——表現出其某些消極的成份；另一方面，在一般歷史問題上，在社會主義問題上，表現出關於階級社會中階級分化及其互相間的鬥爭——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的獨立歷史鬥爭——之問題的無理解）。關於他屬於現在的東西，正是「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正是我們全國人民目前所奮鬥而爭取實現的東西。關於他屬於將來的東西，中國無產階級加以接受下來，而根據歷史的規律，根據科學社會主義，加以整理，作為教育羣衆的材料。至關於他屬於過去的東西，則正由於革命的進展，特別是經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以來的人民革命覺悟，正由於無產階級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人民的首領及其百折不撓的鬥爭，更被證明是完全保守和消極的東西了。

三

在中山先生逝世不久的時候，即有一部份人對於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加以修改，特別是對於中山先生晚年革命綱領的三大政策，提出了異議，因為要把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綱領變成抽象的不能實現的東西。首先就要抽去他的革命方法。

如我們在上面所知道的，中山先生和康有為兩條路線的分歧，便是革命與反對革命兩條路線的分歧，同時也便是關於民衆階級的分歧，修改中山先生革命主義的人，也正是在這些問題上表現了和中

由先生革命主義的基本分歧。這些修改中山先生革命主義的人，事實上是由中山先生的路綫回復到舊有的路綫去了。這些人雖仍自名爲中山先生的信徒，但實質上却成了康有爲的信徒了。

中山先生的革命基本思想是立脚於「革命」，但修改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人，——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却認爲中山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爲什麼他們要這樣說呢？因爲：「中庸」是這樣教過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則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這也就是：要你「不要革命」（放棄「行險」），要你安分守己（「居易」）和聽天由命（「俟命」），要你「好古，否則，就要使你的身家受到災禍」。把中山先生思想完全附會於儒家傳統的「中庸之道」，把中山先生變成孔子的正統門徒，這是把中山先生革命化呢？還是相反？事情是很明白的了。

中山先生革命的基本思想是立脚於「喚起民衆」。中山先生把民衆看成革命的動力，特別是他論晚年更明白了這道理；如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指出的：「……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爲後盾者，實爲多數之民衆。」「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又如在「北上宣言」所指出的：「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散，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但是，修改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人，却認爲中山先生的思想，是立脚於一種所謂「誠」——一種神祕的心理。把「誠」當成所謂「革命」的動力，而這一「誠」是飄蕩於空際，不可捉摸。（參看戴季陶先生「民生哲學系統表」）不是靠「人」去革命，而是靠「誠」去「革命」，離開了「人」（民衆），這還有什麼革命呢？這在實質上，只能是革命的反面了。

由於從革命和民衆的方面來解釋中山先生的思想，所以在中山先生思想中的那些和革命與民衆相聯絡的唯物論思想，就被排斥消除了。一部份人否認中山先生關於「物質爲體」的見解，於是把「真實的宇宙」解釋爲「人類主觀意識中之宇宙」，直至解釋爲「神的境地」。一部份人否認中山先生關於

於「知識與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的見解，於是把知識變成「永遠是存儲的東藏」，以致「人」是「知而極致」（又所謂「知極」），而且除此以外，「神的境地」則還是不可知的。（參考「唯生論」）一部份人否認中山先生關於「林林總總」的民衆結構的見解，於是把行當成「成」去解釋，以為他只是少數高立於民衆之上，而駕御民衆的人或集團（一個人或一個黨）之事情。一部份人否認中山先生馬克思主義思想中關於解決人民羣衆衣食住行問題的某些唯物了解的因素，把人民羣衆客觀的具體生活問題擱置不談，於是簡單地把民衆當成極抽象的「人類求生存的意思」或「人類求生存的天性」的純粹主義去解釋。

由於從革命和民衆對反面來解釋中山先生的思想，所以就中山先生反帝的民族思想解釋為總帝的反民族思想，所以就中山先生主張「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北上宣言」）的民族思想解釋為取消一切人民自由的「一個黨一個主義」的反民族思想，所以就中山先生反對剝削制度和同情勞苦羣衆的民生思想解釋為維護剝削制度和壓迫勞苦羣衆的反民生思想。

由於從革命和民衆的反面來解釋中山先生的思想，所以就中山先生那部份反映過去革命弱點和無產階級未成熟時代的思想和政策——這消極的方面，加以盡量而、無限的利用和誇大，他們以為這樣藉中山先生的名義來反對革命阻止革命，是他們最巧妙的方法之一種。

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被官已最狹隘的階級自私自利所限制，不願實行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三大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竊取中山先生「超階級」的消極觀點，裝一種模樣，宣稱他們也是超階級的。他們以「國家」的名義宣稱他們不但不是「階級」的代表，而且還是全「民族」的代表；他們以「總理信徒」的名義宣稱他們不但不是三民主義的唯一「忠實信徒」，而且還只有他們才能實行「社會主義」；他們集中全國人民的財富於自己少數之手，甚至有的份子過的極其淫靡腐敗生活，而全國人民生活則陷於飢寒的塗炭；但他們却藉口中山先生關於「大貧小貧」的過時說法，宣稱中國並沒有什麼富人窮人，而他們也是屬於「貧人」之一類。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緊急關頭，以大資產階級為首的代表們實行擱置了中山先生三大政

策，完全規定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實行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專政。中山先生的革命友人，被當成敵人，中山先生的革命敵人，被當成友人。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無數的革命家，無數的革命工農和進步知識份子，這一切是中山先生逝世前後所認為中國之唯一希望的民族精華，竟受了歷史上空前的屠殺。這段歷史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悲慘最痛苦的一段，而永遠是中國人民所要深長回憶的。革命因此受了悲慘的失敗，國內情勢來了一個黑暗的大逆轉，並因此招來了民族空前的災難。

日寇打進了祖國的腹地和全國的民意所趨，迫得一部份人們要改變自己的態度（因為不改變，連他們自己亦不得生存）；然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不願意恢復中山先生全部的革命三民主義和全部的革命三大政策。那些少數人只要恢復一民主義（反日的民族主義），甚至限於半民主義（他們一方面抗日，另一方面又想中途投降。那些少數人不顧中山先生和朱執信先生在「中國存亡問題」文中關於反對英帝國主義犧牲弱小的陰謀之深刻的教訓，而把英帝國主義當成好像自己的主人，惟英帝國主義的馬首是瞻）。那些少數人還是藉口中山先生的「建國三時期」（現在中山先生「北上宣言」業已改變的），而繼續進行取消任何民主自由和思想自由，強調革命的下賤叛徒葉青之流所「發明」的所謂「一個黨一個主義」，以繼續其實質上的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專政，同時，在人民要求前面，則玩弄一些晚清「立憲」的騙品。那些少數人還是不願意進行任何低級的民生改良，並且藉口中山先生的「節制資本」而以「國家統制」的名義，實行大發其私人的壟斷權（他們忘記了中山先生所說的沒有民權主義的政府，共所謂「國有」，「其害實較少數資本家為尤甚」）。他們還是從事壓迫民衆，而認為從事民衆運動的革命者是「別有用意」，是「利用民衆」。雖則在武漢失守以前，他們在政治上情形是比較好些，是主張抗戰，傾向團結，但在武漢失守以後，他們傾向投降的法動搖，使得敵治上各種情形又壞下來，特別可痛心的，是那些少數人還夢寐不忘於反共的分裂運動，以戕害抗戰。在對外戰爭中製造對內的戰爭，這是大資產階級代表們自殺的政策，陰謀投降的政策，這政策正是日寇、汪派、托派和帝國主義的國際陰謀所直接鼓勵和煽動的。

一切革命與非革命的鬥爭，其中心關鍵，是關於革命三民主義與否的中心關鍵，是關於民衆的問題，是關於

於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問題。一切革命的人們，一切擁護革命三民主義的人們，不能不站在民衆方面，不能不站在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方面；反之，就必會站在反對民衆的方面，必會站在反三大政策方面。根據這點，我們可以測量和判斷一切人，可以測量和判斷一切發生的問題之是非，而且也可以測量和判斷一些人們的歷史之必然的趨向。現在所有投降反共欺壓民衆的瘋狂盲目的東西，特別如大資產階級代表們所掩護而爲日寇服務的葉青之流的瘋狂盲目的濫調，正是在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上面，闡釋了中山先生的思想，以適應他們反民族、反人民、反革命三民主義、反共產主義的最下賤之見的。

割裂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人，是走着極危險的道路的。往這個路上走的黨派，必然會埋葬起全部三民主義。如不及早回轉，則就必會由一民主義走到半民主義，並由半民主義走到漢奸主義。如不及早回轉，則一面聯蘇而又一面反蘇，一面聯共而又一面反共、反進步、反農工，這種兩面派的政策，其發展結果就必會走上完全反蘇、反共、反農工，販賣民族，聯合一切民族的敵人，走上完全漢奸的政策。殷鑑不遠，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代表（親日派的大資產階級）汪精衛就是這樣走法的。汪精衛也標榜「三民主義」，但他所標榜的「三民主義」，却是假三民主義，是完全的漢奸主義。標榜「三民主義」，而實際完全背叛三民主義，這是歷史上最無情的揭穿。那些還標榜「三民主義」，而還沒有完全墮落到汪精衛的漢奸主義泥坑中的人們，及早回轉確是必要的了。是由一民主義或半民主義回轉到完全的三民主義呢？還是由一民主義或半民主義走向漢奸主義？是由半聯蘇、半反共、半聯共半反共的政策走到完全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還是由半聯蘇半反共、半聯共半反共的政策，走到完全反蘇反共反農工漢奸政策？這些歧路是需要嚴重考慮決擇的了。

自然，有蹂躪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人，同時也有真正繼承中山先生革命傳統的人：一種是徹底的民族革命家，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而在主觀上真正同情於共產主義的；這部份以中山先生夫人宋慶齡女士爲代表，他們在一九二七年後反革命的高潮中，始終不放棄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之革命的旗幟，而和那反革命的偽三民主義對立起來，不妥協，不投降，不隨波逐流，不受任何威脅利誘，

仍然保存了中山先生革命的正軌。一種則是中國共產黨人。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政黨。這個黨的宇宙觀和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黨的最後目的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和中國其他階級的或革命的政黨有基本分別的。這個政黨是在中國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形成起來的。這個階級有絕大的政治覺悟性和團結性；除了失掉鎖鏈這東西，他們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失掉的；他們沒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牽掛，因為一切壓迫、剝削、掠奪、欺騙和偏私，都是和他們本身的利益絕對衝突的。因此，他們是絕頂革命的階級，而其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也正是絕頂革命的政黨。這個階級及其政黨在政治上、在組織上對於其他的階級和政黨是獨立的，在思想上、在理論上對於其他的階級和政黨也是獨立的，因為其他階級都不能有這個階級所特有的歷史特點。如果這個階級及其政黨在政治上、在組織上、在思想上、在理論上不能對於其他的階級和政黨保存其獨立性，那末，他們就不能負起和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在另一方面，這個階級從其澈底反對一切壓迫與剝削的立場上，從其完全沒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立場上，從其最終目的在建立無產階級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立場上，則他們又是全體人民的真正代表者，又是民族利益最澈底的代表者。這點正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那些份子相反。目前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利用中山先生思想的某種消極成分，而否認階級的存在，否認自己是一個剝削的階級，同時，如上面所說的，還把自己這個剝削的階級當成民族或全體人民的代表（他們有個奇怪的教條：你們反對我，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對民族），而實質上，却和全體人民全民族的真實利益相反對；無產階級承認階級社會中階級的存在，並強調自己階級的獨立性和純潔性，同時，指出自己是最後的階級，而其奮鬥的目標是民族的最後解放和社會的最後解放，是階級的消滅和民族仇恨的消滅，他們階級的利益和全體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和民族的真正利益最後利益相一致，所以，只有他們是全體人民的真正代表，又是民族利益的最澈底的代表。

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政治舞台上出現的時候，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而且正是處在民族萬方多難的時候，因此，對於這種革命負有獨特重大的政治責任，中國共產黨一成立的時候，便

指出：自己在這方面的不容卸責的重大責任，根據自己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規定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設完全最徹底的綱領，作為自己鬥爭的最低綱領，而其最高綱領，則為關於社會主義變革的綱領。中共這最底層綱領雖則與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政綱，在廣度和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民族、主革命的基本原則上却是相同的（即要求民族獨立解放——民族主義，主張實現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民權政治——民權主義，反對封建的土地剝削制度和限制大資產階級的專制——民生主義），這裏就形成了中共與中山先生及其真實的革命信徒一種合作的政治基礎，並且在這政治基礎上形成了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是正在這種合作時候的歷史文獻，而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勝利，則就是這種合作的成績。在一九二七年這種合作不幸被人拋棄了以後，中國共產黨人在千辛萬苦中繼續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事業，繼續實行自己的政綱於革命的實際，同時，也正是在實際上繼承了中山先生革命原則的精華，他們堅持反帝運動；他們在許多地區內，實行了使人民大眾自己起來管理自己的政事，而且管理得比中國任何時代或任何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專政地方的政府好過千百萬倍；他們真正使農民得到了耕者有其田，掃除了封建殘酷的剝削，並使大資本不得隨便操縱人民的生計。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具體革命階段上的運用，而且，這不也正是中山先生革命三大原則在中國第一次最徹底地見之實際嗎？在七七事變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時期內，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國共產黨人公開宣言：「三民主義為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人最真正地實現自己的諾言和主張，而在他們能力所及，那裏就真正把三民主義實行起來。可是因此，就更遭受了日寇漢奸——汪派、托派的仇恨，而且也遭受了頑固派的仇恨。頑固派對歷史對民眾開了大玩笑；他們的邏輯是：實行三民主義的人是反對三民主義，是破壞統一；而拒絕實行三民主義的才是「信仰」三民主義，才是主張國家統一。他們把歷史邏輯顛倒起來了。

頑固派之意圖顯而易見，散佈謠言說，中國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這就是放棄共產主義，這真是荒謬無稽，放棄自己的任何政綱才妥協，事實絕不如此。

第一、「共產主義是無階級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與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國共產黨人把三民主義看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看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定政綱，這既不是取消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又不是取消共產主義。而關於各個革命階段政綱，只要有中國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存在，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共產主義關於各個革命階段的政綱，便會出現，便會存在，並在一定時候會變成完全的現實，「取消」從那裏說起？

第二、作爲一定革命綱領看待的三民主義，和作爲一定理論或學說看待的三民主義（應作爲獨特

的思想系統看待的三民主義），是有其分別的。顯然的，在各國革命史中，各革命階級在一定時期內，可以有共同的革命綱領，爲各階級合作、同盟、共同政治行動的基礎，但是，各階級的宇宙觀，可以有相同，歷史態度不同，問題理解不同，對於一定共同革命綱領的實現方法（革命方法），在一定時候也可以有相同，在另一時候也會有不同，而對於革命的將來，更必然會有別。這樣，各階級間雖則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有共同的革命綱領，但決不能就有同一樣性理論或學說，而對於合作的共同綱領，也就會有不同的理論的解釋或學說。這種理論上變說上拘拘刻刻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因爲理論上說上不能苟同，而且還必嚴格地有別，就以爲在任何革命時候（比如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候），不能根據一定條件和其他階級結成共同的政治行動和共同的政治綱領，這當然又是錯誤的。（這點，列寧在其第一部偉大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進行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中，就已給了這樣的啟示：「……當馬克思主義把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完全否定了的時候，對於他們綱領裏的民主主義，不但不要加以拋棄，而且相反的，要求更切實地去強調它」。列寧舉的例子，就是當時俄國的綱領）。

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承認三民主義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是，我們對於這綱領的理論了解，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而不是對於「對於科學共同綱領的理論了解，我們將其單了吸收了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方面的精華，但是，如我們不是根據科學共同綱領的理論，我們就無法把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精華加以最正確的處理，並在歷史中最恰當的地

位來了解它。

第三、三民主義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定政綱，我們要把它的一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關心地推測出來，保護起來，並發展起來。如要把這政綱作爲更完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綱，我們就還應當根據歷史的發展和歷史的需要，進一步地去發展它、補足他，同時還應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新的歷史力量，去補充過去所未有的革命方法，而由過去實現它。中山先生熱烈同情於工人階級，並且他演講中是表現了同意工作八小時制度的（這是民主革命的政綱，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但沒有在政綱明白規定出來，中共則在自己成立時候的民主革命政綱中，便已規定了。中山先生晚年規定了三大政綱作爲三民主義的革命方法，這是使三民主義獲得可能實現的唯一基礎，但他因爲歷史所限，關於民主政治和耕者有其田的實施方法，還有所不足，還有消極的成分，而中共則在這些問題上根據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規定了最完備的平民革命、土地革命的方法和道路了。

第四、中山先生主觀上對於資本主義剝削和咒詛的，對於社會主義是同情的，這當然是人類一種可貴的精神遺產。但是，如大家所知道的，如我們所指出的，在主觀上同情社會主義，客觀上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方法和道路，這並不是一件事情。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共產主義就是能夠從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去發現人類到共產主義社會去的必然規律，指出人類這個鬥爭的必然方法和道路，指出這個共產主義社會的引路人——無產階級，而在中國，則更根據中國歷史的發展和具體的條件，指出了和規定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必然的進程和具體的方法和道路。主觀社會主義——這是無產階級尚未發展的反映；科學社會主義——這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成熟的反映。科學共產主義在中國，就是在於依靠無產階級這個社會基礎、而聯合廣大勞動羣衆，經過一定奮鬥的階段，而把我們歷史上先哲和中山先生的主觀希望變成爲實現。這點正如列寧在俄國對於托爾斯泰所說的：「俄國無產階級將向羣衆解釋托爾斯泰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不是在使羣衆只是向資本主義和金錢勢力發出種種的咒詛，而是在使他們在自己生活和自己的鬥爭底每個步驟上、利用資本主義底技術的和社會的一些成就，學習怎樣組合成一支部隊，去推翻資本主義和創建新

那沒有窮人、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論托爾斯泰之死」)。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這樣寫道：「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底區別，是與歷史的進步道相離的。隨着階級鬥爭的發展及其採取更確定形式的程度，這種超越於階級鬥爭之上的幻想的幻圖，以及幻想地拒絕階級鬥爭的態度，便同樣地失掉任何實際的價值與任何理論的根據。所以，雖然這些學說底創造者，在許多方面是革命的，可是，他的學生却每次總是形成反動的宗派。他們和無產階級的歷史，總是固執着老師們的陳舊觀點，因此，他們激底地企圖重復階級鬥爭，調解階級矛盾……」這個深刻的思想是在九十年前寫的，而對於今天的中國仍有其科學的「靈驗性」。許多自命為中山先生「學生」的，不但在歷史前進中、固執那些反映時代過去落後的成分，而且還無限地發展和誇大這些成分，以反對歷史的前進，並在實際上反對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原則及其三大政策，而並不限於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科學思想，這是他們的一種特點。

據，關於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係，如把上面的意思總括來說，也就是：在社會內容這方面來說，科學共產主義的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社會基礎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在理論的基礎這方面來說，科學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則是一元論，並且在本質上是形而上學的(誠然有個別辯證法的觀點，而其一元論的政後發展却會流於唯心論。在整個的學說這方面來說，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前理論，乃是關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科學，是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剝削解放出來，而進而擺脫資本奴役，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而中山先生的理論，主要的則是一種急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學說，以及三民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理想。在革命的政綱這方面來說，科學共產主義在中國有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而實踐前者是得到實踐者；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這政綱在基本政治原則上與中共的民族民主革命政綱相同，但不完全相同，而對於這種政綱的理論解釋，則由宇宙觀和理論基礎的不同，當然就不同的。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方針這方面來說，科學共產主義歸於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方法是根據

請教讀者的平日的，並能根據各種具體的歷史條件規定各國具體的革命方法，並且只有這樣的方法，才可以保證這種革命能成功的實現。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也是真正的平民式的革命方法。他在其地一方面，特別是關於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雖存有革命原則與革命方法的骨幹，這樣骨幹，只有科學共產主義能把它克服起來。在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方面來說，科學共產主義是依其於真正現實的基礎——無產階級，依其於真正現實的革命方法——無產階級的直接成為社會的主人；中山先生則是反映一種小生產者均齒的思想，根據這些方面，說明了什麼呢？還是說明了：在中國，如果沒有科學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政黨，則不但共產主義在中國實現能是空話，而且真正革命三民主義的實現也是不可能的。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所謂「一個黨一個主義」，是要取消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然而歷史却證明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之必須的存在和發展。中國如要對免亡國而獲得真正獨立，由科學共產主義而獲得真正獨立，中國如要建立一種真正沒有窮人、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如何能沒有共產黨呢？如何能沒有共產主義呢？要取消它們，這就等於不要中國、不要中國將來的歷史，這對於正在挺身而起的偉大民族，是可能的嗎？是容許的嗎？這對於這偉大的民族不是太殘酷的麼？有如日寇的妄想吞滅抗戰的中國嗎？凡是真正愛國的人，只有與共產黨合作到底，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在死後，一方面被人閹割了革命靈魂；另一方面，却又被人當成神明或泥菩薩來供奉，這都是些革命家有的遭遇，不幸得很，中山先生死後，竟也有了這樣的遭遇。把革命三民主義完全拋棄——這是汪精衛漢奸主義的假三民主義；把三民主義埋葬着半截——這就是現在有一種人的半真半假的「三民主義」；（一）民主主義或半民主主義。這種假三民主義及半真半假的三民主義和真三民主義（即革命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翻立起來，被世間形成極大的門戶。拜日寇領袖崇拜假三民主義——使中國滅亡；不要民衆和動搖抗戰與投降之間的半真半假的三民主義——使中國有滅亡的危險；三大政策的真三民主義——則在「求建國之自由平等」（「總理遺囑」）；何去何從，這就

是極明顯的了。中國民族黨列寧主義者願意和一切中山先生的屬三民主義得使團結起來，從事恢復國
民第一次大會宣言的全部三民主義和中山先生的全部三大政策，從事貫徹中國的工作，這就是
對於孫中山先生最尊貴的紀念，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不朽！

一九四〇年七月

中國民族黨列寧主義者

二 三民主義的歷史根源

鴉片戰爭要算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起點。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英國大砲消滅了皇帝的權力，迫令『天朝』與外洋接觸。與外洋隔絕，這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當這種隔絕情形，在英國強迫之下，而歸於消滅的時候，便必然要發生腐爛，正如小心保存在緊密封閉的棺材內的木乃伊一樣，只要與外界新鮮空氣一接觸，便一定要朽爛」（『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

從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開始了新的分解，中國中古式的封建社會即行初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態轉化。從此新的矛盾在中國社會中潛滋、醞釀和生長；而新的矛盾又和舊的矛盾交叉地發展起來。

近代中國複雜地交錯着民族的矛盾和階級的矛盾。

關於民族矛盾這一類，包括着兩種矛盾的存在：

第一，是中國諸民族與資本主義壓迫民族——帝國主義者的矛盾，這是鴉片戰爭後中國民族問題上主要的矛盾，這種矛盾，正說明了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度，而在「九一八」後，有許多國土已經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種矛盾，從「九一八」到蘆溝橋事件，已成了中國諸民族最後死活的矛盾。中國諸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矛盾，已成了這種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國諸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矛盾，在近代中國的各種矛盾中，已成了高於一切的矛盾。這中國民族的內部與帝國主義者的矛盾的，亦無階級、農民、廣大城市小資產階級、大部份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有足跡到過各階級，有一定數量的地主，而且由於中國本來是許多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所以，那依靠某一個或某集團帝國主義的買辦金融大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大地主在一定時機也可以參加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的鬥爭（例

如七七事變後英美派金融大資產階級和某些大地主的參加抗日戰爭），但在另一個時機他們又可以反轉而投靠過去所反對過的敵人。

第二，除了這種對外的矛盾以外，還有國內民族的矛盾，如滿族與漢、蒙、回、苗等；各民族的矛盾（這是表現在辛亥革命前），以及滿族與蒙、回、苗等；各民族的矛盾（這在辛亥革命後特別顯著）。這些國內民族的矛盾是組成了現代中國民族問題的部份，雖則是次要的部份。

關於階級矛盾這一類，包括着四種矛盾的存在：

第一，是中國農民與地主（主要是大地主）以及買辦金融家的矛盾。中國農民與地主的這個矛盾在中國封建社會已存在了幾千年，而且由這個矛盾所爆發的農民戰爭，在歷史上已變換了多少朝代。農民是中國過去每個封建皇帝朝代的掘墓人，是中國數千年中歷史發展真實的動力。農民與地主的這個矛盾，是鴉片戰爭前中國封建社會關係基本的矛盾。農民與地主的這個矛盾，在鴉片戰爭後，但沒有因爲其他新的矛盾的發現和發展而消除，而且新的矛盾越發把這個矛盾深刻地暴露出來，而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經濟上成了統治的地位，它們扶持了封建的勢力，並發展了買辦的金融勢力。從中聯綿不斷的各方面去吸取農民的血汗，使這個矛盾就發複雜化起來。農民與大地主及買辦金融家的這個矛盾和對外的民族矛盾共同構成爲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的基本內容。其實，嚴格地說來，我們的「民族問題」基礎，它的內部的實際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爲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的支持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一個強大的民族運動（斯大林：「論南斯拉夫民族問題」）。但是，這裏所指的農民問題並不是土地問題。「這並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爲這兩樣東西是不同的（斯大林：同上）。」固然，在一定具體的歷史條件下，農民問題即是土地問題。農民是我們民族的最大多數，任何革命事業，如果拋開他們，如果不聯合他們，將一事無成。

第二，是中國工業資產階級（主要是中等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官僚、軍閥及買辦金融家的矛盾。四方資本主義宗主國在中國侵略，却又推進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及其他相等的發展。中國國

新舊階級，像那種共產黨在蘇俄所出的買賣變化，主權的資產者，但是，這階級大抵仍爲自國企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在這些階級的機遇上，在某種程度上，能參加民族革命的運動，而且，對於封建的貴族、官僚、軍閥買辦金融家的政治制度，也能進行一定程度的反抗，他們對外傾向主張民族獨立，雖則在政黨和鬥爭態度上，會時常表現猶豫和怯懦，他們對內不是主張民族革命，不是主張革命的民主，他們所希望的是改良立憲的國民革命，即使如此，他們在革命民主派與頑固派的鬥爭中，却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第五，是廣大城市小資產階級、大部份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與革命團體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高利貸者和大商業行幫的矛盾。因爲後者和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相聯絡，對他們加以悲慘的掠奪和壓迫，使他們極大貧困化，而經常受到破產、失業和流離失所的災難或危險。在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落後的國家中，這小資產階級是有相當大數量的羣衆，而時常表現過很大的革命性，特別是在中知識份子在中國革命中盡過很大的或先鋒的作用。不過上層小資產階級則是帶有根本的階級性的。第四，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封建剝削者及資產階級的矛盾。資本主義在中國萌芽及其發展，農工資產階級也產生了無產者，並且因爲帝國主義者利用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境內建立各種壟斷，而壟斷壘壘企業內做工的，又是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工人，所以，一般說來，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是發展着，其中農工資產階級者來得強大。中國無產者一方面在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要進行鬥爭去擺脫經濟在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大資本家的工廠中之原始的、野蠻的、半封建的資本主義剝削方法（如可抽的延遲工作時間，減低工資等），要爭取初步的人類待遇；另一方面則依賴其如可怕的政治覺悟和團結力量，而成爲全中國國民族向帝國主義者鬥爭的首領，成爲中國人民、中國一切被壓迫的大衆向帝國主義者和中古制度鬥爭的首領。它要貫徹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並關心於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將來。從上述的矛盾，產生着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三大潮流：第一，是民族的運動；第二，是民主的運動；第三，是農民的運動；第四，是工人的運動。正如各種矛盾的交錯一樣，這三大潮流同樣地是交錯着的，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則是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與民主的、農民的革命運動兩大潮流的結合。上述的

種矛盾，恰能明白地表明了：近代中國人民鬥爭含有兩種歷史內容的過程：

一種歷史內容的過程，是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剝削制度的鬥爭，這種鬥爭對外是民族革命，對內是民主革命；在這種對外的民族鬥爭和對內的民主鬥爭的過程中，按照具體的條件，革命的鋒芒而針對着的主要敵人各有不同，階級關係的調度也有不同，但是，這兩種鬥爭的性質却是一樣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如毛澤東同志所解釋了的，這種革命在現在的中國已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而非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因為中國革命發生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成為消滅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的一部。因為這革命的政權將是無產階級參加在內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而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因為這革命在反帝鬥爭中，要消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經濟基礎，要沒收帝國主義漢奸和反革命的企業。因為這革命是將使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獲得土地，將限制大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壟斷專利。

另一種歷史內容的過程，則是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這就是：中國人民要由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剝削的鬥爭轉變到擺脫帝國資本主義奴役的鬥爭，這種鬥爭，就是說，由一種鬥爭的歷史方向轉變到另一種鬥爭的歷史方向，前一個歷史方向為後一個歷史方向創造前提，同時又為後一個歷史方向所否定。

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矛盾，如上所指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主要的任務，是在於要實現民族獨立和民主制度，而其事實上，是存在了三大問題，其一是民族領土獨立（即廢除民族領土制度，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其二是政治的民主制度（即廢除專制獨裁制度，各革命階級專政），其三是經濟上的民主制度（即廢除封建土地制度，改良工人生活和農工資本家的壟斷專利）。關於這民族民主革命的三大問題，按照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口號就是「民族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其特別較完備表現出來，比較豐富民生主義有新內容的，是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在中國共合作期所重新解釋的新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中山先生關於民族民主革命所提出來的三大原則，三個綱領。這三個原則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歷史產物，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

階級和社會的矛盾之一種反映，而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各方面的了解及其思想，正是代表了其一定階級的、階級的內容的。

三民主義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三個綱領，而按照孫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的實際方面的規定，尤其是民族革命的綱領。近代中國所存在的民族矛盾之發展，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時常逼得中國各階級與聯合起來，為民族獨立而鬥爭，三民主義也時常就成為這聯合的共同綱領。在辛亥革命時代，三民主義成為當時反滿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的共同綱領，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代，由於三民主義內容的發展，成為當時反帝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的共同綱領，在今天對日的民族戰爭中，三民主義亦成為這民族革命統一戰綫的共同綱領。

三民主義——這是我們近代偉大的民族思想。從三民主義中，正如列寧在辛亥革命時候所寫過的：「我們看到真正偉大民族的真正偉大思想，該民族不僅善於因自己長期的奴隸狀況而痛恨，不僅善於夢想自由平等，而且還善於去向前驅進迫中國的人作鬥爭」。三民主義的真價，首先就在於它是從中國民族向壓迫中國的人作鬥爭的過程中產生出來，而且是服務於中國民族的鬥爭的思想。

從三民主義的提出，我們可以看出：「東方已完全跑上西方的道路——從今以後幾萬萬新起的民族將參加鬥爭，以期達到那些為西方所已達到的理想」（列寧）。辛亥革命時候，列寧這裏所指出的「西方所已達到的理想」，就是代替民族壓迫和封建制度而起的民主主義的理想，就是如法國大革命實現過的理想。但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時代，在世界上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在這種時候，「西方的資產階級已經腐化了，站在它前面的，已經是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了」。在這時候，「先進的中國人以及全體經歷過這種高漲（指革命的高潮——達註）的中國人，其解放的思想是從歐、美、日本的革命中歐美目前的問題已經從資產階級解放出來這個問題，即社會主義了。因此，必然產生中國民主黨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必然產生他們的主觀的社會主義」（列寧）。當然地，這種主觀的社會主義，並沒有變更歷史客觀上的實質；另一方面，由於無產階級的興起，在中國不可避免出現預科學的社會主義——也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種科學的社會主義，就也是把這種主觀的社會

主義之客觀上的實質顯現出來，而且，無產階級這種科學社會主義根據中國近代社會和革命的規律，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提出的具體綱領和具體原則，也比起任何階級或黨派要更明確而徹底。更完滿而無缺，其綱領和原則，就是最完滿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和原則。

近代中國各種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以急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家爲代表，出現了「三民主義」和主觀社會主義的思想；發展到更新的階段，則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家爲代表，出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科學共產主義。這種思想的發展，是歷史生活規律發展所必然的結果，而後者則包括着前者思想的精華，繼續前者未竟的事業，並不可避免地隨着歷史的變化而越過舊時的界限，做着前者爲時代所限所不能做到的工作。前者則給後者的發展準備了前提，但不能包括後者，不能代替後者，因爲真實的歷史不能有這樣的顛倒，不能有這樣的「不合理」，否則，歷史就是不可思議的了。

三民主義是一定的歷史範疇。我們是從一定的社會生活去理解一定的社會意識的。有些資產階級份子故意把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當成超歷史、超社會之神祕而不可捉摸的東西，把中山先生看成「天縱之將聖」，而且像過去統治階級和士大夫的看待孔子一樣，認爲：「真理發展到中山先生，人類的智慧之燈就應該熄滅」；認爲：如此真理便已到極軌，此外再無真理發展的餘地。這種見解——誠如歷史所證明——是完全無稽之談，是完全不合乎歷史的實際。

誠然，中山先生自己對於三民主義的歷史根源，並沒有意識到如我們上述的解釋。中山先生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在我們看來，則是：一定的社會生活產生出（反映出）一定的社會思想，而這一一定的社會思想在階級社會中是和一定的階級相結合的。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爲它和大衆相結合；離開大衆，便不能有力。我們把主義看成知識，看成人類一定的智慧，而不把主義看成教條的信仰。我們把主義看成是在於喚起大衆的自覺，大衆之所以能爲一定的主義而出生死地鬥爭，只是因爲他們覺悟這一一定的主義是和自己的利益（或暫時的，或永久的）相結合，而不是出自盲目的信仰或服從。所以

「主權」是由存在（生活）到思想，由思想到結合大眾的實踐而生出力量。中山先生說：「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這話是原始地，同時也是抽象地含有（或接近於）唯物的因素；但另方面的說法却又偏向到信仰。不幸，今日一些禁止人民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的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正拿了這所謂「信仰」來做護符。這種份子的做法，不是要使人民能運用或發展自己的智慧去理解三民主義，並從而實踐三民主義。相反，他們製造人們盲目地把「三民主義」四個大字或「總理遺囑」當成「和尚念經」背誦，却不讓他們知道三民主義爲何物，這就是他們所謂「信仰主義」。要使大眾們能科學地了解三民主義，並能自覺地爲它的實現而努力，必要打破這種腐朽專制的獨斷主義。

三 三民主義

一 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完整性

革命的三民主義是一種整個的綱領。三民主義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自己就是把三民主義當做「整個的」來看待的。他曾這樣說過：「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三民主義是造成新世界的工具」）。爲什麼三民主義是整個的呢？因爲這三民主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產生出來的。因爲這三民主義是反映着這個國度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因爲這個國度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兩大革命潮流的結合。因爲這個國度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可以真正得到最後勝利及其真正勝利的保障，需要最廣大人民的興起，需要農民大眾的興起。因爲這個國度人民要擺脫中世紀的黑暗和落後，不能不進行反抗那成爲中國黑暗勢力最主要的靠山——帝國主義者。正因爲這樣，所以中山先生自己才會認爲：「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的」（對湘軍演說）。打什麼不平呢？中山先生這樣答道：「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打不平的呢？是對富人打不平的」（「軍人精神教育」）。中山先生引用過美國民主主義偉人——林肯的名言，即所謂「民有、民治、民享」，來說明自己關於這種打不平的理想：「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民生主義」第二講）。

任何割裂三民主義革命完整性的企圖，結果都會使三民主義中的任何一個主義就不能獲得最後的

實現，也不能得到最後的保障。中山先生提到辛亥革命反滿的經驗就這樣警惕的說過：「在漢族沒有光復以前，一般黨人的心理，只爲漢族一經光復，便可達到國利民福的目的；到了今天，才知道是太大的不然，強光這四原肉，就是出於當日同志輩知道注意在民族主義（其實許多人就只知道注意片面的反滿）（達註），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這個過錯，也就是本黨的責任還沒有終了的地方。要知道，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能貫徹，就是民族主義達到了目的，終久總是不能穩固；何況民族主義在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民國十年在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演講）。辛亥革命的失敗，一方面是因爲不能由反滿的民族主義明確進到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爲不能貫徹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後來時常申說三民主義的革命完整性，恰就是從革命失敗的經驗而得到苦痛的教訓。

但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完整性，並不是把三民主義中的各個主義混爲一談。事實上，民族革命與反封建革命是相互關聯的，但是二者不就是一樣東西，這又是很明白的。中山先生對於這點也有所申說。辛亥革命前，他在東京「民報」週年紀念節上，就有過這樣的說法：「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逐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從嚴格的科學意義說來，應說那是種族革命——達註）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却不過依然如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是由於政體不好的緣故，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如把中山先生這裏的意思加以改造或發揮起來，那末，就是如我們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說的：第一、解決民族革命的任務不就是完全等於解決反專制反封建的任務；同時也可以反轉來說，解決反專制反封建的任務不就是完全等於解決民族革命的任務。第二、雖則如此，但每個任務的真正解決還是相互關聯的，民族革命的成功要得到真正的保障，要使民族不再受外禍，則不反專制反封建是斷斷不行的，因爲專制封建制度會使得民族陷於衰弱而無法動員民力來抵抗外敵。再則，反專制反封建的革命，如果不進行民族革命鬥爭，則也是斷斷不行的。因爲外的強敵、帝國主義者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成爲一切反革命勢力的支柱，它們不斷地援助反革命抵抗

革命，它們隨時隨地援助反革命進行極端的事業。太平運動的被曾國藩、李鴻章所摧殘，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的專制和稱帝，這些都是一種最明顯的例子。

綜括來說，如果有一種意見，以為無論在任何歷史情勢之下，革命三民主義的進行都沒有主要的，那是忽略了每個具體歷史情勢的存在，忽略了革命進行的曲折，那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另有一種意見，以為三民主義中的任何一個主義可以完全代替全部，那是割裂了三民主義，那是削弱了三民主義的革命性，結果就會使三民主義的事業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真正澈底的成就，那也是錯誤的。所以，具體地、靈活地運用革命的三民主義以及保衛和發展三民主義的革命完整性，這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都是不可分開的。為着三民主義的革命完整性而鬥爭，為着貫徹民族民主革命而鬥爭，這就是為着實現一種擺脫了民族壓迫和封建剝削的國家，爭取這樣的國家，是我們爭取我們民族內部更合理的和更合理的生活制度所必須經過的道路和階級。

二 民族主義

民族是歷史的產物。有些人把民族看成超歷史不可說明的東西，這是很錯誤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意義上，民族問題的發生，或者是反對封建的割據和地方的分離（在自然經濟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礎上），而要求國內民族的統一，或者是反對異族的壓迫和掠奪，而要求對外的民族獨立，或者是這兩方面的互相糾纏。這種革命運動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在中國，兩方面的問題都存在。歷史已證明，沒有解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及肅清封建勢力所依存的舊土地制度，中國這種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中國人民在這種鬥爭中，有時側重於這方面或那方面（如過去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民主革命運動，是側重於一方面，今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又是側重於另一方面），這兩方面又互相有關的，對外的獨立鬥爭，可以促成對內的統一，而反對

內部的封建關係的民主革命運動，既削弱國內封建割據，造成國內統一的基礎，同時又是培養對外獨立鬥爭的基礎（就這樣來看，民主開國，同時也是民族統一獨立問題，而民族統一獨立問題的實際又是民主問題）。這種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最後完成，正有待於兩方面交錯的勝利。這種民族國家的建立，在客觀上，是要造成商品生產能夠充分自由、廣泛和迅速發展的條件，但同時，又可以造成為將來歷史奮鬥之便利的條件。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度，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反對外族侵略的民族革命的鬥爭時常被提到第一位，民族主義在三民主義中時常被提到第一位，而中山先生首先就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家。

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侵略，把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變成世界極少數的富有的奴隸，把整個的中國瓜分為幾個世界各個互相衝突的帝國主義強盜的勢力範圍。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曾沉痛地這樣說過：「……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因此，中山先生特別把中國稱為「次殖民地」。事實上，孫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的先覺，當與中會時代，業已感到被人瓜分和民族滅亡的可怕慘禍，與中會宣言業已寫出了這樣警惕的辭句：「……中國一旦為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為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儻不及早維持，乘時發奮，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以淪亡，由茲泯滅……」。與中會和同盟會固然還沒有建立明確的反帝國主義的綱領，然而，當時的革命活動，首先是由帝國主義的侵略所刺激出來，而且主要的是以避免世界帝國主義者的瓜分鯨吞為出發點，這是沒有疑問的。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中這樣說過：「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意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這事實恰是可以做這一點的說明的。

列寧在其名文「論民族自決權」中，曾特別論述到亞洲的民族運動；他說：「……亞洲（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地方）大部份的領土，或者是「列強」底殖民地，或者是民族關係上極不獨立和極受壓迫的國家……」。接着又說：「……資本主義把亞洲驚醒起來以後，在那裏也各處喚起了民族運動，就是這些運動的趨勢是在亞洲創立一些民族的國家，就是這樣的國家恰巧就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最

好的條件。」沒有疑問的，中國——這是亞洲中最大的極被壓迫的國度；又沒有疑問的，這國度自從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就日益成長着民族運動，日益形成着強有力的民族運動，而這個運動就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和日趨成熟着有意識的革命民族主義。

中山先生這樣地說明過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並非是逼着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民報」紀元節演講）。中山先生這段話在當時只是在反滿的意義上說的，可是無疑問的，民族獨立運動，就是要取得政治的自決，建立獨立的「民族的國家」，這見解恰是反映了歷史真正的要求。列寧和盧森堡爭論的時候會這樣寫過：「……從民族關係上看來，最適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當然是民族國家。這當然並不是說，這樣基於資產階級關係的國家能排除剝削與民族壓迫。這只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種產生力求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之強有力的經濟因素。這是說，從歷史的、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的「民族自決」，只是政治的自決，國家的獨立，民族國家的形成，決不能其他的意義」（「論民族自決權」）。從列寧這段話，我們就可以對於一般民族運動的歷史意義，得到完全科學的了解。

一個民族獨立與否，是全民族各階級利害與共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在這點上說得對：「……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其在實業界，苟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濟的壓迫，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勞動界，苟無民族主義，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足以蝕其生命而有餘；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衆，其目標皆不外於反帝國主義而已。帝國主義受民族主義運動之打擊而有所削弱，則此多數之民衆，即能因而發展其組織，且從而鞏固之，以備繼續之鬥爭」。要求民族的生存與強盛，要求民族內部歷史合理的發展，要求民族文化的發展，這就需要發揚民族團結反抗帝國主義的旗幟，起而為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

中山先生關於民族鬥爭的事業，如大家所知道的，首先是放在反滿鬥爭的事業上。就客觀歷史的觀察，為展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首先應解放滿族在國內所建立的民族桎梏，這是第一種需要的事

滿清族在第一個時期以一族若臨奴役全國，造成中國各民族的五相攔式、互相屠殺，送給了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一個便利的條件。在後一個時期，假資本主義列強的勢力侵入中國之後，滿族雖經又遭了侵略者最便利的工具。中山先生曾說：「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追原禍首，其咎在滿人。」（「軍人精神教育」）。在相當意義上說來，中山先生的話是對的。在中山先生主持下，當時美洲致公黨所重訂的「新章要義」這樣寫道：「天下列強高唱帝國主義，莫不以開關疆土爲心，五洲土地已盡爲自種所併吞，今所存者，僅亞東之日本與清國耳，而清國則世人已目之爲病夫矣，其病勢積弱，驪宇日蹙，今滿洲爲其祖宗發祥之地，陵寢所在之鄉，猶不能自保，而謂其能長有我中國乎？此必無之理也。我漢族國萬萬人豈甘長受滿人羈縻乎？……」當然這裏的話，主要的是以爲滿洲積弱，漢族同胞不但對滿族應該「立興薄復仇之志」，而且應該自信顛覆滿族完全有可能，但處，這裏也正包含有這樣的危險：即滿廷甚至不能保有自己祖宗發祥之地，遑恤中國其他的土地？假使不操滿廷，則在滿廷「尊贈友邦，勿與寇奴」的政策下，全中國就都會有被世界帝國主義列強蠶食鯨吞的危險。這個危懼是正當的。滿廷在當時是中國最腐敗勢力和帝國主義者奴才之罪惡的淵藪，首先應遭這罪惡的淵藪，這就給對外的民族革命鬥爭開一個便利的道路。

正因爲反滿的鬥爭，在各種事實上，是以避免帝國主義者的瓜分鯨吞爲出發點，所以，歷史的演展就會把反滿的民族鬥爭轉爲明確的反帝的民族鬥爭，而這種鬥爭的新發展，當然和新的歷史條件以及新的自覺人物登上政治舞台——這些發展是不可分開的。

日本在一九〇五年戰勝了希俄，這個歷史事件，如當時列寧所寫的：「歐洲人在亞洲各國作殖民地地搶掠，結果，在其中便產出一個日本，使它變得偉大的軍事勝利，而這些軍事勝利却保障了日本有獨立的民族的發展。」（「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同時，亦正如列寧所說的：「這一個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因此，它自己已開始壓迫其他的民族，東歸殖民地」（「論民族自決權」）。大家知道：這個資產階級的國家，在戰勝希俄之後，隨即成爲窮兇極惡的掠奪殖民地、壓迫東方各民族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成爲各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急先鋒。不過歷史如不是矛盾的發展，那就成爲不可思

竊的了。日本戰勝了帝俄，把自己提起爲掠奪東方各弱小民族的兇惡強盜，同時却又刺激了東方各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刺激了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中山先生會時常提到這點，這事實是無疑問的。但是最深刻、最廣大刺激中國民族反帝鬥爭的興起的，却是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而不是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本的獲勝，結果是日本代替了帝俄，加重了對於中國的民族壓迫和奴役。俄國的十月革命解放了俄國的工農，同時，則完全解放了帝俄對於中國的民族壓迫和奴役。俄國對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歷史，完全兩種不同的歷史結果。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國民族劃時代的自我覺醒，幫助了中國人起而向帝國主義作對時代的抗爭，正如斯大林所說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是一次空前的大革命；它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迷夢，而引起他們與帝國主義鬥爭，在波斯、中國、印度……」。中山先生自己是最感受到了這點的。他這樣說過：「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爲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但是由這一次戰爭，無意中發生了一個人類中的大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俄國革命」。接着他又這樣加重地說：「……爲什麼協商國要出兵去打俄國呢？因爲俄國人民發生了新覺悟，知道小日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各國反對這項主張，所以便共同出兵去打它……俄國這種主義傳出以後，世界各弱小民族都很贊成，共同要求自決；歐洲經過這次大戰的災害，就帝國主義一方面講，本沒有什麼大利益，但是因此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民族主義」第四講）。偉大的被壓迫的中華民族，便是重新從俄國十月革命中甦醒了自己民族的新曙光的。

中山先生說到了歐戰後世界民族間的狀況：

「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爲本位去壓迫別種人種……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贊成白人的侵略行爲，現在正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強暴的民族……人數雖然很少，但是

講中，他仍這樣稱道新的俄羅斯：「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歐洲人都視它爲毒蛇猛獸，不是人類，不敢和它相接，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都是這一樣的眼光；這個國家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它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爲它……不願講功利權權，它極力主張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歐洲人因爲俄國的新主張不和他們同調，恐怕它的這種主張成功，打倒了他們的霸道，故不說俄國是仁義正道，反說它是世界的反叛」。

除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和刺激之外，中國反帝的民族覺醒以及中山先生民族革命思想的發展，還有自己主要的民族內部的根據，這首先就是無產者在政治上的興起以及農民革命運動的抬頭。中國無產階級不但在五卅運動中已廣大地參加了反日的戰鬥，不但在一九二二年進行了震動世界的直接反帝的香港大罷工，而且已團結了自己最先進的部隊，形成自己的政黨，正確地估計到自己民族的地位，以反帝作爲自己奮鬥的第一步目標，第一次最鮮明地在民族前頭作反帝的怒吼。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於中國民族的狀況有過如下的分析：

「帝國主義列強在這八十年侵略中國時期之內，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國人民是倒懸於它們慾壑無底的巨吻中間。帝國主義者掠取了遼廣的邊疆領土、島嶼和附屬國，做他們新式的殖民地，還奪去許多重要口岸，做他們的租界，並自行把小國劃成幾個各自的勢力範圍，實行其專制的掠奪事業。在中國自己領土之內，三分之二的鐵路爲外國資本家的所有，其他的鐵路，也是直接和間接由外國債權主人管理；外國的船輪是在中國的海口和內河裏獨自自由行駛；郵電是受嚴密監督；關稅也是不自主的，是由外國帝國主義者協訂和管理的；這樣，不但便利於他們的資本輸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國經濟生命的神經系已落在帝國主義的掌握之中了。那些外國資本家，還在中國佔據了許多礦山，並在上海、天津等商埠開設了一些工廠，傾費百萬的中國勞工在那礦山裏、工廠裏，做他們生利的奴隸。同時，又加上外國商船如潮的輸入，謾說布匹、紙張之類，舊有的針和釘都幾乎絕了種；因此，生活程度日漸增高，三萬萬的羣

民日趨於窮困；數千萬手工業者的生活輕輕被華美機器製造品奪去，而漸成爲失業的無產階級。中國因爲每次戰爭都要被索去一批現金賠償，加上鴉片和商品的吸收，現金日漸減少，又加上數萬外債連本帶利不斷的盤剝，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廣州幾個外國銀行家的操縱，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生命都陷於極恐慌的狀態之中。帝國主義者還賄賂中國的官僚、政客，派遣許多顧問、收買軍閥、策動叛亂，設立學校——這是企圖更順利的達到他們貪婪掠奪目的。同時爲防止中國民族的反抗起見，帝國主義者的列強又掠得實際統治中國人的領事裁判權，並派遣軍隊、警察、軍艦駐守於中國領土之內。

這段話是把當時中國民族被帝國主義者壓迫的情況概括地描寫出來了。在那宣言中，中共還特別具體地描寫到中國軍閥成爲各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工具以及軍閥內戰的背景。從這一切分析，中共在當時就規定了這樣民族革命鬥爭的目標：「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進部隊這種政治的覺悟及其主張，是極大地影響到中山先生民族革命思想發展的。

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指導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國民黨史上，第一次最明確規定了反帝國主義的政綱。「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明白地指出：「自滿洲入據中國以來，民族間不平之氣，抑鬱已久；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地位……」。又明白指出道：「……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不已，以攫取利權，各佔勢力範圍……」。從這樣的了解出發，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就對於民族主義明白規定爲：「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在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力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其目的，在使中國自由獨立於世界」。這是新民族主義。這樣就開闢了中國國民黨史上對於民族革命奮鬥的新紀元。

從「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我們可以看見：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的原則上所增加進去

的，不但是規定了明確的皇帝政綱，而且是還明確地規定了關於國內民族問題的政綱。宣言上說：「……今後國民黨爲求民族主義之貫徹，當得國內諸民族之諒解，時時曉示其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之共同利益……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個原則的完成和說明是很重要的。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於規定「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實行民主共和國」後，關於該會接續着有如下的規定：「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中共這會規定與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規定，在原則是大體上一致的。我們之所以說關於承認國內民族自決權原則是很重要的，因爲這是和我們反帝的貫徹不可分開的。馬克思說過這樣極深刻的思想：「壓迫別個民族的民族，自己是不能自由的」。第一國際的總會同情於馬克思的觀點，也這樣寫道：「若有人民壓迫其他人民，乃爲自己找鎖鍊」。中國民族要得從帝國主義的牢獄中解放出來，必要不再在自己的國內建立國內民族互相壓迫的牢獄，而我們對於國內任何民族，就必要放棄漢族的優越感（大漢族主義）。

中山先生對於自己民族革命思想的發展，沒有把它當成原則的空談。中山先生的偉大，不但在其晚年這樣明確地規定了民族革命的政綱，而且在於能和這明確政綱結合起來，規定了爲實現這種政綱的革命政策，不但在於能規定革命政策，而且在於能在實際上堅決去實現革命的政綱和政策，能大無畏地和帝國主義作英勇的戰鬥。在強大帝國主義直接干涉的威脅下，在革命源地的四面楚歌下，中山先生對於鎮壓商團的叛亂充滿了戰鬥的熱情。中山先生一方面發表對外宣言，公開與長悍地攻擊英帝國主義者援助商團之叛國行動，公開向英國麥克唐納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另一方面，則毅然下撲滅叛亂的決心，毫沒有躊躇的情態。在他由韶關給蔣介石先生的信中這樣寫道：

「運械來韶，如不能立即辦到，則其次爲分給我同志中之隊伍，肯爲我殺奸殺賊者（此指官長與士兵皆一致者而言）。請先與汝爲細查其各部，何部有此決心。不爲奸商所搖動者，如有則合集之。要只與汝爲對彼衆舉約立決死之誓，必盡滅省中之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此事當要

部隊一萬人以上，土下一心，又要汝先有決心，毫無猶豫，自完全交付，為我一幹，便可將黃埔之械，悉數給之，立即起程，絕無反顧……」

中山先生達到私信，在革命史上也是件大事的文件；這封信表現了中山先生如何在行動上專心於自己的民族革命理想，如何對於敵人不好惹，如何在反帝事業上決心貫徹到底。北京政變後，中山先生為呼應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北上，在上海曾遇到帝國主義者的干涉，然而中山先生仍一本其民族革命英雄的气概，給帝國主義者以如下堅強的回答：

「上海是我個中國的領土，我是這國領土的主人，他們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想要怎樣便可以怎樣。我登岸之後，住在租界之內，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條例，無論什麼政治運動我都可以做」。

在帝國主義面前，中山先生是這樣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的，他在反帝實踐上，奮鬥到最後一呼吸。當他彌留的時候，他還這樣警告自己的同志：「我死了，敵人要來犧牲你們，你們是很危險的」。是的，以中山先生那樣垂暮之年，可是在強大的敵人面前，在敵人威脅利誘之下，中山先生沒有移軀化，這是中山先生偉大的民族革命主義，這是我民族偉大戰鬥精神的表現，這所以使得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沉痛地悲悼中山先生之死，這所以使得中山先生的精神永遠留存於我民族的心坎中而不朽。關於這點，聞中山先生之風者，是會「濡夫有立憲」的。

在民族主義中，中山先生談到保存中國固有道德的問題。歷史上是沒有不變的道德的，因為道德是社會歷史的產物，而社會歷史却是變化的。中山先生曾做了一個演講，題目叫做「世界新道德之潮流」，從這個題目，我們也可以了解中山先生是承認道德的進化的。在演講中，他具體地說：「現在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其目的在使人來服務，這種為衆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新道德的潮流」。這裏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是不承認有不變道德的。中國舊時代的暴君，舊時代的封建奴役者，對廣大勞苦的人民教「忠」「孝」，毫無疑問的，他們是把這些道德當成奴隸服從主人的教條，來束縛人民對於奴役剝削的不滿和反抗，

來極樞人民的智慧，這是封建的「道德」。從好方面說，作爲民主主義者按中山先生的本意應該不是提倡保存封建的舊道德，中山先生所要保存的，應該是在於把這封建的禮程而人和尋常人的道德改爲爲國民社會和隸屬民族社會的道德。民國元年，中山先生對北京學生演講，就提出過「學生應主張社會道德」，認爲「今日在校學生，異日即政治上之工人，社會上之公僕，與專制時代之思想，大不相同」。在民族主義中，中山先生關於「忠」這樣說道：「我們在民族之內，與道理上說，還是對君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爲四萬萬人去效忠；爲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爲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這樣，形式是舊道德，而內容却是民主主義的新道德的了。這樣，舊道德在新歷史情形下，經過內容的改變，也可以轉爲突麗的新道德。這種服務於民族、服務於社會、服務於大眾的新道德，是被幾十年來中國民族中一切維新和革命的先驅者發揮出來了。毫無疑問的，一切革命者和共產黨人是繼承這樣的道德，並且從來是發揮這樣的道德的。新道德的創造和發揮，當然顧到民族傳統，這點我們同意孫中山先生，同時，我們應該更明白地指出：這種民族舊道德之所以能變爲民族新道德，必須建立在民族的和社會的革命實踐戰鬥上，必須建立在人民的革命自覺上，離開了民族的和社會的革命實踐戰鬥與人民的革命自覺，就仍舊變成蒙蔽的教條。若干年來，曾有人企圖利用中山先生說明的某些弱點，把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這種舊形式新內容的道德、使之脫離民族的和社會的革命實踐戰鬥的立場，而還原爲單個人和盲從支配者的舊道德，事實上，這是損折這種民族道德的價值，而且這正是會積弊孫中山先生革命民族主義。

中山先生革命的民族主義，正如革命民族主義一樣，是建立於民族革命的實踐戰鬥立場上；正如爲是建立在這樣的立場上，所以革命的民族主義一方面要國內民族主義、民生主義（不可分開）因爲必要發動廣大人民去爭取和保障民族革命之發展和勝利，另一方面則要世界各國（國際主義）不可分開（因爲必要在世界舞台上鞏固與一切革命力量之聯合，並與獨立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使民族革命可以得到國際的厚援，而取得勝利）。中山先生說：「俄國發動發生之後，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非種戰爭，不是趨於不同種之間，

是起於何種之端，自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黑種分開來戰，那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壓迫者與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民族主義」）。當然，嚴格說來，第一、戰爭還不會是只有階級的，民族戰爭與階級戰爭還是交叉着的，第二、異色人種相互間的民族戰爭也是會有的（如阿比西尼亞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而同種人間的民族戰爭也是會有的（如中國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不過，中山先生這裏的意見，已是趨向於這樣的真理：即革命的民族主義必須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所指出的：「我們要能够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這就是中山先生關於革命的民族主義必須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明確結論。斯大林在其名著「關於列寧主義的基礎」中寫道：「列寧主義說明了，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則證實了：民族問題，只有與無產階級和階級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的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帝國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部份」。「因此，必須進行鬥爭以反對被壓迫國內社會主義者的民族的閉關主義和狹隘觀點、孤獨思想，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走出自己民族的觀念，不了解本國的解放和統治國的無產階級運動的聯系」。這是共產主義者、國際主義者所開發的真理，中山先生則是轉在革命民族主義者的立場，向這真理接近了。企圖割裂中山先生上述的結合的，結果就會走上拋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道路。

在今日，對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首先要對於關係中國存亡命運的最決定的帝國主義者進行決死的鬥爭，也就是目前的偉大抗日戰爭。兇惡無比的日帝國主義者，「九一八」以來，把一切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中國的罪惡集中在它自己的身上，同時也把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者侵略的仇恨全部集中起來，而中國人民這種仇恨的集中，就是為的便利於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中國人民這種仇恨的集中，已結成着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國人民這種仇恨的集中，必將保障戰勝日帝國主義者，並將由此進而獲得民族的完全解放。因此，我們一方面更要鞏固和擴大全國各黨派、各階級的抗日團結，另一方面更要鞏固和擴大國際上和和平的和革命的團結。我們一方面更要發揮民族的道德，「高度的發

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堅持抗戰到底，克服悲觀情緒，反對妥協企圖（中央六中全會決定）；
 每個中國人都能「志存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死」；另一方面更要發揮國際的友誼精神，更深刻地發揮「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真理，更深刻地結合革命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以孤立帝國主義者，以求達到世界各民族最後的和平的、合理的、平等的共處。在這些問題上，大家需要把中山先生革命的民族主義發揚光大起來。

當然，中山先生關於民族主義的思想不是毫無缺點的。中山先生思想會為一定時代、一定社會基礎和一定的宇宙觀所限，在民族問題上也一樣。

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其與積極方面交叉的，又包含着一些消極的方面，這些消極的方面大體上可以從其理論的問題上和實際策略的問題上看。

在理論上，關於民族問題，誠然中山先生不是立脚於歷史主義的，不是立脚於社會歷史變遷的觀點來理解民族問題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因此，就不免有許多缺憾。大體上看來，有幾個問題是突出的。

第一、如關於「什麼是民族」這個問題，中山先生認為民族的結成，是「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點和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的了解是有分別的。按照馬克思主義者對了解是這樣：「民族——這首先共共同性；是人們之一定的共同性。這個共同性，並不是人們的，也不是種族的。」——這就是「語言地、經濟生活以及發現於共同文化中的心理結構之在歷史上形成的穩定的共同性」（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就是說：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系性）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結構。無疑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是正確的。中山先生關於這問題的主要缺點，第一，是在於把民族和人類種或種族混同起來。第二，是在於疏忽了「共同的地域」這一個重大的民族特徵。事實上，根據血統

來規定一個民族，這是不可能的，歷史上也沒有一個純粹一種血統的民族；比如，我們漢民族吧：在歷史上就不是一個純粹從古到今不變的血統（更遑古的不說，在漢以後，自匈奴雜居內地，經過所謂「五胡亂華」，經過拓拔氏在北方的華化，經過沙陀氏的入居中原，經過遼、金、元這三代或者主宰大都中興，或者主宰全部中國，經過滿清而入關及國外民族的漢化，這樣，在歷史上血統就時常經過很大的變化與混合）。其次，民族如沒有共同的地域（領土），決不能成其為民族，猶太人所以不是一個民族，就是沒有共同領土，這國在今日我們和日寇的鬥爭中，尤為表現得明白。今日我們自寇的爭奪，主要的就是表現在領土的爭奪；日寇要滅亡我們民族，必要佔我們的領土，而我們民族要生存，就必須保衛我們的領土。注意血統而疏忽了「共同的領土」這點，是無法說明民族的，是會把民族變成抽象的東西。

第二、正是在某方面把民族看成抽象的東西，他在敘述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進行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壓迫之外，就還提出關於民族的人口論。他且曾把所謂「人口問題」放在民族主義的第一編。本來對於任何人口的問題，如果脫離一定具體的社會生產關係，來單獨地或孤立地論列，像以前許多人做過的，都會陷於不淺的理論錯誤。同時，如果以人口問題來代替具體之社會的、或民族的關係，也就會把問題弄到顛倒。不是「人口問題的壓迫」使社會或民族衰弱，而是一定的社會制度或民族的壓迫（政治的與經濟的），發生出所謂人口「缺少」或「過剩」的壓迫。近代中華民族的危險，第一，是外來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中山先生所本本的）；第二，是內部腐敗的政治經濟制度（這也是中山先生所時常提起的），而並不是人口的增加或減的問題。在歷史上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人口多數在這方面或那方面，會是最決定的問題，而被壓迫民族的多數更便利於取得解放的勝利。但我們却本此得出結論：人口少數的民族一定會被人口多數的民族所征服。在歷史上人口多數的民族被人口少數的民族所征服，其例子是很多的，如中山先生所提到的，在中國、遼、金、元、清都是人口少數的民族曾經征服人口多數的漢族。在近代世界，這種例子更多了，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中，不是引過列寧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為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

嗎？特別的例子就是印度的被英國征服，而今天日寇不正是企圖征服中華民族嗎？假如我們不能團結抵抗到底，不正是真的有當亡國奴的危險嗎？所以問題是要具體地分析民族間和社會部的內真正關係，並由此指出鬥爭的方法和道路。離開實際鬥爭，民族的人口加減問題在這裏是抽象的問題。

第三、正是在某方面把民族看成抽象的東西，關於民族衰弱的原因，他在「一地方就認爲是由於中國人不善修身，『像吐痰、放屁、留長指甲、不洗牙齒』等。他說：『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爲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它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同時，這些又如他所說的：『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了民族的精神』。當然，問題不能這樣說。多年中，這些話曾被一些人所利用，以作爲和侵略者妥協和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話柄。事實上，造成中國『退步』而使外寇得以侵入的，當然是由於黑暗、腐敗的、貪婪的封建專制制度，是由於統治者那種對人民進行殘酷剝削和壓迫，使人民力量不能伸長起來，甚至使人民無法生活，而關於那一切落後習慣，也正是這樣造成的。民族精神的問題，如果不從這種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去了解，當然是不可具體了解到。

上面這些理論上的缺憾，應用到實際政策上面去，就又表現爲以下的一些缺憾：

第一、如關於辛亥革命前「上香港總督書」，關於民國三年的致書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關於在日本提出的「大亞細亞主義」口號，都是屬於消極的，這些東西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了，是被中山先生所親自拋棄的了；但不幸的，這些東西曾被一些對民族沒有信心的人所利用，甚至今日竟爲日寇和漢奸所利用。汪精衛這個無恥的漢奸，今日正是利用了中山先生給大隈重信的信和「大亞細亞主義」的招牌，以求毀滅中山先生革命的民族主義的。

第二、上述對外民族問題上妥協的動搖，在對內民族問題上又表現爲另一種的動搖：如關於漢民族對國內其他民族之關係，中山先生當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前，其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的演講」就有過這樣的說法：「講到五族人數，漢人不過四五百萬，蒙人不計百萬，藏人只數百萬，回教雖多，大多數都是漢人。……漢族向來號稱四萬萬……用這樣多的民族，還不能夠真正獨立，組織一個

完全漢族的國家，這實在是在我們的羞恥……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必要滿、蒙、回、藏部同化於我們漢族……」說到中國將來無論是有甚麼民族參加進來，必須要他們同化於我們漢族……」當然，這裏所說的思想，是消極的。中山先生反對北洋軍閥時代集合五族滿蒙人物的假「五族共和」，這是很對的。不過革命却不能因此而否認「五族共和」的原則，正像不能「因噎廢食」一樣，而且必須爲促進五族人民的共和而努力。我們願意國內各民族在反抗外侵略的鬥爭中，在建設合理社會的鬥爭中，與我們漢族實行自願的聯合、自由的聯合，但我們却必須消除我們漢族的優越感，必要讓國內各民族可以根據自己民族的特性而自由發展，而不能一定要各族同化於我們漢族，不能採取大漢族主義。對於國內少數民族的漢族優越感或大漢族主義，在我們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完全是中不利的，而在今日的抗日鬥爭中，更是明白的。中國革命辛亥階段，像中山先生率辛亥革命所做了的，首先解放了滿族在國內所建立的民族牢獄，這是需要的，但我們却絕對不能再建立漢族壓迫國內其他少數民族的牢獄，來代替滿族所建立的。不過，如上面敘述過的，在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中山先生已一般地放棄了這樣大漢族的思想，而代表大會的宣言，已明確地規定了國內民族平等和自由聯合的原則（雖則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中，關於「國族」的定義，還留着過去的發展跡）。

第三、如關於中山先生曾主張過用宗族團體做基礎，來「聯成一大民族的團體」（「民族主義講演」），這種主張或意識是限於消極的。就歷史上說，宗族團體本來是保守的、落後的，是和封建制度、自然經濟相結合的，從來操縱這種宗族團體的，大抵是一般擁有特殊地位的豪強和士紳，而這種團體本來也正想妨礙了人民自覺的視野，在平常場合中，依靠這種宗族團體做基礎，是不能激起人民成爲自覺的戰士的。再則近代中國社會歷史各種矛盾的發達，商品關係的發展，貨幣關係的發展，使宗族內的矛盾更加暴露出來，宗族內的分解是更難掩蔽了，宗族內人們特定社會地位的不同，是更顯明顯了，這樣，要把他們在宗族團體中混合起來，根本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却不是說，在某種特

定的時機（如現在抗日的時機），都沒有些微可能用同鄉會或宗族團體來組織一部份人民，或用爲發動某些人民組織的一個特定的契機。這是有某些可能的，而且一切抗日自覺的戰士，必要具體的估計這種可能，重視這種可能，來及時利用機會，團結某些落後的同胞於抗戰的周圍。但是，今日抗日統一戰綫的結合，雖然是表現了空前未有的複雜，而扶助中華民族的基本力量——工人與農夫——依據自己的社會關係團結起來，則仍是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基礎，是形成我們一大民族團體的基礎，還是無可懷疑的。

理論上反映真實生活的不真切，在實際策略上也會和生活的前進有距離。這點從上述的各種缺點看來，正是很明顯的，如說中山先生的民族革命主義的思想是民族覺醒方面的反映，同時，其消極方面，也正是民族及其社會基礎某些落後方面的反映，而他關於革命態度的兩面性和形而上學的二元論的宇宙觀，也必然使得有這種思想上的分裂。

民族革命主義與民族改良主義的矛盾，正是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特點。

我們繞到中山先生民族思想之消極方面的地方，不是要掩蓋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相反，在一定情形下，指出其某些消極的地方。同時，才便於把中山先生民族革命思想的精華發揚出來，這是對於民族有利的，對於革命有利的，而這對於中山先生前輩，以及打擊那些企圖利用中山先生思想的缺點，以破壞民族事業的收類，也是必要的。

一些大資產階級政客代表假借中山先生的名義，特別在民族問題上玩弄各樣的戲術，的確是喪盡了力氣，並企圖在這問題上集中打擊中國無產階級，爲的什麼呢？爲的要掩蓋歷史的真相，並便於他們一些下流的私利。在這裏，順便揭發一下，同時說說無產階級的民族觀是必要的。

一些大資產階級代表稱「民族」的名義爲私有，好像民族即朕，朕即民族。然而事實上沒有絕大多數人的工和農，又孰裏來的民族？工廠（佔民族中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民族的主體，只有他們

是民族的真正代表者，這是極粗淺的道理。一些大資產階級份子以為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至上便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然而事實上，這正是極大的顛倒。以民族的主體——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為至上，這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反之，却恰是把它看成空下，把國家看成空下。惟其是這樣——大資產階級代表們企圖以少數人代替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為他們的私利，不顧民族革命中先生的遺囑，不願意大多數人覺悟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以殲滅外寇，挽救民族；而且時常製造分裂破壞團結，以遂其陰私。在一定條件下，他們可以投降（如汪精衛）。在一定條件下，他們又可以壓迫其他民族，甚至自己正在被別民族壓迫的時候，暫時又壓迫其他民族。這些都和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政策相反。無產階級正為真正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所以主張全歐團結，反對分裂，主張動員全體人民武裝全體人民以防禦外寇保衛國土，他們絕不投降，而是戰鬥到底；他們不壓迫其他弱小民族，而是主張並實行與各弱小民族自由平等共處。

無產階級一方面主張在民族受外來壓迫時候，反抗到底，使民族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受別民族的干涉與壓迫。另一方面，則主張各民族打破各階級隔閡和仇恨，而於一定時機最後達到民族之大同。無產階級對於民族問題主張的偉大，是沒有別的階級可以比擬的。而它正是民族利益之最徹底的代表者。在歷史上，資產階級只要他一旦獲得統一和剷斷國內的市場的時候，他必然進一步去要求國外市場，而壓迫其他的民族；所以，一般說來，真正能使各民族完全和平共處友愛互助，必須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之下才能達到，而這正是無產階級的使命，而這使命正是使得民族問題可獲得最後最徹底的解決。

離開中國無產階級，要獲得中國民族的獨立自由，那是不可想像的；離開中國無產階級，要民族問題的最後解決，那也是不可想像的。

三 民權主義

中山先生關於民權主義有一段這樣的說明：「什麼是叫做民權主義呢？……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國內有什麼不平的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軍閥、官僚的專制，四萬萬人還不能管國事，還是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所以對國內的專制打不平，便要應用民權主義，提倡人民的權利；提倡人民的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打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演講）。中山先生又說：「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末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而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民權主義」演講）。所謂民權主義，就是要四萬萬同胞起來管理國事，也即是「一國的政令，都由人民所出」（民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對黨員演講）。這就是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權主義的基本精神。

中山先生打破了中國古來關於天賦天子特權的傳統謬說。他說：「從前的人以為天子是天生的，原來便賦有一種特權；到後來人類覺悟了，不相信只有天子一個人，有這項特權；推到百姓，人人都

有這項特權，就是把政權公之天下」（「三民主義是打破舊思想的主義」）。

中山先生會從社會進化的觀點來觀察民權主義的不可避免，並且在這點上充滿了勝利的信心。民國十三年，在「民權主義」演講中，他說：「中國人從前反對民權，常常問我們革命黨有什麼力量，可以推倒滿清皇帝呢？但是滿清皇帝在辛亥年一推就倒了。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世界潮流的趨勢

，好比長江、黃河的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但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是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凱，很強悍的軍隊像張勳，都是終歸失敗。現在，北方武人專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們南方主張民權，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雖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軍隊的訓練和餉彈的補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們順着潮流做去，縱然一時失敗，將來一定成功，並且可以永遠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是怎麼樣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現在之民權時代，是繼續希臘、羅馬之民權思想而來……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發達，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爲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爲縮短國內之戰爭……」。綜觀中山先生這裏的意思，他認爲民權主義是世界進化不可阻止的潮流，事實上，亦即認爲民權主義是中國歷史進化不可阻止的潮流。歷史的進化，革命的行程，本來和長江、黃河一樣，不是筆直的而永遠是曲折的，飽經革命滄桑的中山先生，澈悟了這個歷史的真理，相信民權主義的制度必終將在中國建立起來，而且認爲這是把中國從衰弱中拯救出來的門路。在十幾年前，中山先生這樣說：「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爲什麼說要中國強盛便非民權不可呢？因爲要經過民權，才能振作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力量，才能啟發他們的能力和智慧。中國的衰弱和民權的被壓制，完全是相關的；一切民族苦痛的災難，完全證明了這點；而要解救這民族的災難，就必要大大地發展民權主義。正如中山先生先生在民元年所說的：「從前衰弱，實因壓抑有專制淫威所致，此時團體改良共和，人民生息於優良政治之下，其文化進步必甚速，不出二十年，必成一至強極盛之國無異」。民國成立以後，只有實現中山先生這預言，並不是中山先生預言的錯誤，而恰是因爲沒有實現真正民權主義的共和制度，所以就弄到民族危難益深了。

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思想，在與中會入會誓詞所謂「驅除鞏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等辭句中已略見端倪。這所謂「合衆政府」後來便具體化、明確化爲民權主義的思想，如「同盟會宣言」中

第四編 第三個綱領所寫的：

「建立民國。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由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要達到建立這樣的民國，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明白的指出過是「由平民革命」的途徑（「民權紀元節演講」）。「同盟會宣言」這樣寫過：「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穢虜，恢復中華之外，國民生，當從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且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隊政府特為其機關而已」。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之事業，結果所以會如中山先生所說的「惟有民國之名而無國民之實」，就是因為沒有貫徹中山先生所指的途徑：沒有達到喚起最廣大的平民參加革命，沒有達到使每個國民都即本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負起了革命的責任，所以，革命雖沒有真正地掃蕩數千年來那種腐爛納污、為非惡淵藪的官僚軍事系統，結果就有如中山先生民國十一年在「軍人精神教育」演講中所說的：「現今之中華民國雖為共和國家，尚非完全之民主國，因武昌革命以後，仍為官僚政治，武人政治，一切政權，悉操其手，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為何物，國民福利何事，救國救民為何等責任也」。

中國本來是一個具有年代久遠和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的國度，不破壞這樣的制度，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真正建立起來。經過革命失敗痛苦經驗的中山先生，於民國八年在上海號召重行革命的時候，就這樣直截了當地說到這點。他說：「我們已經要改造中國，必須造一棟爛莊嚴的中華民國，像工程師建築大房屋一般，須用新的方法去建築，但是上層越高，地基須越深，所挖出的陳土須連去開。這陳土便是官僚」（在上海青年會演講）。同時，他在另一會場上又說：「夫一般人以為革命黨人止知破壞，不能建設，此大謬也。就吾黨觀之，只見其急於建設，不能待破壞之完成，所以無用物尚多留置，史無破壞，吾人雖革去滿洲總統，而尚留陳腐之官僚系統未予掃除，此真吾輩

破壞了。……工之破壞。吾人亦已破壞者，一專制政治，而今有三專制政治起而代之。又加惡焉。……底底……憲法統和武人政治制度，這是民主共和國建立的先決條件，中山先生是趨向到這真理方向了。

中山先生認爲民國的武力應成爲人民的武力，而不應成爲個人的武力。民國元年，中山先生在北京就這種向武警的專制時代與民時時代警之區別：「我國共和程度，尚在幼稚時代，我軍警界同胞，只宜扶持之，保護之，決不宜鞭撻之，摧殘之。專制時代之軍警，專爲保護皇室，殘害同胞；共和時代之軍警，則爲捍禦外侮，守衛同胞，共享利益」。他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又說過：「軍人所以衛國，非以亂國，所以防內，非所以防外，國亂則不以兵力爲最後之解決，以召危亡，國治則軍人自不得干涉，搖動全局」。中山先生這些話，自然是對着那些脫離人民而依恃武力來對內作惡爲非的武人軍閥而說的。不幸的，民國成立而後，許多武人軍閥竟是走上了中山先生所警戒的錯誤道路，對外則挑撥離間，煽外以求自固其位，對內則亂用武力來戕賊人民自由生機，弄得人民困苦顛沛，而因此民族的危亡益急。袁世凱就是這樣的一個「始作俑者」。然而中山先生始終認爲，像這樣軍閥所統率的軍隊，不能留存於民國。當袁世凱死後，中山先生在歡迎議員席上就這樣地說：「北京軍警固多，然皆中華民國之軍隊也。民國之軍隊當然保護民國主人，若其有不法之侵害，則是背叛民國者也，國民將共起而誅之」。中山先生肯定中國人民乃是中華民國的主人，而軍人官吏則只是人民的公僕，惟其是如此，如軍隊侵害人民的利益，就是背叛民國，即應爲國民所共誅。曹吳倒後，他又這樣說：「中國既定名爲民國，總要以人民爲主，要聽人民來講話，如果是帝國，才讓他們（指握兵柄的人）去講話。假若一天不改國號，他們總要聽人民的話。那要有十萬或者二十萬兵的人，我們不能把他當作特別偉人，只可以當作替國民守門的巡捕」（「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民主共和成功的成功和保障，一方面，要解體舊的帝國主義工具和封建的軍隊，要糾正軍人的不軌，另一方面，要創造起自己真正的國民武裝支柱。關於這點，中山先生在其臨終前的「北上宣言」，就給了這樣一個很明白的結論：「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進國民革命之

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一劃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

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後，中山先生關於民權主義的思想，正如其民族主義的思想一樣，因受了世界和國內革命潮流的影響，在各方面都有了更具體的新發展。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的二次代表大會採出了「真正民主共和國」而奮鬥，對於民權問題曾有如下的規定：「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製定關於工人和農民以及婦女的法律」。第二年（即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則有宣言公佈（這是經過新革命份子參加過意見，而爲國民黨改組先聲的宣言），在那宣言中，這樣寫着：「現行代議制度已成民權之弩末，階級選舉易爲少數所操縱；欲護民權之真義，爰有下例之主張：（甲）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乙）以人民集會或編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權；（丙）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從上面兩個宣言，我們很可以看到中山先生與共產黨在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民權問題上是在接近起來了。隨後，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民權主義，更給了如下進一步的解釋：

「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請願也。……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行，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權利」。

綜合上面所述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在這裏所規定的，第一、是主張民權不能爲少數資產階級所專有；第二、是主張直接民權，人民經過集會或總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權；第三、是主張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第四、是主張剝奪賣國國民的人

關於上述的權利。中山先生民權主義革命的精華是完全表現在這四點上了。上述的四點完全表現了民主主義中的民權主義之反帝、反對封建的急進民權主義（民主主義）的性質。特別是認為民主政權應是平民所共有，也即應該是平民各階級所共有的民主專政，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專政。這個民權主義的方向是規定得很明白的。這方向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政權問題上惟一的方向。

為什麼我們民主政權應是各平民階級所共有，而「非少數者所得而私」，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呢？從整個世界來說，十月革命以後，我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份；從中國內部來說，中國資產階級在革命上的薄弱，這已為歷史所考驗；而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無產階級現在政治舞台上，已成為中國革命指導的力量，已成為中國人民、中國農民的政治首領。而這樣，中國的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而這種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這基本部份。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即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共和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直接民權，這是中山先生民權主義優秀的理想之一。民國五年中山先生在其「中華民國之意義」的演講中，這樣說道：「吾人今欲易專制而成代議政體，然何可減少自封，落於人後？故今後國民當操奮精神於世界，發現一光芒萬丈之奇采，俾更進而底於直接民權之政。代議政體廢壞之下，吾人所享有，只一稀代議權；若底於直接民權，則有創制權、廢止權、選官權」。（在粵餉議員歡迎會上）同年他又說：「民權特張之點，則以前人民僅有選舉權，今並有罷免權，以的議會立法，雖選人民意志，人民無法取消，或得資本家賄賂，將有益公衆之事廢置不議，此皆異常危險。今則七十萬人中，苟有七萬人罷市，可開國民大會；有人民三十五萬人以其之贊成，即可成為法律，反是者，違人民深思之法，取消之；議會所定法律有缺點，亦可以是法復決之」。（「建設方針」）。中山先生是說得對的：「現在該即重聲明，是代議制度還不是真正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民權」。（民國十

年，在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演講）。而我們這裏主張的各革命階級民主專政的國家，正應該不是舊時代腐爛的國家，正應該把中山先生這直接民權的思想和這個問題聯絡起來，而加以具體的發揮。

本來資本主義階級代議制之民權的虛偽，首先是在於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裂。真正直接民權，首先就是要把二者統一起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所表現的民權，是真正的直接民權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巴黎公社」不是國會的，而應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團體……」。列寧發揮了馬克思的意見說：「巴黎公社採用了新的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代議制，在這新的制度之下，判斷和討論的自由，就不是一種騙人的勾當；因為代表們必須自己工作，必須自己執行他們自己的法律，必須自己來檢察實際生活所得的結果，而且，還必須自己直接來對選舉者負責（「國家與革命」）。列寧對於蘇維埃制又說道：「它（指蘇維埃）使我們可以合併國會制度和直接民權的長處，就是說，它把立法的作用和法律執行，合併於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身上」（「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這種代表，是為人民所選舉出來而又根據人民的意志可以隨時撤換的。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到：真正直接民權與代議制的虛偽民權之區別，並不在乎代表機關的存在與否，而在乎人民代表機關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結合或分離。列寧對於公社繼續說到：「代表機關此地還存在着，可選擇為一種特殊系統，作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作為職員們之特殊地位的這種代議制，已經沒有了。沒有代表機關，則民主制度便無從設想，甚至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也無從設想……」（「國家與革命」）。而真正直接民權的蘇維埃，也就正是一種代表機關。這裏馬克思列寧所分析的巴黎公社和俄國蘇維埃，是指無產階級的民權制度而說的。在歷史上，只有兩種民權制度才是真正貫徹的、完全名符其實的直接民權：一種是無產階級的民權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另一種則是我國過去十年中工農代表會議的革命運動中，在蘇維埃地區所實現的工農民主專政。

關於中山先生所說的「直接民權」，本來中山先生曾自述是採用自瑞士和美國的兩院制。誠然，瑞士和美國是世襲資本主義國家中較稱為「民權最發達的國家」，可是這兩個國家做權，如列寧當時所常說過的，那裏所謂「民權」的實質，仍是資產階級的。那裏沒有由人民代表把立法權與行政

權的理想，在歷史實際上，當然也還是急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上月革命後，中山先生說：「法、美共和國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爲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民國十年，「當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的演講）。這是中山先生直接民權思想的偉大發展（這思想和「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關於「非資產階級所專有」的主張是相聯貫的）中山先生這個主張，從其革命的具體內容來說，當然也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性質的。但這已是漸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共和國，即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而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家組織形式，即應該不是普通資產階級國家的代議制，而應該有某一定形式的立法與行政合一的直接民權制，換句話說，這種直接民權制，並且還應該不是如中山先生所說的瑞士與美國「直接民權」，而應該是超出這個界限。可是，這又還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因爲很明白的，我們現在所做的革命內容，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事實上，中山先生把這種和蘇聯相比，但在客觀上，階級內容却不是一樣，因爲：蘇聯是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而我們却還是各革命階級的民主專政。由各革命的民主專政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需要轉變到另一個革命階段才能達到的。「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與舊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這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過去了。另一方面，也與最新式的、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相區別，這是最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爲一切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這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中。因此，在一切革命的殖民地國家，在一定歷史中的國家形式，唯一只能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國家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國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種國家形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是否民權主義真正可行呢？是否中國人民不該實行直接民權的資格呢？

這裏最好引述二十年前中山先生關於直接民權一段話來結束上述的一系列問題：

「或謂中國人民程度不及，若行此制，恐有搗亂，不知合衆人而搗亂，其事最難。如所謂制權等，至少須有全體人民十分之一發起，過半數之贊成，假使無理取鬧，斷不能出此；使其爲真正民意，則得之非難。……然欲使民易於發見，非有良善之舉固不可，此放翁自治論（按：中山先生指直接民權）即其機關也。昔之民權機關猶肩輿，今之民權機關猶駟牡，能自動，而能發達，故當實行此自動之民權機關」（「建國方針」）。

同時關於上述的理想，也決不是好高騖遠而不能實現的空談，因爲關於人民的容易覺悟，二十幾年前中山先生更給了以下經驗的話：

「三十年前，提倡民族革命者，人皆以爲叛逆。而鄉人易於領悟。舉一事爲證：昔嘗以制錢購水菓，給以咸豐、同治之劣錢，彼却不受，所受者爲康熙、乾隆之錢。彼固能辯康、乾之字，然以反面滿洲字叩之，則不能識；若告以此即滿洲文之康、乾，滿洲奪我江山，而爲皇帝，今之皇帝，非我國人也，則勃然怒矣。蓋不俄頃而贊成民族革命之理。……兄弟少時，好奇居鄉，嘗以數月之力，教五六萬鄉人知地圖之理，講民權亦然。……袁氏數年來以種種方法欺人，人雖信者。彼管刻小冊子，如「孫文小史」等數萬本，然也未嘗有效。嘗問一鄉人曰：「孫文爲國賊，則袁亦國賊耳」。民亦易覺，亦即易悟。有先知之資者，不可不勉也」（同上）。

中山先生這幾話，不但證明人民容易懂得民權及一切革命的道理，而且論一切從事救國革命工作的人們指出了一個經驗：應該怎樣善於隨機應變，利用簡單易懂的事物，來接近民衆和啟發民衆的覺悟。

民權的鞏固，必要依賴於民權的貫徹，這道理是顛撲不破的。民國五年中山先生關於「中華民國之憲法」便說到這一個問題：「欲共和國之鞏固，必先建其基礎；基礎不必外求，當求諸於國民之心。若國民身受民權之庇護，識其無上光榮，則自必出死力以衛民權，雖有拿破崙在國內，亦莫吾毒」。怎麼能使「國民身受民權之庇護，識其無上光榮」呢？這除了革命民權主義的貫徹實現外，是沒有別的道路，而這種革命民權主義的貫徹實現（和經濟上民權主義的貫徹實現在一起），恰恰是杜絕復辟

在今天抗戰救亡的偉大歷史運動中，必要盡量發揮革命的民權主義，已成為全國公認的真理。關於這道理，中國共產黨人為挽救民族的危亡，會不斷地提出各種具體的呼籲。國民黨時代代表大會曾說過這話：「抗戰的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增進有因果關係。沒有民力的發揮，抗戰是不能達到最後勝利的；而沒有民權的發揮，民力是無從發揮出來的。如果我們民權得有廣大發揮的機會，那末，在目前抗戰前面，必將無限地增大我國戰勝日寇的力量。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論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的時候曾這樣說：『如果管理國家的事宜，誠實地、勇敢地轉入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手中，那末可以產生這樣的歷史上所空前未有的羣眾革命的熱情，可以使人民向災難作戰的力量增加幾許多倍，使狹隘的舊的官僚力量所不能完全實行的任務，可以完全由數百萬羣眾的力量來加以實現……』。同樣地，我們如果能在這抗戰中及時地、誠實地、勇敢地樹立廣大民主政治的基礎，呼喚千千萬萬人民起來參與各級的政治，並切實實現『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訓練全國壯丁，充實民衆武力』，『指導及援助各地武裝人民』，『發動全國民衆組織農、工、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為爭取民族生存之抗戰而動員』，『在抗戰期間，……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我們如果能取消那種不讓人民有呼吸自由的獨裁制度，靈巧地運用民主集中制；這樣，我們將可實現或接近於實現那真正對外有極大抵抗力和對內能廣潔的民主政府，以及那真正國民兵化的國民革命軍。這樣，我們將可便利地掃清一切貪官污吏和漢奸敗類的民族污穢，我們將可進一步地消滅任何貪生怕死和臨陣脫逃的軍隊，這樣，日帝國主義者在這我民族力量偉大增長的前面，必將立即引起更大極大的發料，我們將更快地能戰勝災難，而縮短持久戰的時間。

x

x

x

和民族問題同樣，關於民權主義思想的理論上和實際策略上，與其積極方面相交叉的，中山雖

生也有其消極方面，而特別在其實際策略上表現過很大的不足。

在理論上，中山先生一方面承認民權主義是一種世界的潮流，但另一方面，當然還不是從具體的社會歷史之發展的規律與問題的出發。中山先生曾認識過西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階級性、有限性，這是中山先生的偉大進步的地方，不過，在理解這一般問題時，他爲一定的社會基礎所限，當然還不能理解到在階級社會中之一定的民權主義的過渡性質，而是簡單地當成「人類進化之概則」。然而，關於這點，就當前現實的問題來看，實以爲還不能說是中山先生的弱點，因爲如把無產階級革命的見解做標準，來強求一個革命的民主黨，也必要有這同樣的見解，這顯然是違反時代的錯誤。我對於中山先生理論上的缺憾，是就對於民主革命有關的問題來說的。

第二、如把人數分爲三等。他說：「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當然，先知先覺是有的，否認先知先覺的存在，這是大的錯誤。不過，先知先覺不能離開一定的社會生活而存在，而是一定社會歷史發展的一種產物。同時，如認爲「實行家」的民衆是屬於不知不覺，這是不合乎歷史事實的。革命先鋒的責任是對於落後的民衆變成自覺的人民。人民不走上自覺，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人民的革命精神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大眾的自覺。所以，基本上在歷史上作主的，是廣大人民，而不是先知先覺。先知先覺者之所以能有所作爲，因爲他根據人民的歷史需要，而先發現了真理（即使是部份的）。先知先覺者之所以能有作爲，因爲他能把握發現的某種真理（即使是部份的）變成人民自覺的東西。中山先生的缺點，就是在於把先知先覺和不知不覺之間，劃了一條鴻溝。

第二、因爲在某方面把先知先覺和民衆看成有一道鴻溝，忽視民衆的自覺，就產生了一種關於政權和治權分裂的主張，關於人民權和政府權分裂的主張。中山先生稱政權是人民權，治權就是政府權；政權應歸之「有權的人」（中山先生比之爲阿斗），而治權則應歸之「只有能的人」（中山先生比之爲諸葛亮）。但歷史告訴我們：治權和政權的分別，是脫離事實的。而民權主義的實際，却在於與人民權與政府權的統一。中山先生說：「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

的全權交給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可是，真正直接民權必須是人民權力與政府權力的統一。前面的論述，可以說就是歸結到這一個結論。第一，歷史告訴我們：只有政府是人民直接政權的政府（即由人民及其代表直接處理國事）政府的權力直接在人民的手中，這政府對於人民才能是真正的或最好的。第二，如果政府的權力不真正直接在人民的手中，而是在那脫離人民、高立於人民之上的特殊人物的手中，這種脫離人民的特殊人物掌握一切政治的和軍事的機構，在那些機構裏面，塞住了一切給他們直接操縱和御用的工具，在這種情形下，人民也就不可能在任何時機易如反手地，如中山先生所說的，實行自己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大權。人民要對付他們的御行逆施，收回國家大權，將其迫而用革命的手術。根據這兩點，人民權力與政府的權力，就恰是不可割裂的，治權與政權必須合而為一。中山先生希望政府要成一個萬能的政府。是的，我們需要一個萬能的政府，而歷史正告訴我們：最萬能的政府，便是民權最發達的國家；而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却是段無能的。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政府，是歷史上民權最達的，在那個「祖國危險」的驚濤中，拿破侖法國民主共和國於磐石之固，我們不能說那是無能的政府。相反的，那真正萬能的政府。俄國蘇維埃政府，在十月革命中，在內戰中，在五年計劃中，都能克服歷史上未有的萬難，在任何戰線上，都獲得了歷史上未有的勝利，而這政府，是建立在比法國大革命民權更發達的基礎上的，我們不能說那是無能的政府的。相反的，那更是真正萬能的政府。帝俄時代的國家是西歐最野蠻的國家，民權是不發達的，但帝俄政府在日俄戰中，在大戰中，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在二月革命中，却表現得如摧枯拉朽的無能。滿清朝廷的政府是不認民權存在的，但在百年來對外的戰爭中，在辛亥革命中，也更表現得如摧枯拉朽的無能，或許有人會稱頌現代法西斯國家如意日政府的萬能，稱頌他們的「成功」。但它們這些蹂躪民權，剝奪民權到一絲一毫的野蠻政府，並不真是萬能的。它們無能解決人民的麵包，它們無能解決國內經濟的弱點和矛盾，它們無能消滅國內人民革命運動的潛滋生長；它們或者有一時窮兇極惡的「戰功」；然而它們無能利用這「戰功」（例如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他們無能鞏固這「戰功」（如日本在中國）。並且，因為他們的勞兵

傷財，弄得體力疲敝，經濟矛盾的增強和尖銳，這個形式上是「萬能的」政府，在很快的時間，也露出暴露出來有如摧枯拉朽的無能。

我們的民權主義的政府，按照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意見，必要努力使每一個的人民，甚至落後的村婦老嫗，廚房中的老太婆，都能起來管理自己的國家，實行向這樣努力，才能洗清那數千年遺傳下來的一切政府機關中的污穢，清洗一切腐敗營私的份子，使人民的意志能在自己的權力中普遍實施起來。在上面論選舉的問題的時候，我們會引過列寧和中山先生說過的話，來證明一個普通公民要選出來管理國家實是有能力的。這樣，人民有自己的政權，而這也就是治權。人民經過政權的攝取，因而成爲國家的統治者。一般說來，個人的能力總是有限的，「單則易折，衆則難摧」。這真理可以應用到各方面。只有經過民權的過路而形成集體的能力，這集體的能力才可以無堅不摧。反之，像秦始皇個人的能力，却只能傳帝位於子孫到二世，像隋葛亮的能力，也終於不能挽救獨漢的滅亡。同時，要使人民懂得去運用民權，則實際的教育，其效力、其迅速、其廣泛，都不是其他的教育方式所可比擬。所以，要在實際中使得人民能立刻地得有運用民權的機會。列寧這樣說過：「我們不是爲托邦主義者。我們知道任何苦工和女廚子都不能立刻上來管理國家。在這點上，我們是和立憲民主黨人等同意的，但是我們和這些人所不同意的，即在我們要求立刻消滅那種成見，以爲只有富人和富家出身的官僚方能管理國家，方能進行日常的工作」。又正像列寧所說的：「自然，在新機關開始工作時，不可避免地要有錯誤。但是，當農民脫離農奴制，獲得自由而開始自己經營農莊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會有過錯誤嗎？難道除了實習的道路，除了立刻採用真正人民的自治以外，還有別的道路可以教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及改去錯誤嗎？」（「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我們不能因爲恐怕人民驚駭，而不給人民實習的機會，正如我們不能因噎廢食，阻礙小孩學習走路的時候，甚會「錯誤」的，但不能因爲他會錯誤，就禁止他去學習走路，這種禁止的辦法，是會使他一辈子都不會懂得走路的。

第三、因爲在某方面把先覺和民衆之間看成有一道鴻溝，忽視民衆的自覺，所以，對於民衆自覺由的問題，就有不完滿的主張。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的演講中，會這樣說道：「中國人民老早就了

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的」。在「民權主義」演講中，又這樣說：「假若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痛苦，當然不理會」。中山先生這種關於中國「自由」問題的消極態度，散見於各種著作裏面，但是事實上，數千年來，中國人民在封建專制政治支配下，不用說人民關於集會結社的自由是完全被剝奪的，就是思想的自由也完全被剝奪。舊時代道統定於一尊，稍敢提異議的，便可以遇到身首異處之禍，這是每個中國人所熟知的。中山先生曾不斷地稱讚過去「會黨」的組織及其力量，同時中山先生也是知道了他們是秘密的集會結社，他們是完全不自由的。中山先生致力於革命凡四十年，凡是革命黨人在中國舊統治下，一切關於亡命流離的痛苦，殺身滅族的慘禍，中山先生又是親自所領會的。滿清朝廷對於中山先生是不自由的，北洋軍閥對於中山先生也是不自由的。百年來，在滿廷和軍閥的統治下，無數的民族優秀份子，無數的民族精華，是慘被屠殺了。顯然的，他們沒有過自由的生活，他們的慘死，就是因為不自由。事實上，主張革命的三民主義去革命，同時也是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爭什麼自由呢？爭民族的自由、爭民權的自由、爭民生的自由。為什麼要爭這些自由呢？因為不自由的緣故。把三民主義和爭自由分開出來，這是不妥當的，這是對三民主義完全有弊的。一些自命為中山先生信徒，曾極力利用這點去限制人民的自由。不過，民國元年，中山先生對於自由曾有所解釋：「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民拱衛，又安能自由」。可知這裏中山先生也還是主張自由的，他這裏所否認的，只是官吏的自由，而不是全體人民的自由。中山先生認為「在職為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同時：「……人民之自由，切不可當軍人之自由，此語最須牢記」（以上均見「釋自由」）。這些中山先生的遺囑，誠然是要得中山信徒「效須牢記」的。

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演講中會說中國人本來如「一盤散沙」，並用這點來比喻中國人本來有自由。但歷史是這樣：正因為從前中國人民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彼此的力不能互相團結起來，故有言論的自由，彼此的意見不能互相勾通起來，所以才成了「一盤散沙」。關於這點，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自序」，就是這樣說見解的，他說：「中國四萬萬之衆，等於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

。實異族專制有以救之也。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民
盟自由的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豈復能期其人
心固執以暴力發揚耶？」這點和「民權主義」演講的不同說法，而也完全合乎歷史的真理。本來散沙
是可以結為石頭的。可是，第一，如果各個散沙彼此被隔絕起來，彼此不得互相接近，散沙何從車
結成石頭？可見散沙的能結成石頭，也祇要一種可以結成的自由機會。第二，散沙與石頭是無機界的
事物，散沙的結成石頭固然是事物辯證法的發展，但這結成並不是自覺的結成，因而還是隨時可以被
粉碎而為散沙，這也是辯證法的發展之所及。人類社會的自由與團結是不可分開的；必要有自由，才
能使彼此團結起來，而團結以後還是需要自由的，這團結才能真正地鞏固。在人類社會中，自由必與
同時是自覺的。人們根據自己的自覺，而互相團結，同時又根據自己的自覺，而發展這團結，鞏固
這團結去達到自覺就是真正的自由（「必然還沒有被意識到的時候，必然是盲目的；自由是必然的顯
現」（「恩格斯」）。這種自覺的獲得，必要依賴於廢除政治上的桎梏。一個革命黨的成員，他們的加
入是自願的，因為他們根據自己的自覺；但是，這個革命黨必須是一個有紀律的，才能成為真正有組
織的、鞏固的革命黨。一個成員根據自覺加入以後，同時又須要根據自覺而執行這黨的紀律，這才是
真正的黨員。這種自覺的執行紀律以鞏固團結，固然是有黨章、黨綱的規定，但如果黨員不能自覺地
執行，這規定就還是空的規定。而這種自覺執行紀律，制裁自己關於越出紀律範圍和妨礙公共意志的
「自由」，也正確自由，是自由的一種形態。所以，我們說，人民團結的鞏固，還是需要自由的，而
不是人民沒有政治的「自由」就可以盡情發展而結起來，就可以鞏固團結。

。中山先生曾誤會過法國大革命的政府為「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民權主義」演講）。當然
我們並不是把政府主權者。國家和政府乃是歷史的產物，在一定的社會階級上，某種國家和政府將
存在，而且我們革命在某個具體的革命階段上正是要有一種合乎革命利益的革命政權和革命政府。「一
革命的的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這「革命的」的名言，真正革命的、擴大民權的政權，是不可看成無
政府的。法國大革命時代充分發展民權的革命專政的政府，和革命前的一切舊政府比較起來，要算是

後有秩序，故其組織，最仁義，最妥協的政府。近代英國資產階級歷史家威爾斯所著世界史綱，對於這話，就說了一些公道話。所以革命黨民權主義，如實現直接民權，廢除以資產為標準的普選，實行全民集會、結社、言論對自由，讓廣大人民去管理自己的國家，讓他們從實踐中去學習運用民選的機會，而造成一種名符其實的高能的政府，這是應該的事，可能的事情，也不是可怕的事情。

上述中山先生在理論上的缺憾，指出了一點：就是一方面相信民衆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又信任民衆力量的不足。這種一方面的缺點，正在其實際策略問題上——也即民權主義實行的方法問題上表現出來。

第一、如他關於「建國三個時期」的主張（即專政、訓政、憲政）。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革命是黨要革命的專政的。任何革命黨要革命的專政，才能致革命於勝利，這是毫無疑問的，而在初期，「實現這項政綱，不是全體民衆，而僅僅是革命的民衆。可是革命民衆絕不害怕全體民衆，而僅自己的行動障礙因及其所謂全體民衆，甚願吸引全體民衆不僅去參加「管理」國家，而且去參加政權，去參加國家的建設」（列寧：「論黨政問題的歷史」）。中山先生關於專政、訓政的主張，就是要創造一種革命的專政，但可惜的，還沒有達到表現是這樣的革命民衆的專政。而且，按其軍政和訓政的辦法，對於這種革命的民衆專政，僅在事實上形成一種阻礙，因為在那樣情形下，倒會使革命民衆不容易短列寧所說的：「直接上台，即已處理法蘭西和德意志的爭執，自己使用政權，創造新的革命法典」。中山先生對孫所規定的軍政府時期，稱爲「軍法政治」，「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而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同盟會宣言）。

是的，革命的初期，必須做這些事業，大體上說來，革命的專政，他就是要做這些事業，否則我們認爲是要更深入些。但是要做這些事業，並達到目的，必須依賴於廣大民衆的興起和民衆的直接上台，就是說，必須革命的民衆的專政，這種專政應該是依賴於革命的民衆的武力（民衆的革命軍），同時，是依賴於廣大人民的直接參政。就是說，這種專政應該同時是使廣大人民直接上台，創造自

己法典（憲法），實行自己法典（憲法）的專政。把真正革命的（人民的）「專政」和真正革命的（人民的）「憲政」分開出來，並懸隔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所謂訓政時期），是無法掃除反革命的，並可成爲反革命阻礙革命的機會。

革命民衆的專政如不依賴於立即實現廣大的革命民主，那末，這專政就是不可能的。革命民衆的專政是爲實現民衆的民主，同時革命的專政又正是馬上建立在廣大民主的基礎上的。一切大革命的勝利，都證明了這點。

中山先生曾說：「我中國人民之處於專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訓政時期，以洗除其積染之污，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心理建設」）如說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在黑暗的專制統治之下，缺乏文化和知識，這是對的，但如說是「奴心已深，牢不可破」，這當然是說得「過火」的。這點從民衆的反抗運動或革命運動屢用不窮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來的。如果真的「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中山先生就不能領導民衆，進行打倒滿清政府的事業了。再則，中國人民缺乏運用民權的知識，不是自上而下的「訓政」所能收效的。實際的教育，其效力，其迅速，其廣泛，都不是其他的教育方式所可比擬。所以，要使黑暗無知的中國人民能够很快地懂得民權，並懂得運用民權，這只有在馬上放任人民自下而上的在實際上直接運用民權的學習，這種學習可以使人民民權知識的發展，一日直等於舊的數世紀。反之，不這樣做，民權的實現就是不可能的。十年來實際的歷史，正是這樣告訴了我們的。

第二、關於信任民衆的不足，同樣地在「五權憲法」問題上。中山先生民權主義中的五權憲法，是很需要我們來詳細討論的。本來在一般資本主義議會制度民主國家的憲法，是「三權憲法」。這三權分立——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分立，特別是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這是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虛偽的所在，我們上面論到「直接民權」問題的時候，業已提到了，列寧說：「講着任何一個總會的國家，由美國到瑞士，由法國到英國、挪威等等，真正的國家大事是在後台辦理，而且由各行政部事務處，參謀部執行的。而在國會裏，僅僅藉空談來達到欺弄「平民」的特殊的而已。」（「

家與革命」)。這種三權憲法的弱點，正是需要補救的，中山先生主張加以補救，這是我們所同意的。

●不過，按照「五權憲法」的說法，却還是沒有「補救」這種制度的弱點，而偏是會擴大這弱點。「五權憲法」就是要於三權之外，還加上了兩權：考試權與監察權。中山先生所以要提出考試權，據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的演講裏，曾有了這樣的說法：「……有一次美國有兩個人爭選舉，一個是大學畢業出身的博士，一個是拉車子出身的苦力。……說到舉國，當然是那位博士要比車夫好得多，但是那位博士不能夠當選，這就是只有選舉沒有考試的弊病，所以美國的選舉，常常鬧笑話；如果有了考試，那末，必要有才能有學問的人，才能夠做官……」。這種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弊病的看法，並不算是對的。我們認為舊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對於無產階級實行民主的剝奪，就是：「因為實際上，資本家、剝削者、地主、投機商人擁有適宜於集會的十分之九的最好的建築物，擁有十分之九的紙料、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鄉村的佃農和日工，在實際上他們的民主已經被人剝奪了，已經被這個「神聖的私有財產權」，以及被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機關，即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法律官所剝奪了」(列寧：「論民主和專政」)。但中山先生却認為選舉的民主制度會使有才能有學問的「博士」落選，因而想出一個考試權來限制選舉的作用。中山先生担心的，是恐怕工人「沒有學問」當選了不能管理國家。可是，關於恐怕普通工人、農民當選不能管理國家——這種担心，在事實上是不用存在的。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十年中的中國工農革命運動，在事實上正證明了：普通工人和農民都能够表現了很大的才能，並且能最敏捷、最廉潔而管理自己的國家。列寧論無產階級得到政權的時候，這樣說過：「國家官吏之特別的「指揮制」，是可以並且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立刻用「監工和會計員」的簡單職務來代替它，這些職務已經是一個普通市民的能力所能勝任的，並且給予「工人的工資」，也就可以完滿的執行了」(「國家與革命」)。實際的歷史，完全證明了列寧的正確。中山先生也會「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而這樣指出過：「現在機器的造成很進步了，不但是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是可以來管理」(「民權主義」第六講)。事情既然是這樣的簡單，為什麼工人不可以當選來管理國家呢？為什麼我們不再去擴大

之」。中山先生在「中國之革命」一文中，對於「五權憲法」，又有如下的規定：「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院長，由總統得立法議之同意而委任之……」如按照「建國大綱」所謂「在憲法頒布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並兼職之」，顯然「總統公開即「五權」於一身，在實際上，則以消滅總統的行政權；其餘四權都成為總統行政權公開的附屬。如按照「中國之革命」，則憲法仍要規定司法院、考選院、監察院各院長歸總統委任，而且根據國民政府不久以前所頒佈的憲草案規定立法院副院長亦歸總統任免；這樣，在事實上，總統的行政權仍是吞併了「四權」。所謂代議士，或國民大會代表以及其他四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都不過組成爲總統行政權的花籃。是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主張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監察權的統一；但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爲各種權力應該統一在人民代表機關之內（加上全體國民的監察）。正如上節我們所說的，實行真正的直接民權，就要由人民代表機關統一立法權與行政權。我們認爲，只有這樣才能成爲人民權力之統一之表現。不能把各種統一性總統一個人的身上。雖則這總統是民選的，但一個總統總難有那樣的全權，這就會化成一個人的專政；事實上就成爲總統的行政權吞併立法、司法、監察、考選各權。這就會使他最便利於脫離人民的意志，而高立於人民之上，使他最便利於假借那所謂人民所選舉的名義，來任個人爲所欲爲地鎮壓人民。並且，不啻他個人即便本來有怎樣的「好心善舉」，然而，他更不可有主地代表剝奪者來剝奪人民。再者，像上面我們在論直接民權的時候所引述了的，而實現真正的直接民權，不能把立法權作爲特殊系統，在形式上獨立起來，那樣，立法權在形式上監督行政權，而實際上，乃成爲行政權的陪襯，所以，我們主張人民權力的統一，却不主張總統的分裂。如果不是經過選舉手續，而僅僅由總統任監督而成立的機關，這樣形式上的特殊獨立系統，對於真正直接民權，事實上更是不需要的。

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的演講中，說過去「中國也有憲法，一個是君權，一個是考試權，一個是彈劾權」（即中山先生所說的「監察權」）。當然，說過去封建社會時代的中國有當時的法律，是可以的，而且其絕對的，不過，這是不可以利近代憲法混爲一談的。假使這道前認爲過去中國有

與動制的一定的程度的特種的租式——封鎖制度——封鎖制度在農業生活及自然經濟的發展上，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式的剝削的深淵，就是他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中被剝削於土地的一個事實。中國民主革命反對剝削之客觀的要求，是在改變或消滅封建制度。中山先生關於平均地權的原則，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問題的主要關鍵就在這上面。從這面中國歷史客觀要求的繼續出發，列寧就給了以下這樣的結論：「所以從中國民主派的主體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綱領中，實際上所得出的綱領却是：「只是改變「不動產」底「一種血脈基礎」，只是消滅封建式的剝削」。

列寧對中山先生關於「經濟革命」的內容，往下又進行分析：「要麼將地租轉交於國家，即利用亨利喬治那種單一稅制來實行土地國有，在孫逸仙所提出和宣傳的「經濟革命」裏面，別的實在的東西是絕對沒有的了。寫得辯捷的土地價格與上海的土壤價格間的差別，就是地租大小的差別。土地價格就是資本化了的地租。要使土地的「增值」成爲「國民財產」，就是於把地租——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或者是：使土地國有化」。列寧繼續得出關於「土地國有收租」之歷史的意義：「土地國有化，可以消滅絕對地租，只保留一種級差地租。照馬克思的學說，所謂土地國有就是在農業上廢除中世紀的壟斷與中世紀的關係，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農業最容易適應市場經濟的作弄。關於：民粹派爲着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作鬥爭」而主張這樣的土地國有，這個綱領的完全實現，便是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最迅速的發展。在亞洲一個落後的農國需要，流行着這種最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土地綱領，這是什麼經濟上的必要性所引起的呢？這是毀壞各種各色的封建制度這必須條件所引起的」。這顆打擊土地所有權之原則的提出，在事實上足爲力求避絕資本主義的罪孽，得地土在客觀上，這原則在交換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與基礎上，即會引起這顆土地國有希望，變成擴大資本主義擴大發展基礎，變成創造資本主義當發展的基本條件。雖然如此，但共產主義者不但反對這種原則的實施，而且完全贊成和擁護這種原則的實施。這在十八四八年，馬克思在評論美國「土地平分派」的土地改革運動時候就這樣寫道：「我們完全承認美國民族改革運動的歷史的意義。我們知道這種運動將達到一個結果，這個結果在現時確實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工業化的推動力，然而，這

無條件的勞動的結果，一般地講，是要打擊土地私有權，而因為它本身所必需的賦得（尤其美國現時已有的條件之下），它必不可免地將發展下去，達到共產主義」。列寧在引述馬克思的意見時候，又加以如下的申說：「馬克思……極力以唯物論的觀點來決定它的實際的歷史內容，它的必然的結果，因為客觀條件，使這些結果將不顧某些人們的志願、自覺、幻想與理論，而必然地到來。所以，馬克思不僅不反對這個運動，反而完全贊成共產主義者擁護這個運動。馬克思站在辯證法的觀點之上，即是考察運動各方面，看到它的過去和將來，指明了這個運動打擊土地私有制的革命方面。」（上面所引馬克思、列寧的言論和申說，均係摘引自列寧：「馬克思論美國『平分土地派』」）。列寧在申說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的時候，特別是對着俄國農民運動而發的。同時，列寧還進而指出：「無產階級要經過一切德讓克拉克西的轉彎以達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它的獨立政黨的特別組織，應該是我們經常的一刻鐘都不會忘記的目的，然而，嫌惡農民運動却是最沒有希望的庸俗派和實業家」。在我們這裏，中山先生——如列寧所說的——「這一位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奮鬥的勝利的民主運動的代表……完全不以俄國、俄國的經驗及俄國的著作為轉移，在我們面前提出純粹俄國的問題」。所以，上述馬克思的言論，列寧的申說，在這種相似的問題上，也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來，共產主義者正應該在一定的時空內，去具體地發揮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原則，去具體贊助和擁護平均地權在現實上之貫徹的實施的。

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學說，是採用自亨利喬治的學說，這裏，我們還應進而研究亨利喬治與中山先生所處的不同國度，從而研究其歷史實踐的具體問題。亨利學說是出產在美國。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國那裏本來是沒有封建制度存在過的，美國農民是從歐洲移去的，他們到了美國，即得到了土地，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列寧會稱解決土地的革命道路，即是「美國式的道路」。在我們中國，提出土地國有的問題，應具體地演成是農民從中古制度解放出來的問題，農民如不從中古制度解放出來，則「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化）的實施就是很困難的，如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五是國有化問題，應看成同時是農民獲得土地的問題，問題應當是這樣聯貫起來，否則，便不可能做

黨廣大農民力量的興起，使「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化)的原則貫徹施起來。否則「平均地權」的革命原則就會成爲抽象的原則。

辛亥革命後，中山先生對自己的黨員，對其他社會人士，曾苦口婆心地說不要誤謂同盟會的基本綱領之一——「平均地權」(因爲這綱領都會經黨人發誓遵守的)認爲當時「所念宜進行者，即民生主義是」。中山先生希望當時黨人「以推翻滿洲政府之精神，兼而求以後之進步，使吾人同持之民生主義實行無遺，夫然後爲吾人目的達到之日，而對於政綱所負之義務，庶幾無憾」(「論民生主義」)。

中山先生在上海同盟會機關講(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中山先生的希望竟完全受了打擊，

據是給了中山先生一個嚴肅的歷史經驗。由於這一個嚴肅的歷史經驗，在國民黨黨綱時，中山先生

直地認爲：「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由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基礎，就是

大家的責任……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這樣，爲着使農民大衆的興起，

中山先生便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補充「平均地權」的口號，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最

使「平均地權」的口號可以從「耕者有其田」的實現中，獲得其實在的基礎。而「國民黨第一次代表

會宣言」上，在這個問題上，更給了以下的規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

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墾闢水利，修植荒郊，以夠種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

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剝削機關……，供其墾拓，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從這

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在這個時代走上了一個新的發展，這發展便是明白地把農

民的生活問題直接提出來了。當然，這不僅是對於辛亥革命失敗的經驗，俄國十月革命以及

中國工農在政治上的奮起，這也促使中山先生極力去研究。一九二二年「中共二次代表大會宣言」

這樣寫道：「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農民因爲土地缺乏，人地相稱，天災

流行，戰爭和土匪的擾亂，軍閥的剝奪徵稅和剝削，外國商品的壓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爲原因，以最

爲難困苦和痛苦……如果貧苦農民除去窮困和痛苦的頭緒，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軍的

貧苦農民和工人攜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的革命的成功。」這恰是反映了業已在政治上活躍的中國無產者同時把農田權劃到政治舞台上來了，而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擴大地影響到各方面的政治生活。

中國農田數千年來封建制度地剝削（這種剝削以地租為基礎，而交錯以商業利潤和高利貸利息的剝削）過着很苦痛的生活；這種不幸的社會制度造成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長期停滯狀態。差不多每二百年左右一鬧，在那種不幸的社會制度下，即造成了普遍的農業飢荒和社會大流血的騷亂。不僅中國廣大人民在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同時設法從那種不幸的社會制度下解放出來，中國生產力的大發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也就不可能由落後的中古的國度變為先進的近代文明的國度。關於這點，中山先生是已看到了的。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他這樣說：「中國的農民……有九成都是沒官田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用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是自己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農民耕田所得的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平均之六分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假若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是一定更高興去耕田的。大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中山先生還說：「只有這一條出路，才是正確的。列寧在俄國主張農民應該代價地得到土地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只有這一條出路，才會把俄國弄得像歐洲式的國家。只有這一條出路，才會使俄國千百萬農民得以透息一下，恢復元氣。只有這一條出路，才會把俄國這一個受地主奴役而終年挨餓的貧苦農民底國度變為『歐洲進步的』國度，由無知識者的國度變為有知識的國度，由落後的死不長進的國度變為能發展能前進的國度，由人民無權的奴隸制的國度變為自由的國度。』（列寧：『關於現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問題』），全部俄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完全證明了列寧所見到的真理。當然，在我國，情形是較複雜。我們必須

成那樣文明的國家，不只要是由農民得到解放的「一條出路」，而且還有需要民衆解放這「一條出路」。而且，像在目前的全部軍事行程上，主要的出路是民衆解放這「一條出路」；因爲：如果目前不先把民族從日寇鐵蹄下解放出來，那末問題已不是中國落後或停滯的問題，而是中國亡國滅種的問題了。雖則如此，但中國要希望能保障民族的最後解放，以及最後轉弱爲強，需要對於農民的生活給以合理的解決，這問題卻完全沒有疑問的。

在民生主義中，中山先生曾很同情於工人階級。這在「三民主義」中，我們業已說及。對於中國工人階級，中山先生也有很多的關懷。民國十年中山先生就這樣說到：「……國人往往都是誤解民生主義的真諦。許多資本家，開了一個工廠，僱了幾千名工人做學事，每天只發給微薄的工錢，他們便倚賴於衆，說『實行民生主義』。轉着轉着，這種資本家所講的民生主義，隨着正的生計空虛相變有多遠呢？資本家憑藉他的金錢魔力，牽制許多工人，去替他個人出死力，工人流了許多血汗，只賺得少許工錢；這種工廠的組合，外國話叫『血汗工廠』，真是一點都不錯！」在中國國民黨綱要中，這同樣地是民生主義發展的一方面。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代表大會宣言」，對於中國工人的地位這樣寫道：「中國勞動運動已是在第一個階段中發展起來，香港海員和其他工人爲經濟要求的罷工運動，是證明工人們的偉大勢力，工人們的組織近來亦見迅速的擴張。而且，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山。在宣言中，中共關於最近獨門目標的關於工人生活的部份，提議了以下的要求：「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工作八小時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中國無產者這種要求是根據其政治上來。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發表的宣言所提出的政綱，便即規定了這樣一條：「制定工人保護法，以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俟謀勞動地位之平等」。在「九二五軍」中，中國工人們反帝反軍國爭自由爭人權的「一二七」英界流血戰鬥之後，國民黨改組第一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政綱，更進一步

以下所論的「民生主義」：「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護勞工團體，維持其發展」。我可以說，這些都是民生主義及其發展。這和原來的規定是使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更充實了革命的內容了。這和原則與辦法其財及平均地權的原則，在民主革命運動上，是相得益彰的。

在民生主義中，後來中山先生提出了一種「國貨主義」的原則，這原則的數算是要把若干重要的企業由國家去經營。這原則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政綱中，則明白地寫進去了。中山先生的用意是在於想施行這點，「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使具有獨佔性質的企業大銀行歸共和國所有。「這也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廢除壟斷權」，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經濟構成的正確方針。但同時，它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祇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新民主主義論」）

「壟斷權」這是不甚社會主義的制法，然而在「一定條件」的歷史時機或歷史條件下，縱使那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而把若干企業收歸國有或由國家經營若干工業，可能而社會主義的前途以若干便利的條件，這是無可疑問的。比如，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下，國家進行民主的國營事業，同時消滅大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壟斷，以導向抗日的戰爭，這就將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這在歷史上，不但使我們可以更便利地利用和發展我們的經濟能力，以幫助戰爭的勝利，而且在民族力（國力）的空前發展的情形下，更容易於應用來開展我們個人生產轉變為社會生產的將來。不過，應該指出的，就是在這裏，要保障這種特殊的意義，應該於民主政權監督之外，還加上國民的監督。

中山先生說得很對：「……那種少數人的富，假富，多數人的富，計算是眞富，所以我們愛國黨永遠富強是有道理的」。實行革命的民生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過渡到「多數人的富」的必經階段，必經門戶。固然，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和革命的規律看來，革命民生主義的實現到底，還只改變封建的私有制度，還只造成個人經濟生產力發展的基礎和條件。用「反對階級鬥爭」的理由去限制農民生活的變革與工人生活的改善，事實上，還是倒轉用最「極方法去對工人進行壓迫的階級鬥爭；事實上，還是反對生產的發展，這是維護舊的封建的或原來的經濟制度及其制衡方法，還是放

寒了中山先生革命的民生主義，而歸於民生主義却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主要的目的。

民國十三年在「農民聯歡大會」中，中山先生對於農民地位，一獨很精神演說：「今日開這農民聯歡大會，這是革命黨和農民的第一次見面，我們大家見面之後，要做些什麼事呢？就是從今日起，要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如果能夠實行，人民才能够享福，才是真以民爲主；民生主義若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不過是一句空話。民生主義不能夠實行的責任，就在大家農民的身上。所以，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會，革命黨與農民第一次見面來講話，就要大家來實行民生主義」。凡是真正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人，都應該不忘記中山先生這個關於民生主義最後的遺囑。

在日寇侵略前，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三五年發表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文件——「八一宣言」，在那宣言中，關於和抗戰聯結的民生問題，提出了如下的綱領：「救災治水，安定民生」，「液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勞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在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中共公佈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又有以下的提出：「改良工人、農民、職員、教員及抗日軍人的待遇，優待抗日軍人的家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調節糧食，賑濟災荒」。這些民生問題的提出，完全是爲廣大動員人民，以求抗戰的勝利。在這點上，「國民黨臨時大會宣言」上，也這樣說過：「民生主義之實行，當於抗戰間求之，且當於此求得抗戰的勝利，決非使抗戰勝利之後，始從事於民生主義之開始」。而在「抗戰建國綱領」中也規定：「經濟建設，以軍事爲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毛澤東同志說得最對：「……實行這些初步的生活改良辦法之後，必能提高工農貧民大眾擁護政府，參加戰爭與參加生產的積極性，不但戰爭需要的一切動員幫助將大大改觀，而且工業農業生產的數量質量與商業的流通也會大大增加與提高起來，國家財政也就在新的工業商業基礎之上而得到完滿的解決」。（「論新階段」）

當然，在目前，抗日第一，一切都要服從抗日。但總起來說，可以讓人去盡量的工作，救濟，要更激的廣大工農起來保衛祖國，我們抗日政府就應當立即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幫助其發展商業。

而發展，進行「合理的負擔」，俾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進行減租、減息和廢除苛捐雜稅，以減輕工、農、貧民的負擔，救濟難民，幫助他們的謀生。同時，必需嚴厲取締那些大發國難財的投機家，課他們以臨時財產稅。這些正和上述的民權諸問題一樣，已不是原則的問題，而是實行的問題了。

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的思想，和積極方面相交錯的，也有其消極的方面，而同樣地在理論上和實際策略上表現出來。

在理論上的缺憾，有關於現在的，有關於將來的。

關於現在的，第一、例如，中山先生一方面熱烈希望農民覺悟起來，團結起來，「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農民都聯絡起來」（耕者要有其田），另一方面，却對於地主階級地位及其覺悟估計得過高，而產生一種關於調和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夢想。

第二、正如在某方面對於地主與農民之調和的夢想一樣，又有對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特別是在共產階級上）的誤解。平勃地權與耕者有其田的問題，本來就是地主與農民的階級鬥爭的問題，這種鬥爭會充滿了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階級。而到今日，問題並未解決。如「大若外資」的說法，是不能說明歷史和現實的真相的中國實況。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關於中國有階級的存在，曾多處高在宣言書中。中山先生關於「耕者有其田」的強調，就承認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階級」，他主張「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覺悟」，事實上，他就是要他們進行階級的鬥爭。大會之後，中山先生還連聲帶氣有一度發生關於聯共政策的糾紛。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決議案也這樣寫道：「中國共產黨乃中國現在貧農之工業無產階級，自然的階級鬥爭所表現之政治組織之一部」。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演講」中，也說過這樣的話：「……自種與自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就是階級戰爭」。這些正是和他那種否認階級鬥爭的說法相反的。一方面在事實面前承認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在理論上又否認階級鬥爭，這就中山先生的矛盾地方。

在理論上的缺點，關於這來的，如像上面所說過的，中山先生主觀上把民生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基礎，可是，按照其社會的實際，在客觀上，却又只是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中山先生想避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對社會主義抱一種高尙的同情。但中山先生不是歷史唯物論者，自然還不能對於現實的社會鬥爭作具體的歷史分析。本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乃是一種存在，而和資本主義對立的無產階級或獨立的政治力量，也已是一種存在了。現實的問題應該把「中國已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爭取中國非資本主義的前途」這二點分別清楚，同時把這兩點聯繫起來。第一、由於中國已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侵略、經濟經營相隨而來），無產階級已形成了相當強而且獨立的政治力量。第二、在中國發展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以及走向社會主義，具有依靠這和資本主義相聯繫的無產階級力量（與廣大僱傭勞動相聯合），並和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力量相援助地協力，獲得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對於這難的認識，就不可能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可能前途，因而便不可把這修正修正地組織鬥爭，更難發生在主觀上所謂社會主義，這是值得警惕的，不過，據現時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混淆，並且硬把社會主義的模範制度強加於中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財富本來是不可能平均財富，是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的模範制度強加於中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財富本來是不可能平均的，而且直趨於貧富不均者更趨劇。這當中山先生所不理解的，而由此就產生了「一種保存的觀點」。

關於民生主義土地問題上所實際應將也的認識，也正是和上述理論上的缺點互相關連。

第一、是實際策略上的問題，同時也是革命原則上的問題，就是在其最後提出「平均地權」原則的時候，沒有把「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實際問題聯繫起來，而事實上中山先生當時的主要想解決的，乃是城市中的土地問題。實際上我們已說到了的，在半封建的中國，假如平均地權沒有和農民取得土地的實際問題聯繫起來，對農民地權（即農人在城市）是不可能的。1924年以後，中山先生試圖實行平均地權的失敗（當時中山先生是說說社會上層人物來試圖實行平均地權），已完全證明了這點。

第二、由中山先生後「由平均地權」的口號進到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的改變，對於解決農

口說無憑的解決辦法，仍有一種「和平解決」的主張；誠然，中山先生這辦法在出發點是和「普魯士道路」有別的，因為中山先生在這問題上立基於農民的要求：「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完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耕者有其田）。而「普魯士的道路」却是立基於上層的貴族。然而在某程度上來說，其辦法却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普魯士道路」的任何色彩。中山先生對於中國農民的痛苦，在農運講習所那個演講中，可以說是形容得很好的；但他一方面「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另一方面却顧慮到「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顧慮到「如農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給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到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在一般歷史情形下，根據「農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受損失」（中山先生語）的理想，來解決耕者有其田的問題，其真實的困難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說來，中山先生這辦法是不主張變動地主過去所有的利益的，而只主張變動地主將來可能的利益。中山先生自己這樣說道了：「地主還是明白了我們平均地權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劃齊定的地權，還歸地主私有」（民生主義第二講）。所以中山先生所說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本來不是澈底的土地國有。但這裏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變動地主將來可能的利益，在實質上，也就是變動了地主過去所有的利益——即是變動了地主對於土地的私有和壟斷；另一方面，不先變動地主過去所有的利益，則要變動地主將來可能的利益，這又是不可可能的。

中山先生對於土地問題，除了按照地主自定的價格抽稅外，還主張政府照地價收買（即照地主所定的價收買）。中山先生或許是要經政府照價收買之後再給農民以土地。不過，誠如中山先生在耕者有其田的演講中對於中國地主所形容過的：「總是享樂為利，收起租來，三升一勺，一文一毫都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割奪」。中國農民的特別困苦讓連，被中山先生這幾句話所道破了。這是我們民族內部生活的最不幸，而且這恰是給外來強鄰以一個最基本的可乘的弱點。而這點也恰是說明了：爲什麼在歷史上想變換地用「普魯士式的改良的方法」來處理農民土地問題——這件事將會是如何地

討論。雖然，農民果能作代價從政府得到土地，我們就可以不問政府將何種方法獲得土地。其情形下，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反對任何方法。馬克思自己曾經認為：在工人階級並不拒絕向資本階級購買（例如，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這是一項可能的條件。雖然，這限於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地點。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由於城市農民的痛苦，由於地主在北收土地的教訓，政府會使得一部分地主在相當程度上感到自己存護步的必要，而可能願意由政府得到相當代價來讓出土地，或許政府可能在反帝抗戰勝利中由將來沒收帝國主義財產的項下，或可能發出一種不直接附加給農民負擔的公債，這將來向地主「購買」而轉給農民土地；假使這項可能的可能，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並不反對的，特別對於小地主，是帶帶這樣做。但是，農民所得土地這般該儘可能代價，因為：應當使農民成爲在經濟上可以自由發展的農民，而不應使農民在經濟上的自由發展，再受變態的新限制。

上述中山先生民生主義論上和實際實踐上的價值，其來源也正如我們關於民族問題那裏所說的。這些缺點反映了過去的落後的方面。中國無產階級已成爲社會中獨立的政治力量，中國農民在中國變遷緩慢領導下，經過多年新時代的洗禮，已不是過去的農民了，所以，一切要從新來估定，舊的已不適合於新的，可惜的，中山先生是不及見到了！

一、民生主義與民生改良主義的矛盾，正是中山先生時令主義的特點。

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在民生主義上，完全不要中山先生革命的精華，而却用二努力量假借中山主義反映過時東西的一些消極地方去殘酷地維持那陳腐不堪而造成中國貧窮落後的舊經濟制度。他們假借中山主義之名，去「操縱國民之生計」，並去阻礙資本主義企業的自由發展。假借中山先生「兩腳大筒小筒」的說法去壓迫工人如的工黨爲改良生活的鬥爭。這一切就和外國結合起來，變成中國國民經濟重受不斷的災禍，而使中國倒閉，使日寇便於進攻。爲造成中國更偉大的民族力量，痛改上述一切倒閉是急務的了。

…… 中國革命…… 經濟問題上之特別困難，這是已被歷史所證明過的，這種鬥爭在現歷史階段，奇蹟式地要求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但資產階級的主要份子却不能領導這鬥爭（也不用說到底），這是可憐的，但却是歷史的辯證法。在這些民主的經濟改革上，中國無產階級從來是最堅實最奮進的主張者。歷史特別教訓我們：農民如不在無產階級指導下，想要從封建土地制度的壓榨下解放出來，那真是無望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反對中世紀式一切野蠻剝削，使耕者有其田，使自己獲得八小時工作制，但這並還沒有從資本的壓榨解放出來，而是爲達到無產階級解放的進一步。全體人民如果不由封建剝削的壓榨達到資本剝削的解放，人民的真正幸福是沒有達到。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一方面反對經濟上任何民主的改革，不願意把中山先生經濟上任何民主改革的主張實現一點，但却宣稱人民在他們領導下可以實現社會主義，這只是和歷史開玩笑，而且是企圖掩蔽人民要求實行民主主義的現實民主鬥爭，這又不是中山先生的罪人？

五 關於三民主義的總結

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學說中，本有這樣的信念，以爲中國不應只謀與資本主義的歐、美並駕齊驅，而且，還應超越歐、美，使得可以「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其後」。關於這點，大概是中山先生關於社會主義之主觀的夢想，但是根據中山先生學說所表現的社會內容，中山先生却是在客觀上反映了中國在民族解放和土地解放之鬥爭中的急進民主主義的要求。爲什麼中國會有這樣急進民主主義的要求呢？關於這點，列寧曾這樣說過：「中國越落在歐洲與日本之後，便越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只有革命民衆的英勇精神，才能「縫紉」中國，在政治上創造「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土地國有化，以保證最快的資本主義的進步」。列寧的觀察是極深遠而正確的。辛亥革命失敗後，中國的四分五裂與民族危機的加劇，不是明證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的四分五裂與民族空前大災難的到來，不是明證嗎？這些革命的失敗，不正是因爲革命的三民主義沒有貫徹實施嗎？

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山先生就不斷地以新俄國新來轉環中國的前途。他披鑄中國革命軍人要去

「發揮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捨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世界。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便淪亡，四萬萬人便要滅種……」（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對陸軍軍官學校開學訓詞）。在另一個演說中，中山先生又說：「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將來變成一個什麼世界，我們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見到，但是把俄國現在是一個什麼景象來一看，便可以知道」（十三年對湘軍演詞）。當然，中山先生在該演講中所描寫的，十月革命後的新俄羅斯的幸福，也像中山先生所說的，是由於「反對世界上一切資本制度」而得到的，換句話說，就是由於俄國革命是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下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二月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就是由於成就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其政府又像中山先生所說的「叫做工農兵政府，是由工農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所以，他們的政府，所持的政策，對於這三種人便特別優待……」，因此，新俄羅斯才能造成那樣的富裕、強盛和幸福。這裏中山先生是對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工農蘇維埃表示了極高尚的同情，中國人民和世界共產黨人將永遠敬佩和紀念中山先生這種不朽的同情。但是，三民主義在中國的實現，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當然，還不是廢棄資本制度。中國革命是需要走上像中山先生主觀上所憧憬的前途的，因為這是最完全的、最美滿的、最澈底的合乎民族的利益的途途，而且是民族解放和土地解放達到完全的最後的保障。要做到這點，就是由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主義到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就是由封建的私有制度之廢去進到資本的私有制度之廢去，而要決定這樣的途途，就是要取決於中國社會力量對比的發展以及國際局面的發展。在辛亥革命中，列寧關於中山先生的原則的實現問題就這樣寫過：「這是否會成功和成功到什麼程度——這是另一個問題。各國在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實現了程度不等的政治上及土地上的民主主義，而且在極複雜的錯綜之下實現的。這要由國際局面和中國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來解決」。關於中國革命的是否由三民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途途，我們也正是作如是觀的，而這點正是需要中國革命先鋒隊——無產階級各方面的奮鬥及其最大的努力。

中國民族主義的實現，可以用四個主要的目標來加以簡要的說明：第一、民族領土主權的獨立與統一。第二、民族經濟的發達。第三、民族文化的復興。第四、民族政治的統一。這四個目標，是民族主義的具體內容，也是民族主義的實踐方針。...

民族主義的實現，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民族主義者必須堅持民族獨立與統一的原則，同時也要注重民族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只有這樣，民族主義才能真正實現其目標。...

民族主義的實現，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民族主義者必須堅持民族獨立與統一的原則，同時也要注重民族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只有這樣，民族主義才能真正實現其目標。...

民族主義的實現，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民族主義者必須堅持民族獨立與統一的原則，同時也要注重民族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只有這樣，民族主義才能真正實現其目標。...

從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各方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山先生基本上是革命的民主派，同時在民族主義方面，他極力主張民族獨立與統一。...

一方面有急進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另一方面也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一方面有美國式的解決土地問題的途徑，另一方面也有某種程度上普魯士式的解決土地問題的途徑。一方面熱烈同情於被壓迫的勞動羣衆，仇視剝削制度，另一方面也有對於階級的鬥爭之消極的看法。一般地說，中山先生關於民主革命之原則的提出，時常是急進的民主主義；而關於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却有時甚溫和的自由主義。

列寧把中山先生思想和俄國民粹主義來相比擬，這是很有興趣的，而且是正確的比擬。俄國民粹派創造者之一——黑爾春一個時候曾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動搖，雖則如此，但如列寧所說的，民主主義在黑爾春心中仍是佔上風。關於中山先生，這點是比較複雜些。比如，當他「上李鴻章書」和「上香港總督書」的時候，這是自由主義在他那裏佔上風；當中日戰爭後，特別是在戊戌政變後，民主主義又在他那裏佔上風；民初初期，自由主義在他那裏佔上風；「五四」以後，直到國民黨改組及其臨逝，民主主義又在他那裏佔上風（可興趣的，這時候他在一般革命的實際上是民主主義佔上風，特別是他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表現了他的革命高點；不過，他在廣東大學演講的「三民主義」的某些內容，又表現了自由主義佔上風）。

中山先生思想的兩方面性質，就其代表整個的時代來說，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國革命的覺醒，另一方面則反映了過去中國階級的餘跡。就其社會基礎來說，則正是被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所苦惱，又是被中國資產階級兩重性所苦惱了：第一，一方面反映了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急進民主主義（急進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及其不願上屬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則反映了他們階級的不足及其關於平均財產的主觀社會主義之保守的夢想。第二，一方面反映了資產階級的一定革命性及其對遠度民力之急進主義的同情，辛亥革命的起因是民主派與自由資產階級的聯合而爭取到了「的」，另特其方面進取欲了他們與其政治的有一定距離及其對於舊的東西之聯結。不從這些複雜的客觀去觀察了解中山先生思想，只不能了解中山先生思想各方面之極複雜的性質。

中山先生思想代表了「個時代」。時代沒有停留下來，而是繼續前進，或者只是反革命生活的發展。

初

，請大中山先生過時的樂園，而拋棄其現實的革命的精華，或者是根據革命生活的發展，發揚其現實的革命精華，同時克服過時的東西，這裏存在着很大的鬥爭。前者是以大資產階級為代表，而後者則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與一切革命的三民主義者在一起。這種兩條路綫的鬥爭，在現在中國抗戰的政治生活中，佔有很大的意義。

四 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

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中山先生屢次地指出了過去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方法的未善，而國民黨改組的意義，則是在於決定革命的新方法。中山先生在歡宴全國代表當中說：「我們這次革命，是先講方法，然後去實行；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方法，所以不能大功告成。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便是要定一個好方法」。在「國民黨改組問題」的講演中，中山先生說：「革命黨有力量推倒滿清，使反對者投於革命黨之旗幟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未善之過，使反革命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壞而不覺，雖至失敗，尚不知其所以失敗的緣由。若當時有辦法、有團體、事先防範，繼續努力奮鬥下去，……決不至如今日之一無成績。中國革命六年後，俄國才有革命，俄國革命黨不僅把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且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這種革命，真是澈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善之故」。因此，當時中山先生認為：「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將十三年前種種可寶貴的教訓和經驗來辦以後的事……由今日起，按照辦法條理，合全國而為一，羣策羣力，努力而行，則將來成功必定更大，此舉為今後之第一大希望。此次改組，即本此意」。

如何實施革命的新方法呢？中山先生說：「這些新方法，是本總理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經成功之後，所得的種種方法，用來參考比較，細心斟酌，才定出來」。毫無疑問的，中山先生當時規定革命的新方法，首先就是深受了俄國革命經驗的影響。代表大會未開之前，中山先生在其「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的演講中，就已坦白地這樣說過：「法國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國革命，血戰八年而始得獨立，因每無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國有之，殊可為我黨師法」。在歡宴代表中，中山先生說：「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講到結果，沒有俄國成功那

族與國家。爲什麼要聯共？因爲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總產權黨的政黨，是代表中國工農利益的政黨，是徹底代表我們民族利益的政黨，是能爲我們民族社會事業盡生死於度外而勇敢奮鬥，並對於中國革命有科學方法和步驟的政黨。爲什麼要扶助工農利益？因爲中國國民革命沒有廣大工農羣衆的參加，便不會成功，因爲工農大衆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因爲工農大衆的奮起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真實的基礎。因此，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決定，就是在於把國內外的革命勢力聯合起來，造成一個偉大的革命統一戰線，以求中國革命的勝利。爲什麼需要這樣偉大雄厚的革命統一戰線？這恰如中山先生所說的：「因爲中國的事業太大，要用四萬萬人的力才容易成功，不是一兩個人之力可以做得到的」。因爲要求中國進步，要求革命三民主義的實現，要求中國革命的勝利，非用羣力不鮮。要用羣力，便是在羣策羣力，大家去奮鬥；不可依賴一人一部份，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做去，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對黨員演講）。中山先生這種革命政策的決定，不僅表示中山先生偉大的革命眼光，而且也是表示了中山先生偉大的氣魄。大家知道：中山先生這種政策的決定，不是一帆風順就決定的下來的，而是經過了許多奮鬥，經過了許多說服，經過了許多挫折，才得把這些政策規定下來。革命的叛徒陳炯明就會實足以聯俄的罪名謀加害於中山先生，然而中山先生並不爲這種罪名所動，反而在陳炯明叛變之後，更堅決地確定這政策。現在，我們讀中山先生個人的許多信件及其各種演講，我們正可以看出中山先生關於這個政策奮鬥的許多事跡。中山先生曾流着熱淚說：中國革命當時「已經到了三十年，還沒有大功告成，還是因爲中國人革命的方法和氣魄不及俄國人，俄國人因爲有了這種氣魄和方法，所以革命一經發動，得到機會便大功告成。俄國革命的成功爲什麼那樣大而且快呢？因爲俄國人立志穩健，眼光遠大，把國家大事算到一百年，甚麼方法都計劃到了。」所以，中山先生在其致蔣介石的信中就那樣堅定地表示：「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所以，在事實上，中山先生關於三大政策的決定，就恰是企圖追蹤俄國革命家的方法和氣魄，就恰是在這種時代表示了中國革命家的「立志穩健，眼光遠大」。

關於扶助工農的政策，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很切實地繼續寫道：「吾人欲國家

民族主義實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的自由獨立，始有可望也。宣言又這樣指出：「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皆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如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待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組織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種不姓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從宣言中，我們可以看見中山先生指導下的大會正是認爲：民族解放運動與工農運動，是絕不可分離的，而且認爲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要成爲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必須提對工農運動及其組織的扶助行動中證實出來。在國民黨代表大會後，中山先生更大去地鼓舞了工農的組織和武裝。在「農民黨聯合會」的演講中，中山先生說：「你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向來是怕外國人的，凡是中外發生了交涉，中國人總不敢講話，但是這次沙面的工人抵制他們，因爲當很堅固的團體，所以，遇到外國人發生苛待，便全體罷工，要求列強取消。列強因爲看見工人有根堅固的團體，所以不敢再壓迫，便要同工人來講和。由此可見，工人要有團體，才可以保護自己。你們各鄉農民向來不知團體，練農團軍來自衛，所以總被人欺負，如果要以後不被人欺負，便要從今日起結成團體，挑選將家們帶下來練農團軍。你們能够這樣進行，政府還可以從中幫助，用低價格賣給你們；你們有了槍，練成了很好的農團軍，便是中國第一等的主人翁，能講很有力的話」。又說：「大家知道民國是要人人得安樂的，中國的農民向來是很痛苦，今日開這個農民聯合會，是中國政府向農民見面的第一次，是政府爲農民謀幸福的，爲農民爭利益的。第一日，你們到這個會的人，知道了辦法，回去鄉村之後，第一步奮鬥的工夫是要大家聯絡，結成團體。大家做到第一步的工夫，有了團體之後，才可以做第二步的工夫，第二步工夫就是爲農民爭利益」。中山先生不僅對於農民做了這樣熱情的直接鼓勵，而且在其督師留滬時，還熱情地約了

蔣介石氏一旦這樣永遠為中國革命事業所唾棄的條件：「新到之武器，常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其兵皆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之緊要革命同志招集」。從工農革命團體中，招集戰士以組織決死之革命軍，這正是表現了中山先生革命氣魄的最高點，而且這正是指示了爭取和保障中國革命勝利

的道路。

關於聯共政策，中山先生始終表現了堅決。在國民黨改組時候，中山先生的態度，有如蔣介石氏所述的：「總理容納共產黨的同志加入國民黨，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針的，決不是隨隨便便。是了。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激進革命以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實在能替國民黨求進步、求發展，促進本黨的革命精神，所以總理就下了這個最大決心，不為衆論所搖動，並且總理曾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共產黨，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產黨」。為說服國民黨黨員中懷疑聯共政策的人，中山先生在代表大會中還特別做了一次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說明「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希望國民黨「新舊同志因誤會懷疑而生之暗潮從此便可打消」，使國民黨得以「成一最有力之國民黨」。毛澤東同志在其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有名談話中，對於當時國共的合作，也有同樣的記憶：「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一九二一年，自成立以後，中山先生與共產黨員便有着密切的關係，所到到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決心改組國民黨時，便公開與共產黨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是非常親密的，即不僅建立國共兩黨的國民革命聯盟，而且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組織中去，共同担任革命的工作。當時共產黨在全國不過幾百黨員，成立歷史不過幾年，而且共產黨並以個人資格去加入國民黨，去共同為國民革命而奮鬥，即在那樣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會向共產黨員提出過除三民主義外，不允許同時相信共產主義的要求呢？沒有！即在那樣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提出只許國民黨一黨存在，不允許共產黨同時合法存在的主張呢？沒有！不僅沒有，而且中山先生還堅決反對別人提出這種要求和這種主張」。是的，中山先生正是具有這樣光明磊落的革命倫理主義者的態度，而且，如上面引的蔣介石氏的話所說過的，他得以為：如果國民黨員反對共產黨，他自己便要去加入共產黨。國民黨的聯共政策

，就是因爲中山先生這樣英勇奮鬥而確定下來了。

關於聯俄政策，如大家所極熟悉的，在中山先生臨終前一切的言論行動中，都表現了絕大的友誼的熱情。中山先生不僅在一切言論中，對於蘇維埃政府與列寧頌揚極致；而且在革命行動中，始終計劃如何去把中國革命和蘇聯直接接起來。他給蔣介石的信，有一封就這樣道出了自己的希望：「若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再圖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開一條聯結西北之交通綫，如陝、甘等地，則西北之經營乃容易着手，蓋西北所欠者在人，如無捷徑可通，專靠繞道海外，殊屬艱難也」。中山先生這信中的意思，是希望獲得一個與蘇聯直接交通的道路，以便更進一步地取得蘇聯對於中國革命的幫助，而不必專靠繞道海外（所謂「專靠繞道海外」，指的是當時蘇聯對於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援助，因爲避免帝國主義的干涉，不得不在海上經過許多困難的繞道。而且接濟到時，廣州當局還力求避免帝國主義的耳目去起卸。關於後一點，中山先生在致蔣介石的信中，曾主張以「公然起卸爲妙」。這也恰是表示中山先生在態度上的堅決）。極悲壯的、極沉痛的、而且是永垂不朽的，是中山先生在其臨終時所給蘇聯的遺書，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在這遺書中，表現得再真摯不過的了。這遺書這樣寫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囑所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羈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束縛；爲達到此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

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等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火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藉以兄弟之說祝你們平安。

我們的同胞，永遠不要忘記中山先生遺囑表現出我民族真摯熱愛的遺一個遺書，遺遺書，是當時代表我們民族向全世界人類的最悲壯的宣言書，遺遺書，不僅永久遺愛給中國人民，而且也遺愛給全世界的人類。遺遺書，在在中國民族歷史以來的一切文獻中，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完全如中山先生夫人——這位中國偉大的女性，與中山先生名字同垂不朽的女性——宋慶齡女士所說：「要實現三民主義，只有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對內聯合革命的政黨，共同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孫中山先生這個主張，一直到臨終的時候，並沒有絲毫改變。」（「對於國共二次合作發表感言」）。是的，中山先生臨到最後一瞬，對於三大政策是沒有絲毫改變的。而且中山先生因為四十年革命的經驗，深深地領略了帝國主義者分裂革命陣綫的陰謀詭計，深深地領略了中國反革命派「破壞革命事業」的「聰明絕頂」（見關於「中國國民黨改組問題」的演詞）。所以，在臨終時，還這樣的警戒了國民黨人：「我死之後，敵人便要軟化了你們了，你們是很危險的」。

中山先生逝世初時，大部份的國民黨人遵守了中山先生的遺教，決定繼續中山先生國共合作的政策。當時國民黨的革命人物，在革命最困難的環境中，把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執行得很是堅決，而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也正完全表現了其患難朋友最高的友誼，有苦共嘗，有難共担，並且總本其「身為人先」的精神，總本其如中國古代哲人所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態度，不顧生死，為援助革命的國民黨保衛革命的廣東而戰鬥。極可痛的，是：帝國主義者利用了首先被軟化的分裂份子，把忠勇的民族戰士，始終主張國共合作最努力，並最努力去幫助中山先生成就這合作事業的國民黨偉大領袖之一——廖仲愷先生刺殺了。然而當時還沒有動搖了國共合作的政策，沒有動搖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帝國主義者想毀國共合作，分裂民族革命統一戰綫的陰謀，其唯利用的口號，是「反共產」。在五卅運動後，這口號被叫得特別起勁。反革命的分裂份子就是利用了這個口號去作爲刺殺廖仲愷先生的藉口的。當廖先生被刺之後，當時黃埔軍官學校校長蔣介石氏

這種痛切敘述道：「蘇生死的死，是為國、為黨、為我們軍官學校、為籌備而死的，是被帝國主義者用以共產的口號來打死的，以後我們應當與反共產派的人為鄰……現在我們的環境非常險惡，處在四面楚歌之中，最厲害的是帝國主義用以共產的口號，來離開我們的同志，中傷我們同志，要做廖先生的學生、同志，就應該說着反共產派的行為。……如黨代表死後，我們還不澈底醒悟，適中了敵人的計。大家以後務要選擇黨代表的遺志和平日指示我們的：現在，我們第一要反對反共產派，其次為黨代表復仇，這兩句語無懈到了，無論走遍天下，也是無敵的，也沒有打得破我們的階級的」。正是因為當時不為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詭計所動搖，這樣堅決的繼續中山先生和仲愷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結果才把陷於「四圍楚歌之中」的中國革命廣州挽救過來，終於能够排除萬難，克服大敵，轉危為安，使革命勢力得以繼續發展和擴大。如果不是這樣，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說的「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了。

關於中山先生所規定的三大政策，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在廣東最困難的時期，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如蘇方昇的時期，曾被國民黨領袖多所發揮。蔣介石氏在其「告國民黨同志書」中，關於與共產黨合作的政策，給了以下率直的表明：「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為總理所特許，第一和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果使兩種主義根本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忠於和黨，寧肯貿然決定，以貽本黨之危險」。總理今聞已逝，然當其在時，此種疑懼，實已起於「龍像隱志之間，同志中已有為反共產之運動。中正自出席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結果如何？總理蓋啟嚴警告「反共產」之同志，而又決定仍容許共產黨同志之在黨也。總理之所以如是，及總理之偉大。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誠不同於共產主義，而其為革命的主義則同。總理深知必能包括共產主義始為真正之三民主義，同時亦必能容納共產黨，始為真正之國民黨也。今日中國革命已為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中國革命成，則世界革命為之促進，而世界革命成，中國革命始真正成功。總理自信三民主義能兼容共產主義，而決不懼共產主義將蠶食三民主義」。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大會，蔣介石氏做了這樣的演說：「國民黨的同志，對於共產黨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對，因為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着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但是

了帝國主義的毒計嗎？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可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從繼續，每信御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因為總理容納共產黨加入本黨是要團結革命份子，如果我們反對這將去，張，就是要拆散革命團體，豈不是革命黨罪人？」在告軍校同學書中，蔣介石氏這樣說：「當時總理以容納共產份子為革命原素之一種，中正亦以為本黨非容納共產份子，不成其為國民黨，且革命團體非聯合共產份子，實為國民革命之缺點」。在答覆張溥泉的信，蔣介石氏又說：「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與仲愷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須團結，共產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爾共認。本黨今日策略既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而乃欲排除，豈非矛盾」。又說：「愛黨必以其道，革命勢力不求團結，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共產黨合作之政策，因革命必須徹底，不能稍違總理末年欲高舉革命紀律改造本黨之精神」。這些真理，不幸有人未能了解，或者擇善而未固執，而弄成了大錯。

關於扶助農工的政策，十五年五月三日，蔣介石氏在廣州五農兵聯合會所報告的「工農兵大團結的意義」也敘述得很清楚。他勢頭轉重地把中山先生關於工農政策的原則聲明一下：「本來，總是在世時，改組國民黨，最重要的職是確定了「國民革命之運動，必得參閱農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這一個原則，蔣氏隨又歷舉國民革命軍作戰勝利的實際經驗而這樣說：「武裝的軍人，對於革命固然要努力，但是，武裝的農工，在革命中的關係比較軍隊更為重要，因為軍隊的數量有限，而農工農眾則無限量的，工農能來革命，這個革命才能成功」。蔣氏在報告中敘述了當時奉系軍閥在馮海時摧殘五卅工人運動的罪惡，他說：「去年五卅運動時候，職工運動的發展，幾達於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度。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人數二十餘萬，時間三個月；後來，因帝國主義者勾結奉天軍閥來圍殘壓迫，竟致失敗，這是中國軍人壓迫農工的最大恥辱。我們革命軍，必須全力奮起來為農工復仇，打倒這些賣國軍閥，也是為軍界來洗清個恥辱」。蔣氏在報告中說出了工農軍眾在最後勝利以前所可能困難的過際：「我有一句話要貢獻於各位的，就是我們農工軍眾要得到勝利以後一定有很多難不倒的挫折，被軍閥和帝國主義走狗來摧殘我們農工；不過，我們要預備對這種反動勢力奮鬥，愈受挫折，愈要強硬，百折不回，來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此時惟有更加鞏固工農兵的聯合陣綫，同時，又

要更加嚴密我們各團的組織，各團的紀律，使農兵自身之各能迅速發展」。在那個報告中，蔣氏最後給了這樣的結論：「我們相信革命軍能努力為工農謀利益，而全國工農又真正能參加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便可以成功。我們的目的，第一要使革命軍與工農羣衆聯合起來；第二步要使軍隊完全成爲工農羣衆的軍隊；最後便使軍隊成爲真正的勞動軍，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一九二七年孫科氏在其爲湖北農協全省代表大會所作的「國民革命中之農民運動」文章中，對於農民運動也這樣說過：「中國的農工，既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國民革命竟把農民除外，那一定又再蹈前此辛亥革命之覆轍，縱使軍事上幸得成功，但這種革命仍是沒有意義的。反之，如果我們能够訓練一班良好同志去領導農民組織起來，那便可以造成一個偉大的民衆力量，拿這個偉大的民衆力量來做革命的主力軍，便無論任何軍閥，任何帝國主義者，都要給我們打倒了。所以，爲革命工作的成敗着想，我們對於農民運動也再沒有可以懷疑之處了」。

關於聯俄政策，關於中國革命必須聯合蘇聯的理論，更到處散見於當時蔣氏等一切的言論中，在我這裏，是無需多再摘引的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幫助外，關於當時蘇聯與華聯與廣東國民黨領袖之間的關係。如大家知道的，那種關係，會特別爲一切反革命者所遺棄。在「告國民黨同志書」中，蔣氏關於這個關係的真相這樣寫道：「鮑羅廷同志之爲政治顧問，爲總理所特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其真理，絕無所謂「包攬」、「專斷」之事實，此不獨鮑顧問爲然，而鮑顧問固亦如是」。根據當時困難中的事實，不僅是證明了中蘇革命聯盟的必要，而且也更進一步地證明了蘇聯的幫助中國，是極大公無私的，是完全出自人類的正義。

三大政策是整個的，正如三民主義是整個的。這三大政策是不可分裂的。而且，正因爲三大政策是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方法和道路，因此，三大政策與三民主義的關係亦是整個的；放棄三大政策，在實際上必會變成放棄三民主義，而要實現三民主義，就必需要加強三大政策。中山先生定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而三大政策就正是救國方策。是的，因爲決定了這三大政策，晚年中

中山先生是被帝國主義者所極度嫉恨的。中山先生及國民黨被指為「赤化」。然而，什麼是「赤化」？北伐中蔣介石氏在「長沙重申出師意義之宣言」中給了一個最合乎真理的敘述：「吳賊所發偽說者，厥爲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所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世界革命聯合戰綫之口號也。而赤爲何物？蘇俄之赤黨與赤軍，以赤誠表示其革命，民衆之赤化，而保其國家獨立自由之代價也。解放人類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衆爲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白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而爲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類謀解放者也。帝國主義口中所謂赤化者，實行革命之民衆化耳。政府爲民衆化之政府，軍隊爲民衆化之軍隊，以民衆化之國民革命軍擁護多數被壓迫之人類。即便云赤，何嫌何礙？」蔣介石氏於此接揭更揭穿了一切反革命派關於「反赤」的真相：「吳賊之意，凡愛國者皆赤之，爲求中國平等自由者皆赤之，反對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皆赤之，充塞至矣。則舉吾四萬萬愛國之同胞者赤之，吳賊甘爲帝國主義者之走狗，願與吾民衆爲仇讎，其口吻極應知覺，然吾愛國同胞，則非揭破吳賊之陰謀，聲討吳賊之罪惡，不能聊其眩惑人民之工具也」。在蔣氏言中，我們可以了解帝國主義者及中國一切反革命派關於所謂「討赤」「反赤」的叫囂，究竟是什麼意義，中山先生正是不懼「赤化」的，所以敢揭出這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中山先生正是要反帝反封建而與被壓迫人類共同革命的，所以就不懼「赤化」。中山先生在這裏所表現的偉大勇氣，正是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人民的大仁大勇。

中山先生關於三大政策的決定錯誤了嗎？中山先生這決定是不錯的，這決定是完全正確的。爲什麼中山先生晚年所訂下來的政策是不錯的呢？因爲事實上證明了：自三大政策規定而後，國民黨的威望提高了，國民黨的力量增強和擴大了，國民黨內的政治生活活潑起來了，國民黨內的腐敗份子減少了。因爲有了三大政策，並因爲堅決執行了三大政策，所以許多困難是被克服了；中山先生在世時克服了商團的叛亂，中山先生北上垂危時，革命軍攻下了中山先生多年企望攻下的潮汕；中山先生逝世後，革命根據地的情形是更困難，敵人軟化的陰謀更厲害，帝國主義者直接干涉的手段更兇惡，反革命派的活動是更積極，然而，這一件一件都被克服了，不但克服了這些困難，而且革命勢力是一日

千里地發展了，廣東統一了，兩廣統一了，北伐勝利了。真正如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所指出的，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依然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因此便有一九二五——二七年北伐的大勝利」。正是在這時候，表現了國民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事。是的，中山先生晚年的政策是不錯的，歷史的事實是這樣地告訴了我們，歷史是不可以捏造的。

可是，一九二七年後，為什麼革命失敗呢？無可爭辯的，這是由於革命統一戰綫的分裂，由於三大政策的廢棄。拋擲這國共的分裂的，乃是帝國主義者以及一切漢奸小醜。歷史的事實同樣地是無可爭辯的，當年在國民黨內最積極反共的份子（如廖斌），當年最積極去挑唆國民黨人放棄三大政策的份子（如黃郛），當年在「帝黨」時候最殘酷屠殺共產黨人的份子（如陳羣），這些後來都成爲賣國賊，都是中華民族萬世不敵的漢奸小醜，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豢養的偵探間諜和政洽小醜。歷史的事實同樣地是無可爭辯的，多年來在國民黨內反共最積極的份子如汪精衛，本來就是日寇的代理人，而現在已成公開的漢奸帝國賊。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及這些漢奸醜類的「反共」運動，不是別的，就是分裂民族的活動，分裂民族統一的活動，「以華制華」的活動。反共——還是分裂中國民族的另一個名稱，是帝國主義者和賣國賊接降派滅亡中國最險惡的陰謀，是帝國主義者所豢養的「華制華」政策最巧妙的運用。帝國主義者這種陰謀的成就，使得中國民族陷到空前殘酷的大災難中。三大政策的放棄，結果是中國在國際上孤立了；無數的民族優秀份子，志士仁人、革命英雄、民衆先鋒爲之身首異處；國民黨和工農民衆斷了聯絡了。「中山周刊」第八期，有一個國民黨員愛天先生寫的一篇「先健全自己的」文章這樣痛切寫道：「我們國民黨最大的失敗……就是黨的紀律太壞，簡直沒有什麼嚴格的紀律！尤其是在北伐完成後，直到現在的十一年中，黨的紀律更壞！黨員之腐化貪污，被人目爲「新貴」；軍閥、貪污土劣、流氓地痞，一切腐化投機的幫勢力，皆藉土重來重蓋據要津。結果黨怎樣不腐化？人民怎得不埋怨？一切無勞勢力，藉藉國民黨的招牌下橫行無忌；而橫行無忌的罪名，由國民黨負之」。這位忠實國民黨員這樣自己批評的精神是十足爲矜式的。而這種關於國民黨的不幸狀態是在國共分裂以後才存在的。「大公報」在其關於「孫中山逝世週年紀念」

紀念的批評這樣寫道：「假令孫先生逝世後，人們都照孫先生那樣誠實，那樣奮鬥，中國國力，一定比現在大得多。孫先生的主義，早是中國建國的正式方針了。但我們大家奉行的，或者越誠不越，或者見識不廣，或者在革命名義之下，而行爲寬官僚化、軍閥化。當然，建國的障礙本來不少，而最大的障礙，毋寧說就在我們自稱奉行孫先生主義的人們自己的精神與行爲之中。」所謂「在革命名義之下而行爲寬官僚化、軍閥化」，這正是特別表現在國共合作以前和國共分裂以後。爲什麼國共分裂以後，國民黨會陷於這樣不幸的狀態？不是別的，就是因爲國民黨失掉了能幫助國民黨求進步求發展的諍友，失掉了工農革命大眾的聯繫，使得一切城狐社鼠得明目張膽地去利用國民黨作爲罪惡的憑藉。在上面所引的「中山週刊」的同一文章裏面，那位作者關於國民黨又有以下的話：「本黨自掌獨政權後，黨員之精神墮落益甚，而黨員之社會成分，亦有重大變化。十三年至十六年間的青年與工農黨員，以後即突然減少。這樣使得本黨的羣衆基礎，大爲削弱，爲本黨之致命損失」。這些話是對的，而這「致命」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國共的分裂。

民族力量的分裂，國民黨基礎的削弱，反革命派的捲土重來，國際上的孤立，這些都是從國共的分裂中表現出來，而窮兇極惡的日寇，就這樣地乘機而入了。這樣一算，到「不備內部紛爭不已，而且招致來空前未有的外患」（毛澤東）。所以宋慶齡女士就這樣慨乎言之：「假如孫中山先生國共合作的主張以及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能够繼續到底，則中國國內封建勢力早已剷除淨盡，帝國主義也早被驅逐出去，而中國已成爲獨立自由的中國了」。

民族慘痛的災難，把中山先生晚年三大政策的真理磨鍊得更加堅定。完全如宋慶齡女士所說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這民族危機千鈞一髮的今日，一切過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應該一筆勾銷，大家一心一意爲爭取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共同努力」。是的，中國共產黨在這點上就首先表示了最坦白、最真摯的政治襟懷；中國共產黨爲挽救民族的清物，爲關心我民族當前及世世子孫存亡的命運，在一九三五年華北事件後，於是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這種昭告於天下：「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

請各軍隊開槍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財力、軍力、武力等）去爲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由於全國民意所歸，經過國共兩黨英明的有力領袖的努力，在日帝國主義領土侵略的前面，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終於建立起來了。而這就在成就着中華民族的更生。「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造成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蓬勃發展和北伐軍的偉大勝利；而國共關係破裂，便造成了十年來外患內憂空前嚴重的局面；現在國共兩黨一經合作，對外便能發動空前未有的、光榮的自衛抗戰，對內便能造成近數十年空前未有的政權和軍隊的統一，更造成空前未有的全民族中各黨派、各階層力量的大團結，使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感覺到，這是中華民族生死關頭中的唯一生機和希望」（「毛澤東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談話」。

上面我們會引述過中山先生的話，認爲中國的事業太大，非用羣力是不容易成功的。所以，中國的拯救，必要依賴於民族力量的團結，而中國民族力量的團結，首先就是需要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爲什麼呢？因爲中國民族基本的力量是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任何黨派要團結民族的力量而拋棄了工農的力量，這必然是架空的，是完全不可能的；要聯合工農的力量，爲什麼就必要與共產黨合作？這正如宋慶齡女士所說的，「孫中山先生主張國共合作，因爲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黨」。以國共合作爲基礎而團結民族的力量——這是根據中華民族力量構成的特點，也是根據我民族社會歷史奮鬥的調度。惟其是如此，惟其是國共兩黨是中華民族的兩大政黨，因此，這兩大政黨的的合作，就馬上能建立起民族革命統一戰綫——現在是民族抗日統一戰綫來。惟其是如此，惟其是國共兩黨是中華民族力量的兩大政黨，所以盧溝橋事件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够實行對日抗戰的根本前提，便是由於國內民族力量的團結和統一，而我國民族力量團結和統一的具體方式和具體內容，便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爲基礎的各黨派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毛澤東，同上）。

是的，我們不能以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形成和建立爲滿足。橫在我們面前的，關於抗戰建國的各事業是異常的艱鉅，是需要長期的奮鬥；同時，日寇、漢奸、任派汪派正在用各種方法煽惑離手

段來挑撥這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挑撥國共合作，而一切投降派也正在進行這種分裂的陰謀，因此，我們就必需更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來加強和激發我民族之無限的力量，來粉碎日寇、漢奸、托派、汪派分裂我民族的陰謀，來粉碎一切投降派正在進行之陰謀。抗戰初期，國民黨已開始開啟着中山先生光榮的革命三大政策的門戶，這點是從國共合作的重新建立表現出來，從中蘇聯關係的親密以及蘇聯有機會重新對於中國大量援助的表現出來，從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所決定的「抗戰建國綱領」表現出來。是的，應該恢復孫中山先生全部的三大政策，而且，爲着完成我們空前艱難的抗戰建國的大業，爲着最後完成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的大業，對於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比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代，比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還應執行得更堅決、更貫徹、更普遍。在這些方面，如果有一點再動搖或變節，必將禍國禍民、遺臭千秋。

五 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三民主義

爲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不忘記、所感感謝的，是：首先原始地（雖然還不是真實地）介紹馬克思學說到中國來的，不是別人，而恰是國民黨人。如大家所知道的，爲中山先生及國民黨人所敬愛，而以身殉革命的朱執信先生，就是原始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到中國來的一個人。孫中山先生關於朱執信先生說道：「我們有個最好的同志，就是朱執信。他的學問是很好，對於革命事業又非常熱心」（民國九年十一月四日在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席上演詞）。這位國民黨最好的同志，在「民報」時代——在同盟會時代，照戴季陶的話說來，就「算是一個熱心贊同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人」。說到中山先生，他對於馬克思主義也正是很早加以讚揚了的。民國元年，中山先生在其關於「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的演講中，首先就這樣稱道過：「有德國……麥克司（即馬克思的另譯名）者出，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卒爲『資本論』一書，闡發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說，遂成爲系統之學說，研究社會主義者咸知所本」。在這裏，中山先生完全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中山先生在同一講演中，并下又繼續說過：「現在之所謂經濟學者，恆分三派：一、舊經濟學派之如斯密與丹派是；二、新經濟學派，如麥克司派是。各國學校教育多應用舊經濟學，故一般學者深受舊經濟學之影響，反對社會主義，主張斯密與丹之分配法，縱資本家之壟斷，而壓抑工人，實而誤信舊經濟學說之過當，其對於新經濟學之真理蓋未研究之耳。」中山先生晚年，在其民生主義的演講中仍這樣稱道了馬克思：「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在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表以前，世界上講社會主義的都是一種陳腐甚高的理論，離事實太遠，而馬克思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主義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所以，後來學者把社會主義的人分作兩派，一是叫做烏托邦派，這個烏托邦派和中國實、老所說的漸漸派之國，意也相同；一是叫做

界共產主義社會、解放世界工人階級與全人類科學學說。他們的學說，本是那一個國家科學的專利品，而應為全世界人類所共同享受一樣……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我們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大民的財產」（洛甫：「中國共產黨十七週年紀念」）。事實上，馬克思、列寧的不是中國人，正如馬克思本來也不是俄國人一樣。科學的運用，是不受國界限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我們中國，就是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的奴役解放出來並進而擺脫資本的奴役的科學，是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科學。這科學在我們中國，不僅要繼承西方的、世界的一切最好的革命學說，不僅要領悟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怎樣生動地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而且，要繼承我們中國一切最好的固有文化傳統，繼承中國古代最好的哲學傳統和先進思想家理想的傳統——特別如墨家的哲學及其理想，繼承百年來中國革命的傳統——如太平天國的革命傳統，戊戌政變的英魂流血苦譯的唯物論的嚴肅哲學的傳統，繼承近代中國國民革命劃時代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而特別是他的三民主義之革命的精神。

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空想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會憑空從海外移植到中國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可以販賣的，而是在中國現實的歷史基礎上生長起來，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已有將近百年的歷史，當它在海外已盛大流行的時候，而在中國，却還沒有人知道，這正是因為中國那時還沒有存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基礎。朱執信先生在「民報」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原始介紹的著作，以及中山先生的說到馬克思學說，這恰是反映了中國已有發現馬克思主義可能的初步社會基礎的存在，也恰是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之不可避免的發展（在同觀會時代、南洋及其他國家的華僑中已有工界團體的組織，成為同盟會的支柱之一）。辛亥革命時候，那時列寧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正在過革命鬥爭的生活，還沒有蘇維埃俄羅斯，也還沒有共產國際，在他論中山先生那篇文章中，根據中國社會的發展，他也指出了中國必將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出現，而同時在那文章中，也無疑地已啟示了中國會有馬克思主義的出現。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成爲自覺的潮流，成爲自覺的力量，這是根據於中國工人階級基礎及其力量的發展，是在工人階級運動由自在的階級發展到自覺的階級的時候（工人運動沒有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便不能成爲自覺的階級），一談起來，就是在五四運動之後，而在這時候，和上述的社會基礎相隨而來的，也正是中國社會意識的發展，文化傳統的發展已最能衝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的時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近代文化上已更有繼承根基的時候。這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出現，更已不是所謂簡單的「外來貨」了。

正因為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空想主義者，所以我們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具體化起來，換句話說，使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列寧在「左派幼稚病」書中，曾給了以下的啟示：「……有國共產黨人，應該自覺認清根本的任務，同樣地主義與「左的」清談主義鬥爭；更要把在這種鬥爭中，由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情勢（愛爾蘭等）、殖民地宗教派別等等之特質所形成的，所必然形成的具體特點加以估計」。底下，列寧又說：「在各國解決統一於國際任務……考察、研究、探察、揣摩和熟知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點，是一切先進國家（不啻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所遇到的最主要任務」。

有人說，中國是「特殊國情」，所以中國不合於馬克思主義。又有人說，中國沒有什麼「特殊國情」，所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就沒有任何特點。這兩種說法都是不可救藥的錯誤。第一，馬克思主義是否合於中國國情，這只有從活生生的中國歷史的分析中，就可以得到結論。而且歷史和革命專業已經證明了：關於中國歷史的發展，關於現代中國社會的性質，關於中國革命的動力與現階段的任務，關於中國革命的方針以及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等等，都依賴於馬克思主義之正確的分析並爲之指南。而且歷史和革命事業也業已證明了：只有馬克思主義之科學的正確分析，是真正正確的結論。關於這點，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與中共黨人的私言，而是凡是期望正確地去了解中國和關心中國命運的中國開明人士——包括有國情論者——的公言，這些開明人士，也是曾試用過或企圖試用馬克思主義來了解中國的國情的。第二，如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沒有任何特點，不需要估計到中國的

抽換的教條，把馬克思主義從活的生活隔絕起來，這也不是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左的」清談主義。事實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不著於繼承自己民族的革命與思想的最好傳統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就會這樣宣言過，他們是「繼續俄國一切以前的革命運動的事業與傳統，提出爭取政治自由為整個黨最主要的迫切任務，而社會民主黨的目的，是早為舊的、民主黨的光榮的活動家所明白指出了的，但是社會民主黨選擇了不同的達到目的的方法和道路」（按：這宣言所指的：「目的」，是推翻俄國沙皇制度）。又如大家所知道的列寧時常稱道了俄國的革命先聲，並以很大的關心去研究他們的革命學說——特別對於車尼雪夫斯基，對於這位俄國民粹派堅苦卓絕的偉大創始者。這種對於自己民族的革命傳統的態度，正是其他民族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取法的。

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科學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出現時候，中國民族民主革命距離成功還很遙遠，而且這是異常艱苦的鬥爭，這樣，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遺棄產階級革命而善盡其責任的歷史任務，不能不負起自己特別重大的責任來。本來遠在孫中山先生出世之前，馬克思主義在各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就已根據各國具體的歷史條件，提出了各種完滿的民族民主政綱，提出了堅決反對民族壓迫，主張民族獨立的政綱（例如對於愛爾蘭、印度、中國及其他），提出了反對專制制度，主張民族自由的政綱（例如對於德國和沙俄及其他），提出了反對封建剝削，主張勞動者有其田和土地國有政綱（例如對於德國和沙俄及其他），這一切散見在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歷史文獻，是為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一切政綱的提出，是站在共產主義擁護各種歷史上的進步運動之立場，而其最後目的在於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鬥，這也是為大家所知道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自己民族中，根據中國具體的歷史條件和自己的責任，同樣地提出了自己關於民族民主革命之最完滿和最徹底的政綱，作為全體人民和自己奮鬥的方針；對於這種政綱的提出，當然地，不是依傍於別的主義，而也恰是根據於共產主義在一定歷史的獨立立場。同時，中共黨人又努力於一切革命努力、民主勢力之團結（民族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努力和那與孫中山先生為領袖的革命民主勢力合作

；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方面抽引、保護、和發展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革命民主主義的精華，另一方面又幫助孫中山先生把舊三民主義變成新三民主義，並承認這新三民主義爲國共革命統一戰線的政綱。中共黨人這種對於革命民主派的態度，是珍重民族的革命傳統，同時也完全符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

本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是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不可混淆的，而作爲民族民主革命政綱看的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綱，也正是不可混淆的。共產主義主張民族的獨立，並經此更進到世界各民族的自由聯盟和大同。共產主義主張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民主主義（在中國是新民主主義），並經此更進到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剝削的社會主義之民主制度，過渡到政權的「衰亡」。共產主義主張徹底消滅封建的土地剝削制度，並經此更進到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把生產工具由私有轉變爲公有），而逐步地由「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到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這種將來方面，三民主義的政綱和這些是基本上的不同。同時，正因共產主義者有其偉大的將來，以將來的事業，爲其奮鬥最後的目的，所以，他們又對於現在的事業能最堅決、最義無反顧；因爲只有現在的事業做的最完滿最徹底，現在的事業之勝利才有保障，而將來的事業也更有望。共產主義者對於這種現在的、事業的切實、堅決和徹底，正是從其綱領表現出來，是從其革命方法表現出來，是從其革命的實際行動表現出來。

國際帝國主義的間諜托派對於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是兩面派的手法，一方面把它當成狗屎，認爲它一文不值，另一方面說它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說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科學共產主義及其政黨在中國就沒有存在之必要。這兩面派的手法就是托派反共的一種手法，就是托派破壞中國團結抗戰、破壞中國革命偉大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無產階級進一步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將來而奮鬥之惡毒的手法。

毫無疑問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真正的三民主義者，正如中國歷史事實所要求的，正如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需要承認共產主義的存在；同時，共產主義者爲實現自己的事業，首先需要在一定的

歷史運動上領導三民主義的革命事業，爲新舊民主主義的奮鬥。『反共』——這是罪大惡極的口號，是帝國主義者企圖滅亡我民族的口號。這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大革命時已被蔣氏所痛切割釋了，接受『反共』的口號，那就決不是中山先生革命的信徒，決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反共產』的口號是與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共存在的，而真正的三民主義者，却必須努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法西斯蒂，爲挽救中國而奮鬥。同時，如果有一種人，他們在革命運動中，不懂得三民主義之一定歷史的進步意義，無原則地鄙視三民主義，或夢想等一應盡到共產主義社會，那就是鬼戲，那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是真正共產主義者。那也正如中山先生所說的，是『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

毛澤東同志在與『新中華報』記者的談話中，曾引伸了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關係的演講，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從中山先生……演講裏面，我們應當得出那點結論來呢？結論應當是：第一，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能夠相容並存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一個很好的朋友關係；第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人，實際上是不能三民主義的人，特別是不知民生主義爲何物的人，這些人應該是國民黨中的極少數；同樣，認爲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人，實際上也是不了解共產主義的人，他們是不了解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相互關係的人，這種人也是共產黨中的極少數。而對於這種問題的解決辦法，中山先生認爲只是從一方面的人行過，任何一方面不能因此來反對另一方面的人及其主義；第三，中山先生認爲，不能主張共產主義的人應該『三民主義』；同時，中山先生指示：主張民生主義的人，也應該細心去研究共產主義。這是一種光明磊落的公無私的態度。我們共產黨員，非常贊美中山先生這種態度。的確，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思想和主義，不會是某一個人或一個黨的專利品，它應當而且必然歡迎別的任何人和任何黨來研究，來實行。我們不僅願意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同樣，我們更歡迎任何人——首先是國民黨同志們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來研究共產主義』。

有些不願以改革爲目的而私利的份子，在民族大災難中，在抗戰的烽火中，在抗戰三民主義了

以及全國急需鞏固和擴大自己團結無比時今日的時候，並且還漢奸汪派托派用一切方法進行搗亂，共產黨政團體，企圖用遺陰謀陷中國於萬劫不復的時候，這些不顧民族大局的份子却故意「平地起風波」，挑撥是非，淆亂人心，企圖把人民抗戰的視線轉移到「反共」，企圖把團結轉移到分裂。某些刊物居然對於爲中華民族獨立生存，而在最前線流血抗戰的中國共產黨，加以污蔑的詭辯和極惡毒的毀謗，某些刊物甚至故意企圖利用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和三民主義，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從而反對中國共產黨，他的詭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怎樣已被孫中山先生駁得「體無完膚」，中國共產黨可以把馬克思主義「擱在一邊」。甚至一些平日以反對中山先生、反對國民革命和反對三民主義爲能事，而不知三民主義爲何物的人，現在因爲「反共」之便，也居然自己充起是三民主義的「真正忠實信徒」，來向那會與中山先生及國民黨共同革命患難、並且對於中山先生革命事業及三民主義會具特殊貢獻的中國共產黨進行像煞有介事的攻擊。還特別可指出的，在公開「反共」的論壇上，托派居然獲得有合法的地位。在最近那些人物的「反共」擾攘中，有些以專業吃磨擦錢爲生活的偽善者，其中幾個曾是著名的共產主義叛徒，他們大抵是當遇難時而不能「見危授命」的不仁、不智、不勇的變節漢，他們大抵是當着死生呼吸的關頭，爲挽救自己一條不值錢的生命，反轉而向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反噬的貪生怕死之徒，他們大抵曾經是降意而出賣自己的朋友、以換得自己生命的民族敗類，他們大抵是國際法西斯蒂間諜托洛茨基的徒弟，然而他們現在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國各黨派團結抵抗日寇的前面，大模大樣地以「反共」的號召時驚一時，並且利用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及其提出的三民主義，作爲自己叫囂的護符，好像說，他們是孫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所以他們要反對共產主義，要反對共產黨。像這樣下流變節的人，他們一方面脫反對共產黨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另一方面，却又東藉口孫中山先生，西藉口三民主義，以作爲「反共」的資本，這簡直是對於孫中山先生和革命三民主義給予極大的污辱！大家知道，孫中山先生會是最羞惡那各色各樣的無恥變節漢的。正是他們不配尊敬孫中山先生，也不配談什麼三民主義。而且，他們根本已失掉了自己的靈魂，已失掉了向中國人民說話的資格。很多人都知道，

上海日本特務目的房間中，時常掛起馬克思列寧的相片，這是他們做間諜工作方法的一種，爲的使人落入陷阱，而托派口中的「馬克思、列寧」或「孫中山」，不是別語，就恰是日寇間諜這種方法的「餌」。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如不被日寇間諜——托派所兜騙、所仇恨，那才不成其爲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了。但可怪的，竟有些人把托派當成奇貨！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敬重孫中山先生。我們發揚中山先生的革命風度，發揚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同時，我們應該說，凡是具有歷史遠見、而真正敬重中山先生、願意把三民主義不當空談、而願意把它付之實現的人，都不應該把三民主義當成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的旗幟。因爲如果這樣，就是存意把孫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棄置於淤泥中。現在已成爲大逆不道的汪精衛就是這樣做的。這點需要一切人們的警惕。同時，如果有人想利用某些共產主義的叛徒（如葉青之流）來這樣做，那將不是他的聰明；因爲中國人民都會了解共產主義的叛徒究竟是什麼貨色的。現在爲汪精衛賣國計劃而奔走的人，如周佛海、如陳公博，他們當共產黨初成立的時候，曾一度混入黨內，後來脫黨，他們就利用和誇大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某些消極方面，利用和誇大中山先生對於馬克思主義某些誤解的地方，以反對馬克思主義。試問，這些人現在幹的是什麼勾當了？他們是在忠實於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事業嗎？

中山先生曾頌揚過馬克思主義，並稱之爲「舉人類思想之大成」，但是不可否認的，誠然，他對於馬克思學說是有不少誤解的地方。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反對別人對於馬克思學說有所爭論。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願意傾聽一切的真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小氣的人，以爲別人一定不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反之，正因爲我們是忠實於真理，忠實於科學，我們根據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我們承認那是顛撲不破的「鎊金不怕火燒」的真理，我們認爲馬克思主義如經不起人家的批評，那就不能其爲馬克思主義。我們並不駭怕、不拒絕人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然而同時，我們以爲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同樣地享有一切辯正自己面目、並批評任何學說的自由權利。我們中國幾千年中在專制主義的統治下，人民被剝奪了思想自由，這是使得我們科學思想落後的原因之一，爲着使得科

擊思想得以發皇光大，我們須承認思想自由這個神聖的原則。這就是說，不應當只允許你有批評我的自由，同時也要允許我有批評你的自由。中山先生所以成爲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正是因爲他是承認了這種自由的。

迷信和盲從是真理的仇敵。民族叛逆周佛海幾年前在江蘇做教育廳長的時候，曾對孩子們、學生們提倡過：「信仰需要達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需要達到盲從的程度」。這就是愚民政策。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不願意任何人對於馬克思主義採取迷信和盲從的態度。我們認爲：任何人如果對於馬克思主義採取這樣的態度，而不是採取理解、融會的態度，就決不能成爲真正至死不變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同時，我們對於其他任何學說，任何思想，也決不無端加以排斥；如果在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上，我們對於其他任何學說、任何思想，只要是真理，那怕只有部份是真理，我們就加以同情、加以擁護、加以幫助，我們同樣地不是做盲目和迷信的附和，我們是有一定的科學的理智的立場的。

「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這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真正態度。我們不以偏愛而閹割真理。同時，我們願與一切人士開誠公佈地討論、研究，以發揚真理，求得真理。近來那些吃磨擦飯的僞善者，——特別是那些失掉了靈魂的共產主義叛徒，既然正在利用孫中山先生對於馬克思學說某些誤解的地方，以作爲反共的資本，以從事挑撥是非和離間國共合作的工作，我們爲馬克思學說的眞面目，對於孫中山先生誤解的地方作些辯正，則對於眞理的研究，將是很有益的。

首先是關於唯物史觀的問題。

孫中山先生採用了美國人威廉的學說，以批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中山先生引伸威廉的意思說：「馬克思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爲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我們知道：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眞相，是認爲：「……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是認爲：某一種社會生產方法就是形成某一種社會的物質生活；社會發展的歷史，是生產發展和生產方法新陳代謝的歷史，是社會物質財富

的生產者自身的歷史——勞動者的歷史。是認為：某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某一定的社會存在，就有某一定的反映它的意識、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如奴隸主社會有奴隸主社會時代的意識、思想、政治制度等；封建制度社會有封建社會時代的意識、思想、政治制度等；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主義社會時代的意識、思想、政治制度等）而這就是，馬克思關於唯物史觀一個著名的論點：「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社會、政治制度等」而相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同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又認為：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又能反轉過來對於社會物質生活和社會歷史的發展起巨大的作用。馬克思對於人類的社會思想、文化精神生活的作用，曾予以強調。從這些看來，則簡單地所謂「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這句話，並沒窮盡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具體真相。而且我們從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真相恰可以了解：所謂「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却還沒有攝取到歷史發展的「重心」，却還不能說明社會歷史發展的差別。

人類歷史上已經過多不同的社會，一般地說，有原始共產社會、古代奴隸主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在蘇聯已實現了），在這些各種不同的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生產方法，有各種不同的物質生活和生活方法，有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人類；在這種情形下，所謂「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就等於說：「社會問題」才是原始共產社會歷史的重心；「社會問題」又才是古代奴隸主社會歷史的重心；「社會問題」又才是封建社會歷史的重心；「社會問題」又才是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的重心；「社會問題」又才是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的重心。這樣說，結果對於歷史就是等於沒有什麼說明。

達爾文——這是在生物界中，發現了「生存競爭」的規律之偉大學者。隨後有些所謂「進化論」者，會想簡單地將生物界發展的規律，移作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事實上，關於「生存競爭」這規律，在人類社會現象，只在某些個別例遇中可以作一種說明，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正像恩格斯所說過的，「敗者無情地被人排除

，這正是達爾文式的爭取自身生存的鬥爭。這一鬥爭，從自然界移於社會，而且更爲劇烈了。在我們目前，動物的自然狀態，變成人類發展的焦點（恩格斯又說過：「達爾文沒有懂到，他對於人類，特別對於他的國人，是寫了如何苦味的諷刺，因為他證明，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通常狀態」）。然而無疑問的，「生存競爭」這條規律並不能真正具體地說明一般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而且，恰恰只說明了某些社會的病態，如資本主義社會盲目的「優勝劣敗」的商品生產者之自由競爭、生存競爭，恰只是說明了人類的某種盲目的活動，是還沒有真正超越動物的境界，而要克服這病態，只有在另一種有意識、有計劃的組織社會生產的社會主義社會裏面，才有可能。

正如我們一般人所知道的，社會的人類究竟是和一般生物界的動植物不同的，動植物界要求生存，而人類也要求生存，但「人類却是製造工具的動物」，人類依賴自己所製造的工具來生產物質生活資料，並且創造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方法、不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創造了各種不同社會的不同社會物質生活，而且，在某些一定的社會階段中，根據於當時生產力發展的程度，同一樣的人類，却因爲對於某生產關係的地位所處不同，分裂爲不同的階級；不但如此，根據生產力更進一步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變革，階級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要歸於消滅。這樣看來，所謂「社會問題以生存爲重心」的說法，很明顯的，還是沒有說明了具體的社會歷史，因爲要說明這一切具體的社會歷史之發展，要說明這一切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首先就要了解社會生產方法的新陳代謝，就要闡明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之發展，也就是說，只有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才能給予說明。

孫中山先生說：威廉「這位美國學者所發明的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歷史的重心」。可是事實是這樣：威廉這「學說」還不過是撇拾過去生物進化論者的某些意見，最多他不過是重複他們的意見，而且威廉比他們要更缺乏精彩，說不上什麼發明。在這點上，我覺得中山先生是誤會的。

其次，關於階級鬥爭的問題。

中山先生說：「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爲因」（一般說來階級鬥

爭並不就是階級戰爭，階級鬥爭有各種不同的形式，階級戰爭只是階級鬥爭發展的更高形式，所以，籠統地說「階級戰爭」是不妥當的。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我們不能以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只是階級鬥爭的學說，而且首先發明階級鬥爭的學說的，倒不是馬克思。馬克思自己這樣說過：「至於講到我呢？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的功勞，和發現各階級間之鬥爭的功勞，都並不屬於我的。在我以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早就敘述階級鬥爭的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已經敘述過各階級之經濟的解剖，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明下列各項：（一）階級的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所特有的一定的歷史鬥爭相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進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不過是消滅一切階級而進到無產階級社會的一個過渡……」（在我國古代，墨子所謂「強必凌弱，富必奪貧」，其實也已是初步地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思想）。其次，我們要說明的，馬克思在上面自己已說過：階級的存在和階級鬥爭僅僅是發生在生產發展某種特定的階段。所以階級鬥爭並不是與人類社會始終共存在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某些特定社會生產方法（如奴隸主社會，封建社會，資本社會）的「果」，而某些特定社會生產方法乃是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因」。同時歷史的辯證法，因果也不是終古不變的，因果的真偽發展，果又轉變為因。因此，人類社會一發展到有階級存在的時候，如各種歷史告訴我們的，階級鬥爭在歷史上又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成為由舊社會轉變到新社會的動力。而階級鬥爭，一發展到革命（階級戰爭），這革命即是新社會的產婆。並且，階級鬥爭一發展到無產階級要求自己解放的鬥爭，一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這種階級鬥爭又恰是消滅階級鬥爭的道路。從這些看來，階級鬥爭在這種時候是由果轉變為因。所以，很明顯的，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既不「倒因為果」也不「倒果為因」，却是對於因果分析得很清楚，而中山先生所謂馬克思「倒果為因」，却是歷史的誤解了。

說到中國問題，假如中國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自然是誰也不能捏造的。再沒有比那憑空製造歷史、製造事實的是更惡毒的了。然而我們從歷史研究。中國階級鬥爭的存在已有幾千年了。在封建社會中，一方面是有壟斷土地、傾向農民剝削地租至佔其收成百分之六十、七十的地主階級；

另一方面則有缺乏田地、而向地主租地、每年繳納租地至佔其收成百分之六十、七十的農民階級，這種事實一直到現在還存在着的，並且其彼此之間歷史上從來是存在着鬥爭。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出現了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時中國也在這時候，產生了新的階級關係：一方面是佔有近代生產工具、而靠僱傭勞動以謀利潤的資本家，另一方面是沒有生產工具、而靠出賣勞動力以謀生活的勞動者，這當然也是一種事實；而其間存在着剝削與反剝削的鬥爭，這當然也是事實。

中山先生認為：「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所謂貧與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可是不論從歷史的實際說來，不論從理論上說來，這種說法，都是歷史的誤解。第一，階級的劃分，是根據在某種社會生產關係中，每一部份人對於那種生產關係之特定的地位而決定的。像我們在上面所提到的，這種劃分，不但在我國封建社會生產關係中，是存在着的；而且在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更是鐵一樣的存在。第二，在商品關係和貨幣關係的發展中，一方面有一部份人提升為富裕的資本家，另一方面則不斷地湧出大批的無產者，這是不可避免的。第三，中國資本家和外國最大的資本家比較起來，或許是「小資本家」，但是在一般情形下，對於中國工人的榨取，也是沒有超階級的仁慈的，而且還更原始。中國資本家不管是怎樣如所說的「小貧」，但是中國資本家是佔有生產工具，而中國工人却出賣勞動力，這樣，他們彼此生產地位的不同，就決定了他們在分配地位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國資本家吃的總是海味山珍，住的廳是高樓大廈，而中國工人做的是驚人勞苦和驚人長時間的工作，而過的却是驚人的飢寒交迫（民國十年中山先生在國民黨辦事處講演中，自己也說過：「國人往往都是誤解民生主義的真諦。許多資本家，開了一個工廠，僱了幾百名工人做工，每日每人發給很少的工錢……資本家憑藉他的金錢魔力，牢籠許許多多工人，去替他個人用死力，工人出了許多血汗，只賺得少許工錢；這漁工廠的組合，外國話叫做「血汗店」」。要了解真實的歷史，對於這些倒是不用掩蓋的。在目前，我們主張一切階級聯合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然而這不是說，我們可以隨便把我們民族存在着各種真實的歷史加以掩蓋起

來，不但如此，爲着抗戰勝利，我們恰是應該努力，儘可能在不妨礙抗日大聯合的程度上，減少或去掉某些不合理的事實，以適應抗戰的需要。譚延闓，這是對於民族只有害處的。

事實告訴我們：馬克思不但看出了階級鬥爭是社會的病蘊，而且規定了消滅階級及階級鬥爭消滅人類社會一切恐慌、飢饉、戰爭各種災難的真正科學步驟和科學方法，馬克思對於人類社會是真正具有萬能的治病大夫，是真正的社會生理學家。一切不願諱疾忌醫的，是恰恰必需向他學習的。

第三，關於「剩餘價值」學說的問題。

中山先生引了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中山先生在一地方說：「……馬克思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視社會上其他有用份子的勞動……」。在另一個地方又說：「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精華，是說資本家所得的錢，是剝奪工人的盈餘……」。在又另一個地方又說：「馬克思說，資本家要能够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均見民生主義演講）。事實上，中山先生前後這三種說法，是不很相同的，這種說法的不同，是表揚了中山先生對馬克思學說，實在是很誤解的。我們在這裏可以簡括地說一句：馬克思是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法則，認爲資本家的利潤是從剝奪工人的剩餘價值來的，在資本社會中，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成了資本家的利潤。不是籠統地說，資本家剝奪工人的勞動，而是具體的說，資本家剝奪工人的剩餘勞動。工人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分別，是需要我們弄清楚的。剩餘勞動的剝奪不是在資本社會才有的，在階級社會發生的時候，就有支配者對於剩餘勞動的剝奪，在各種階級社會中，都有剩餘勞動的剝奪。只是在資本社會中，剩餘勞動的剝奪才表現爲剩餘價值的剝奪。不是說：「資本家的剩餘價值」，而是說，「資本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關於剩餘價值的剝奪，列寧曾有幾句很通俗的說明：「僱傭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土地、工廠、勞動工具的所有人，工人只用一部份工作時間，即可抵補他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費（工資），而另一部份時間是白白地勞動了，給資本家創造了剩餘價值——利潤的來源，資產階級的財富來源」。

中山先生認爲「其他有用份子的勞動」也有產生剩餘價值的「功勞」。他舉例說，如紗廠布廠「每年所剩的盈餘價值」，「功勞」不僅應歸於該廠工人的勞動，而且也要歸功於布和紗的原料的勞動，而且推究下去，還「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配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但是這樣說法是會使價值和剩餘價值混淆不清，而且也會使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混淆不清。事實上，原料所包含的勞動價值，是經過工人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加工地轉移到布或紗上去，這原料在布或紗裏仍存了自己本來的價值。但毫無疑問的，那原料並無從生產剩餘價值。這是第一。第二，工廠主支出的資本，是分爲兩個部份的，馬克思說：「那投於生產手段的一部份資本，如購買原料、副料及勞動工具等，其價值的多寡，在生產過程中，並未變更，所以我名之曰資本的不變部份，簡稱曰不變資本。反之，那投於勞動力的部份資本，在生產過程中，變更了自己用價值，它重新產生了自己的等價物，此外，且生產了額外的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又可變動，可多可少。這一部份資本不斷地由不變的數目變成可變的數目，所以我名之曰資本的可變部份，簡稱之曰可變資本」（「資本論一卷」）。至於中山先生所購「歸功於器械和配料的製造家或發明家」，這裏的所謂「製造家」如果是指的那些工廠的工人，誠然，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本是產生剩餘價值的，但他們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已被他們自己的工廠主所剝奪去了。如果是指的那些工廠的工廠主，那末，他們又不能產生任何剩餘價值，而只是佔有剩餘價值。「發明家」在資本社會中，他們同樣地是按照價值的法則，在勞作過程中，喪去自己勞動力的價值，他們沒有在一切工廠中產生了什麼特別的剩餘價值，那又是極明白的。

中山先生又認爲「銷路」也會生產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的生產本來不是爲了消費，而是爲了利潤。當然，沒有「銷路」，資本家不能把剩餘價值變爲（實現爲）利潤，但這不是說，「銷路」會產生剩餘價值。列寧說：「剩餘價值不能夠發生自商品流通中，因爲商品的流通，只是等價物的交換而已；剩餘價值也不能夠發生自價格的額外附加數目中的，因爲購者與賣者的損一得一是互相抵銷了。要知道我們所講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會現象而言，而不是單個的現象」。

中山先生認爲：「馬克思說，資本家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

，二是延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三是抬高產品的價格」。可是馬克思並沒有像這樣的說法。馬克思把剩餘價值分別爲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他說：「用延長工作時間的方法而生產的剩餘價值，我稱之爲絕對剩餘價值；倘若剩餘價值是由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產生，由勞動工作時間兩部份在量的比例上，發生變化而產生，我稱之爲相對剩餘價值」（「資本論」一卷）。延長工作時間，因爲生產上的和社會道德上的限度，特別是遇到工人階級的反抗，資家被迫採取另一種增長剩餘價值的方法，即是縮短必要的工作時間，加強勞動強度和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工作時間雖則縮短了，然而剩餘價值仍可以大大地增加，這就是所謂相對剩餘價值。因爲沒有明瞭馬克思關於絕對的剩餘價值和相對的剩餘價值的分別，而認爲馬克思沒有料到工作時間縮短也會增長剩餘價值，這是多大的誤解呢？中山先生說：「馬克思在當時所想到了的，以爲工作八點鐘，生產力一定減少……」。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第一，在資本社會中，工作時間的縮短，主要的是工人鬥爭的結果，而資家在這種機遇中，像我們上面已說過的，還是要用加強勞動強度來彌補；而工人的生活也絕沒有因此而就由地獄走上天堂；同時，生產力在這種資本社會的框中，其發展必然還是有限的。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如蘇聯所實行了的，如馬克思主義者在那裏所創造了的，時間的縮短，不但沒有妨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使生產力有空前速度的發展。要說這些是馬克思生前所不「明白的」，「所沒有料到了的」，那真是太不成其爲「馬克思」了。

第四，關於「社會改良」的問題。

中山先生說：「近幾十年來社會是很進化的。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爲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中山先生認爲這些是馬克思「所沒有料到了的」，所「斷錯」的。所謂「社會與工業之改良」，中山先生指的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生產的效率便是很大……」。關於這點，我在上面論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時候，已略略說到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工人生活的某種改良乃是工人階級長期殘酷鬥爭的結果，在馬

克思活的時候早已親眼看到這種鬥爭的若干結果，而且這些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是寫得很清楚的。有些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所以同意頒佈一些勞動法，一方面是因為受工人鬥爭的壓迫，另一方面是因為有保存工人階級的必要，因為過度殘酷的剝削，會在生理上弄到工人階級的毀滅危險，而假如沒有工人，資本家從那裏去取得利潤？但是，我們又知道：縱使某些資本主義國度進行改良一些工人階級的生活，然而所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歸根到底，還是不會有的。在許多國家，如一些工人工作時間雖則比以前少些，但是資本家却拚命去加強提高工人的工作強度，設法使工人在同一個時間，花費更多的勞動和精力，以增大其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這就是如中山先生所說的「生產的效率便是很大」，而其結果，却又反轉使工人們很快用完自己的精力，失却勞動能力，很快衰老，容易生各種疾病，容易陷於殘廢。後來，資本主義國度所謂生產合理化，一方面把工人工作強度提到極端緊張化，更加速度地耗費工人的精力，使工人做幾年工後便成廢人，特別是美國有所謂「太羅制度和福特制度」。中山先生所提到的「近來極賺錢」的工業——福特汽車廠之所以「賺錢」的問題，事實上，馬克思關於相對剩餘價值剝削的規律，早已把這種秘密揭穿了。說是馬克思沒有料到，這自然是誤解；而且，我們又可以說，如不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決不會了解福特汽車廠之所以「賺錢」的祕密的。

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把若干「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的問題，這對於馬克思及其戰友恩格斯，是早已說明了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把某些交通工具收歸國有，其主要的社會意義，不過是把某些與國內整個工商業資本家利益有關的工業收歸國有，使這一些重要的工業，不致受資本家個人或資本家某個別集團的操縱，以致妨礙其他資本家集團的利益。在前世紀八十年代，馬克思還在世時，他的戰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書中，對於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很深刻地寫道：「……無論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總不得不出來管理生產。這種轉為國家公產的必要，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工具上：郵政、電報及鐵路。……但是無論轉入股分公司與托拉斯中，或轉為國有產業，都沒有除去生產力的資本主義性質。」

……至於現代國家，那末它只是資產階級社會所建立的組織，用來保護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其不受工人及個別資本家的侵害，現代國家，無論採取何種形式，在實質上，總是資本家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觀念上的集體的資本家。它（現代國家）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掌握於自己的手中，它就愈是成爲實際的集體的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國民。工人還是備儲勞動者，無產者。資本主義非但沒有被消滅，而且更尖銳到了極點，到了頂點」。所以，正如事實所告訴我們的，關於資本主義國家把若干企業國有的問題，不但沒有推翻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而且，同樣地，只有馬克思學說才能揭穿這種秘密。

中山先生說到上述兩個問題的時候，時常強調地提到俾斯麥的政策。本來俾斯麥是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並且對於社會主義，進行過殘酷的鎮壓，只這個最明白的歷史事實，已足說明俾斯麥政策的一切真相了。大家知道：德國當時工人生活的某些改良，這是德國工人經過鬥爭的結果。同時，俾斯麥的把關於交通企業收歸國有，也絕不是什麼社會主義，中山先生關於俾斯麥會有一段敘述：「當俾斯麥秉政的時候，英國、法國的鐵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爲基本實業，歸富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壟斷，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俾斯麥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病，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全國鐵路都收歸國有，把那些基本實業，由國家經營，……俾斯麥用這種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面打銷的方法，用這種防止方法，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民權主義演講）。中山先生這段話，本來是說明「俾斯麥反對民權的手段」，但是從這一段話，我們却可以領悟這點：像鐵道及某一些實業的國有，如俾斯麥所實行過的，畢竟不是什麼社會主義，俾斯麥或許自稱是「社會主義」，但德國並不是因此就成爲「社會的國家」，意國也並不是因爲俾斯麥的「不許」，全國實業就不被「富人壟斷」，就沒有所謂「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俾斯麥執政以後，一直到今天，德國國內階級鬥爭的更無情，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恩格斯關於俾斯麥的偽社會主義，說得很好：「自從俾斯麥力倡「國營」以來，發現特種的冒牌

社會主義，這國社會主義到處尋瑪阿諛逢迎的勾當，不惜毫不遲疑的宣佈，凡是生齒俱備收歸國有——甚至俾斯麥式的國有財產在內——便都是社會主義。顯然的，如果恩學的驅駛是社會主義，那末拿破崙的悔悟，也應該被舉作社會主義的創始者了。如果比利時政府因為最普通的財政上感及政治上之理由，自己去建築主要鐵路，如果俾斯麥沒有一點經濟上必要，而將普魯士主要鐵路收歸國有，全國藉此便於作戰時的應用，便於使鐵路人員變成操縱護政府的走狗，尤其是爲便於取得不受國會限制之新財源——那裏，無論如何，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是自覺或不自覺，都不是社會主義。如果這些社會主義，那末，普魯士的國家銀行，皇家的陶器工廠，甚至於軍隊中的軍衣製造所，應該被稱爲社會主義的機關了，或者甚至於認眞的將威廉第三時代某一聰明人關於妓院收歸國有的提議，也看作是社會主義了。所以我在這裏引了這樣長的話，因為這是一段極銳利的歷史描寫，而這一段描寫，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那一些歷史問題的本質。在我們中國李鴻章式的鐵路輪船國有，是可以作爲很好的對照的。而這些正說明了：俾斯麥主義沒有推翻了馬克思主義，從來也沒有推翻了馬克思主義，而俾斯麥主義本來是馬克思所目擊的，更無從說馬克思沒有料到。

資本主義國家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這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沒有改變了絲毫。資本家政府向資本家的徵稅，比向資本家的利潤收入，不過九牛一毛，而且，所得稅的還居不過爲資本家効勞，代理資本家自己所必要支出的一些費用；不但如此，資本家政府向資本家徵稅，而資本家却會更踴躍地向工學剝削，博得徵稅的負擔，間接放在他們身上，就是說，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至於所謂「合作社的社會化」，中山先生指的是關於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一些消費合作社而說。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那些合作社比起資本家的大商業，在此項上真是小得無從比擬；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大商業的附庸，不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不能發生什麼大作用，而且還是資本家利用來壓榨工人階級的工具。中山先生認爲在資本主義國度中「現在合作社發生，商人便消滅了」，但對於合作社的這種的，當然與無從認爲。「馬克思的判斷和事實不符」。馬克思學說在一切事實面前，更被證明是不可救藥的真理，就是關於上述的事實，也是一樣。

第五，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的問題。

中山先生說：馬克思是病理學家，而不是生理學家。可是馬克思却正是從歷史的辯證法——辯證的辯證法，辯證法是不可征服的力量——診斷了階級社會的病理，特別是診斷了資本社會的病理，而又因此解剖了新社會（無階級社會）的生理。離開了歷史的辯證法，就是既不能了解階級社會的病理，也不能了解無階級社會的生理。馬克思之所以是真正的社會生理學家，就因為他是能月症下藥，他真正從歷史發展的辯證法觀點上，指出社會不可避免的規律，能根據具體的社會發展規律，指出消滅階級存在及階級鬥爭乃是社會不可避免的結果，發現出創造無階級社會的真力量——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軍，並能根據上面這一切，而提出了、規定了人類真正可以消滅階級存在及階級鬥爭的具體道路。而且，正是因為歷史是辯證法的，歷史又會活生生地繼續發展，所以反映客觀歷史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又時不是教條。歷史是發展的，歷史同樣地會提出新問題。如大家所熟知：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新階段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一些具體具體的問題，關於在資本主義世界包圍中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這些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是由列寧斯大林加以發揮了，而列寧斯大林所根據的，乃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只是在新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俄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後的新經濟政策……以及共產黨二十餘年來在蘇聯所實行的一切，所根據的都是馬克思主義，都是「馬克思的方法」。中山先生說：「俄國當初革命的時機，本來要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還在其次。但是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由於種種事實，反對馬克思的一派，便主張實行馬克思的辦法，經過幾次試驗，已經是不通，歸於失敗。至於馬克思的黨徒便答覆說，俄國行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不是失敗，是由於俄國的工商業還沒有發達到英美那種程度；俄國的經濟組織，還沒有成熟，所以不能行馬克思的方法。如果在工商業發達、經濟組織很成熟的國家，一定可以行馬克思的辦法。所以馬克思的方法，若是在英美那兩家去實行，一定是能够成功的，社會問題是一定可以根本解決的」。事實上，蘇聯所實行的一切，就恰恰完全是馬克思的方法，而事實恰恰證明馬克思的方法「在歷史上之空言未有的成功，蘇聯實

「馬克思的方法」已超越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並在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在事實的面前，所證明
的，恰不是「馬克思的方法」失敗，而恰是馬克思的人的失敗；並且，事實也證明了：馬克思的
黨徒從來也不會以為「馬克思的方法」只在英、美那種國度才走得通，在俄國便走不通。如果黨徒不
是實行「馬克思的方法」，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歷史又曾在給人嘲笑：現在更有甚
於以為「馬克思的方法」只可俄國可以走得通，而在別的國度走不通，特別那些以吃腐肉飯為生的偽
黨徒，共產主義的叛徒，遺棄了黨義，中國民族叛徒類，正在中國這樣叫嚷。
這不是關於抽象的「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的說法，而是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來代替什麼樣的社
會制度，而是用什麼政治制度來代替什麼政治制度。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有什麼樣的政治，而對於某社會制
度的變革，某社會制度的建設，必須實行一定的政治調度和建立一定的政治制度，以達到其目的。比
如，俄國十月革命是為着以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制度，為着達到這目的，必須建立無產階
級的「政治」。但是如果以為無產階級的「政治」一旦建立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那就是
天大的誤會。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初期，列寧在和托洛茨基及布哈林爭論的時候，關於社會主義革命，
會這樣明確地指出：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根本差別之一，就是在俄的封建制度內部，就已經給
那個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造成各種新的經濟組織，這些組織，逐漸改變封建
社會的各方面。資產階級革命，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掃除、拋棄、毀滅舊社會底一切枷鎖，
任何資產階級的革命，一完成這個任務，就是完成了自己的一切責任；資產階級革命那資本主
義的發展。而社會主義革命，則處在完全不同的情形。由於歷史曲折進程而不能不開始社會主義
革命的國家，它愈是落後，則它愈難於前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在這裏，除破
壞任務以外，還添有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組織任務。」（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
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首先經過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政治主人之後，才能開始建立起來。這一個過程
在俄國是如此，在其他國度也必將如此。不過，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其間將在

更與階級鬥爭的複雜的、曲折的過程，採取的辦法也必與舊社會不同的變化與這些也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發展，才得與與正確的處理。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創造歷史的一般指南，同時也是一切共同國際中其各種具體的、複雜的條件和變化對策的指南。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階級的生活上、歷史上、完全無可爭辯地這點指出來了。

不用想像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包圍除資產階級自己的私有財產，以達到社會主義。像我們上面所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營業，更無從說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實現，必須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佔成社會的公開主人（就是說，成爲支配的人），這是馬克思的基本思想。在任何國家，這點都不能有例外。當然，如果某一個國家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可以經過「和平方法」以達到這點，馬克思主義者也贊成這種辦法。馬克思自己對於前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根據其特殊的具體條件，曾說到或許有這可能。但是，如果沒有這種可能的條件，或者這種可能的條件業已失去，當然就不能幻想這種可能。

在我們中國，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早與天下共見。那些以吃腐爛飯爲生、而在抗日面前還建國內一切罪惡的鬥爭的偽善者，他們裝腔作勢地，支不對題地說，他們是主張什麼「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因此不要馬克思主義。可是問題並不在這。那些偽善者不過是藉此以混亂人們的視聽。如果說「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這恰是我們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本來所提出過的希望。在七月黨代會前，毛澤東同志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就這樣正式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健全的轉變，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着，結果將有黨衆的力量如何而定」。假使在將來，我們中國有一天，可以經過人民的投票表決，表決是否願意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我相信，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將站在前頭贊成這一個舉動。

現在，當我說我句話，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由蘇聯傳播到俄國的時候，那時有些俄國人，有些俄國民粹派，會大聲叫罵，說這是海外來的貨物，不合俄國國情，他們認爲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俄國來，有礙於俄國，就好像英國人運鴉片到中國來，有害於中國人一樣。然而，歷史證明：民粹派爲俄國是失敗了，馬克思主義成了俄國人民解放唯一正確的道理。俄國民粹派的先鋒主義觀上也曾夢想過那

（新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事業的奮鬥，而且將繼續爲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到底，這地擴大我們民族偉大的事業，這是要把我們民族第一步偉大的事業（民族民主革命的事業），進到我們民族第二步最偉大的事業（共產主義的事業），在這第二步最偉大的事業上，我們將真實地實現幾千年來我們民族最優秀的人們關於「大同」的夢想，我們將把一切奴隸制度和苦痛生活一掃而空。試問：誰能說中國共產黨人這種偉大的思想、目標和意志是不合理的呢？是不合民族澈底的利益的呢？試問：爲實現我們民族這種澈底的利益，爲實現我們民族這種最崇高的理想，誰能否認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能真正組織共產主義社會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馬克思列寧科羅夫共產主義的政黨——的存在？試問：經過一切歷史的考驗，經過現實的證明：不說將來，只在現在民族解放事業上，只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事業上，不正是需要中國共產黨這個銳利和偉大的力量嗎？不正是因爲中國共產黨人具有共產主義的偉大抱負和遠大目標，所以他們在這些事業上是最英勇地出死力的嗎？誰有何理由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取消自己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組織？

是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在歷史的事業上是合理的：「雖然在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但是，中國共產黨員宣佈：我們是孫中山先生的基本革命口號底擁護者，是中國人民最好的革命傳統底承繼者；可是，同時共產黨員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鐘也不會停止其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天才學說的信徒。」

「我們共產黨員，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主張與國民黨及其他組織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建立民族統一戰綫，以便進行共同鬥爭去反對共同敵人；可是，同時，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鐘也不允許喪失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一分鐘也不允許掩藏自己共產主義的面目和旗幟」（陳紹禹：「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時期」）。那些叫嚷要共產黨取消自己馬克思列寧科羅夫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及其獨立的組織的，那等於要取消中國工人階級，等於要取消中國的歷史，那只是不知自量的妄人而已。

主義（在客觀上，他們是要求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並會一度熱烈地要求俄國農民的解放。然而歷史是這樣：民粹派先聲對於農民解放的要求，最後是按照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規定的道路來達到的，並且是經過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來達到的，而不是按照俄國民粹派所規定的道路來達到的。民粹派所關於社會主義的夢想，最後是按照馬克思主義者所規定的道路，並經過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來變成現實的自由快樂之地上的天堂，而却不是按照民粹派所夢想的道路來達到的。歷史的結論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是適合俄國國情，而俄國民粹派的主義却偏偏是不適合俄國國情的。

重複別人的陳調，來污辱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決不是辦法。我們中國為抗戰圖存，大家需要和衷共濟，而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已表現其歷史的人格和能力，他們的組織及他們運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歷史事實上，已證明是中國救亡圖存所必不可缺少的東西。消滅這些東西的企圖，是對於民族極端有害，是無比地有害，而且也絕對的不可能。重複過去歷史的錯誤，要加深民族的災難，並可能陷民族於覆亡。日寇漢奸汪精衛要拉中國走上這條路，如果誰上了這當，便可能陷於萬劫不復。那些頑固份子，那些民族分裂份子，裝腔作勢地說：既然共產黨人為三民主義實現而奮鬥了，那就應該要求他們放棄共產主義；既然共產黨人為三民主義實現而奮鬥了，那就不需要共產黨的存在。他們鄙薄中山先生在世時國民黨中央關於聯共問題決議的價值及其意義：「中國共產黨並非出於何等個人之空想，亦非勉強造作，以人民移植於中國者。中國共產乃中國正在發展之中國工業無產階級，自然的階級鬥爭所湧現的政治組織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現存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必不能隨之消滅，彼等必得另行組織」。這個決議的合於歷史的真理，是經過苦痛的歷史實際所考驗了的。現在如果有人還忘記這苦痛的歷史，而想重複歷史的錯誤，則必將為歷史所懲罰。

是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上的態度始終是光明正大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上完全是合理的。在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上，中國共產黨人擁護革命三民主義，為革命三民主義事業而奮鬥，這是增大三民主義偉大的價值，而且正是保障革命三民主義的可能實現；中國共產黨人不僅為革命三民主義